

甘肃史志



2014.4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终审《庆阳市志》（1986-2010） 和《甘肃省志·教育志》（1987-2005）



10月29日，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终审《庆阳市志》（1986-2010）和《甘肃省志·教育志》（1987-2005）两部志书。

会议由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成辉主持，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副主任陈田贵，省人大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副主任马森，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副主任张正锋，省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副主任王忠民，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李虎，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车安宁、李振宇、孙奇明出席了会议。庆阳市政府、省教育厅分管领导和修志机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上，李虎、车安宁两位主审人分别对《庆阳市志》（1986-2010）和《甘肃省志·教育志》（1987-2005）的复审情况进行了汇报。经过会议认真评议审查，原则通过《庆阳市志》（1986-2010）和《甘肃省志·教育志》（1987-2005）终审，同时要求承编单位按照复审、终审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和要求对志稿作进一步的修改，报请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批准出版。

歌唱兰州

九 日

你不是雄伟壮观的古都
但,你是历史悠久的名城
军事咽喉,扼守西北疆域
丝路枢纽,锁链亚欧交通

你不是高度发达的商城
但,你是中国工业的先锋
石油化工,曾是共和国的长子
有色冶金,开启赶超先进的航程

你没有人间天堂的美誉
但,你有独树一帜的美景
黄河母亲,唯一穿过的省会
古老水车,与现代风光辉映

你没有春光永驻的气候
但,你有四季分明的节令
阳春来时,万亩桃花盛开
金秋一到,百里瓜香飘盈

你没有八大菜系的名气
但,你有风味小吃的极品
手抓羊羔肉,四海皆夸好吃
兰州牛肉面,五洲无不称颂

你没有震惊人类的遗址
但,你有享誉全球的艺术
丝路花雨,当代歌舞典范
读者杂志,发行世界称雄



甘 肃 史 志

季 刊

2014年第4期
(总第20期)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号

卷首语

歌唱兰州·····九 日(1)

特 载

咸辉副省长对地方史志工作提出新要求·····(4)

工作论坛

陆海丝绸之路的大贯通大循环·····车安宁(5)
简明志书标准杂谈·····李拾良(8)

志鉴编研

审定志鉴质量的步骤和方法·····夏红兵(10)
省志编纂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刘 娟(18)

经验交流

凡例的写法·····朱光临(21)
编纂《甘肃省志·检察志》的实践与体会·····乔汝楠(22)

志书评议

博采众长 秀外慧中
——读《金川区志》有感·····桂发荣(25)

篇目选登

《甘肃省志·档案志》目录·····(27)

录

史地考证

- 陇右地名考(续)薛仰敬(29)
“华夏首县”——冀县新考张宏伟 裴应东(34)

史海钩沉

- 《敦煌卷子流散记》(38)

转载

- 《甘肃省志·军事志》概述(40)
刘家峡水电站建设始末(52)
古籍整理的意义符定波(55)

陇原人物

- 辉煌千年牙兰氏贺红梅(61)
陇上铁汉——安维峻(64)

乡土民情

- 永靖民俗(66)

历史回眸

- 古道张掖,古丝绸之路的耀眼明珠胡元肇(71)
吉鸿昌将军陇南剿匪记魏泽民(74)
谭嗣同在兰州党麟(80)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任:李虎
副主任:车安宁 钱旭
李振宇 孙奇明
编委委员:张正龙 李拾良
贺红梅 石为怀
主办单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史志》编辑部

主编:李虎
副主编:钱旭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责任编辑:梁兴明 陈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旭
本期责编:司德芳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51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编:730000
电话:0931-8960622
电子邮箱:gsdfz911@163.com
印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电话:0931-8960384

咸辉副省长对地方史志工作提出新要求

(2014年10月29日)

编者按:10月29日,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终审《庆阳市志》(1986-2010)和《甘肃省志·教育志》(1987-2005)两部志书。会议由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咸辉主持,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会议,会议原则通过《庆阳市志》(1986-2010)和《甘肃省志·教育志》(1987-2005)两部志书的终审。会上,咸辉副省长就做好全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地方史志工作,提出四点要求。

一是要切实深化思想认识。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基因,志书所具有的存史、资政、育人功能,为中华文明代代相继、血脉相承,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我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既能展示陇原历史文化的悠久深厚和无穷魅力,也能体现历史和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脉相承,特别是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凝聚人心、推进文化大省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重视和加强地方志工作,将其作为文化大省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进一步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和繁荣,为我省与我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二是要着力提高志书编修质量。地方志是为党为国为民立言的重要历史传承,不同于一般的研究论著,确保质量至关重要。志书质量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根基所在,编修志书要始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到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要坚持把“质量第一”原则贯穿于修志工作的始终,不断深化对地方志工作规律和特点的认识,以科学认真的态度,精益求精的学风,打造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传世佳志;要结合发展的新形势,加强对地方志包括对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

等志书编纂的业务指导和服务,坚持执行“一评三审”制度,健全完善志书质量管理和保障体系,规范工作程序,高标准把好志书的质量关口。

三是要进一步明确相关职责。修志是地方史志部门的中心工作。省政府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于2018年完成第二轮修志工作,但从目前情况看,第二轮修志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工作进展不平衡,个别地方和部门重视程度还不够,工作进展缓慢。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志编修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靠实工作责任,开拓工作思路,切实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经费到位、工作到位。省史志办要进一步发挥好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等职能,动员和组织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地方事业中来,整体推进全省第二轮修志工作;要把解决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紧密联系起来,从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发展的要求出发,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推动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要不断提升地方志开发利用水平。地方志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是各级党政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地情,了解地方发展历史的重要载体。地方志开发利用做得越好、推广得越多、运用得越广泛,地方志工作的现实意义就越重大,贡献就越大。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将开发利用地方志工作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起来,自觉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做好地方志资源的整合、共享与开发利用;要引导和鼓励各级党员干部“读志”、“传志”、“用志”,真正做到用历史智慧创新工作思路,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陆海丝绸之路的大贯通与大循环

车安宁

编者按:10月13日,2014“陆海丝绸之路·文化与产业发展”研讨会在省文博会敦煌分会场召开。敦煌、泉州跨越千里,牵手合作,以“传承文明·合作创新”为主题,探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交流合作的方向、领域,建立东西部产业转移、跨境交流合作的平台、载体,探索东西部陆海丝路节点城市合作开发新机制。以下是根据作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现在我们提到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往往是北方人指陆上丝绸之路,而南方人特别是沿海地区则指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各讲各的历史,各说各的优势。其实,陆上丝绸之路的古老自不必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后来居上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们都在当时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记载。

本文着重探讨如何站在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去认识和领会习总书记关于建设“一带一路”的宏伟设想,客观地、辩证地看待和审视两条不同的丝绸之路的优势和历史作用,以当代全新的全球性视野去进行统筹建设,协调优势互补,使之实现中国贸易通道的大贯通、大循环,为助力中国经济的继续腾飞插上一对翅膀。

一、历史的回顾与总结

一般来说,古丝绸之路是指从古代中国的长安出发,一路向西,途经西域、中亚、中东,直至欧洲的陆上古道。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也有不同的分支。丝绸之路的起源较早,它经历了一个从民

间自发行为到官方刻意打造的历史过程。

从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到明代约1500年间,丝绸之路一直连接着内地与西域,中国与欧亚一些国家的商贸交往,不仅为沿线各国各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同时也带来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尽管由于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丝绸之路亦时兴时衰,时通时断,但是它对中西贸易和多国文化贯通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性的影响。

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这条古道就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逐渐走向衰落。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海道运输的大通道。其实早在中国的秦汉时代就已出现,自汉朝开始,海上通道不仅连接着中国沿海各港口城市的交往,还与马来半岛等有贸易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也是先后出现过多条不同的航线,同样经历了一个从民间自发到官方经营管理的历史过程。唐代中后期,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受阻加之同期中国经济重心已逐渐转向南方,海路逐渐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的主通道。至宋元,随着东西方世界格局的变化,航海技术的突破和经济贸易的空前诉求,使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阶段,一度还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至明清又几经兴衰变化。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随国运张弛而时兴时衰的过程。

实际上,海陆两条以“丝绸之路”命名的通道,所经营的并非只是丝绸,只是以丝绸为象征而已。

它们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史上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讲,陆海丝绸之路不仅有效地传播了中华文明,同时也使中国通过贸易交流的方式,了解和吸纳了世界文明的成果。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也可以看做是国运盛衰的见证,即国运强盛,丝路也盛;国运衰落,丝路也衰。但是,回顾历史,这两条丝路都有其缺陷,都受到一定的历史局限。

首先,陆上丝绸之路由于其路途的漫长,途经沙漠、戈壁、雪山等,道路上充满了自然艰险和人为侵扰,加之骆驼和马匹的运输量有限,到后来就逐渐衰落也是一种历史必然。细细分析起来,漫漫几千公里路途,中途大多地方只是通道,而非交易之地。例如甘肃,虽占据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路段,但既不产丝绸,也不产茶叶和瓷器,也非大宗商品的消费市场,只是一个过往的通道和一个个驿站而已。

海上丝绸之路虽则距离商品主产地和集散地较近,船只的运输量也非陆上丝绸之路可比,但是,由于早期航海综合技术的不完善(如没有现代的导航、动力、气象等技术),其限制条件也较多(如绕道太远,海上风险更大、运输周期长等,近年我国古沉船“南海1号”的打捞就是例证之一),加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压抑,例如个别时期实行海禁、压制进出口、技术落后等,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总结以上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虽然中国陆海贸易通道开拓的历史较早,且过程也很漫长,这两条古丝绸之路都是利用当时的交通条件来实现商品的贸易流通,而商贸的发达又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使中国几度变得强盛。

2.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两条道路也是各自独立,互不连通的,只是此消彼长,“各领风骚五百年”而已。

3. 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这些都没有促成中国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二、未来的展望与设想

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如果发展顺利,其经济规模更是不可小觑。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重提振兴陆海丝绸之路,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显然,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其贸易通道应当是多多益善,而不仅仅是只讲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或只单纯强调陆上通道的重要。

对于当代和未来的中国来讲,其理想的方式是,沿袭古道传统,发掘历史遗产,海陆并举,不拘一格,兼顾东西,以更为宽广和拓展的视野,多渠道地连接世界各地,发展国际贸易,吸纳全球文化。这不仅有益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时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几点思考和设想:

1. 实施海陆并举,两条道路拓展的战略

实施两条,甚至多条道路通达的战略,可以打破某些大国为我们设置的贸易封锁障碍。因为当你只有一条通道时,有人可以时时对你发出封锁的威胁和讹诈;而当你有了两条以上的通道时,这种威胁和讹诈就会自然失效,他人就不会轻易敢于对你进行某种封锁和威胁了,这样你的每一条道路都反而变得更加通畅和安全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目前来看,海路和陆路各具优势,各有长短,不可偏废。海路的优势是,运量大,成本低,还可实现大件器材的整体不拆卸运输;而陆路的优势是,运输周期短,可直达世界各地的多数内陆城市等。

近期有媒体报道,中国有关方面出资,要开挖第二条海上运河,即克拉运河,如果这项工程实施,其战略意义非同寻常。

2. 适应大趋势全面发展,树立大交通意识

所谓丝绸之路重在“路”,主要是个交通问题,从古至今莫不如此。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说到底就是陆上交通不能适应越来越大的交易量和高昂的运输成本所致。而今,新丝绸之路的复兴,就必须立足于当代新型交通理念的确立。这涉及到大交通意识,即,在陆上要建立现代化的、多元的公路、铁路、民航、管道、电网并举的大交通通道;在海上也是如此,不仅要继续发展多种形式的现代航海技术,还要考虑发展敷设海底电缆、海底

简明志书标准杂谈

李拾良

“夫志，记也，所以记事实，备观览，昭劝惩也。”(明贺国定《赵城县志·序》)与史相比，志重在提供资料、保存资料。但是，志书又不同于年鉴，它是资料性著述而非资料汇编。志就是记，志书的主要任务是记述，是把历史事实完整、准确地记述下来，传承下去。记得好就是一部好的志书。好的志书被称为精品佳志，人们口口相传，经久不衰，所谓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好的志书会贻误后人，遗患无穷。

志书如何才能记得好，是一门大学问。修志的人需要大学问，但不是有大学问的人一定能编好志书。修志要有高素质、大智慧，能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有数年如一日的磨砺，容不得半点的浮躁。记得好不好，读者心里清楚，即使一时不清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晰，因为读者心目中有一个公认的志书标准。记得好不好，编修者心里也会清楚，因为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对志书的情况最了解，对志书的规则也最了解，应该对志书有准确的定位和评价。

关于志书的标准，涉及到志书编纂的规范和志书质量。规范是宏观的原则规定，质量是评价和判断的具体尺度。就每一部志书而言，在目录之前都放有《凡例》，取发凡起例之义，是每一部志书具体的规范。志书的《凡例》与其他书籍的《编辑说明》不同，当然也不排除有类似的作用。《凡例》规定志书的指导思想、记述时限、人物和事物的收录标准、行文规范等内容，是志书编纂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审查把关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有助于读者

了解志书的内容。志书的质量是具体的、详细的规定，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遵循200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这是根据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国家关于出版管理的法律、法规，在认真总结修志经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就志书的观点、体例、内容、记述、资料、行文和出版等，提出明确的要求。

以行政区域名称命名的志书编纂，包括部门志、行业志、乡土志等，无论在哪个时代及时期都会遵循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一定要顺应社会的发展潮流，符合志书编纂的一般规律，满足读者的需求和大众的审美习惯。传统志书编纂的标准有两句话概括得好：“事必求其详核，文必期于简雅。”此话聚焦在志书编纂的内容和形式两个基本方面，明确记事和行文的四个基本规则和要求。记事务求详细、真实，行文追求简洁、文雅。

详细是志书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宏观上来说，志书要全面、系统地记述一个区域、部门、行业的历史沿革、社会变化、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主要业务等，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主线。从微观上来说，纵述史实要把握事物的发端、变化和现状，不缺失主要事物、事物的主要方面和事物发展的重要阶段。同类的事件、人物等都应依标准收录，不得遗漏。做到基本地情的记述完整连贯，能充分反映事物发生、发展、演变、结果、成效或消亡的过程，人、事、物、时间、地点等要素齐全。志书在强调全面系统、内容完整的同时，还要求突出重点、特

点和亮点,做到“不苟简,亦不滥收”,收录得当,详略适宜,各得其所。志书被称为一地之百科全书,但又不是面面俱到,平铺直叙,要分层次有序展开,不平均使用笔墨。

真实是志书的生命力所在。志乃信史,有所谓“一字有误,满篇皆疑”的警示。东汉史学家班固赞誉司马迁的《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记事符合历史实际是史志工作者最高的追求,也是对史志工作者最高的赞誉。志书的记述建立在资料的基础上,记述的真实主要源于资料的真实可靠。资料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收集要广,挖掘要深,整理要细,考证要详。资料搜集不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资料的补充、考证贯穿于修志的全过程。搜集资料的主要渠道有档案资料、专门著作、报刊杂志、口碑资料、影像资料和实物资料。在文字资料残缺或因时间久远而发生模糊、混乱的情况下,就需要请教当事人或知情人,以澄清事实或采集其他相关资料,弥补已有资料的不足或佐证史料。选取最有价值、最有权威、最符合实际的资料入志,最好是第一手资料,即原始资料,慎重对待二手资料,即转引的资料。对不一致的资料要认真地加以鉴别,对不符合事实的资料要坚决摒弃。通过广泛搜集、深入挖掘、严密考证、融会贯通、遣词造句而形成志稿,再广泛征求意见,认真讨论研究,反复进行修改,才能做到资料真实可靠,数据准确无误,避免失误和差错,再现历史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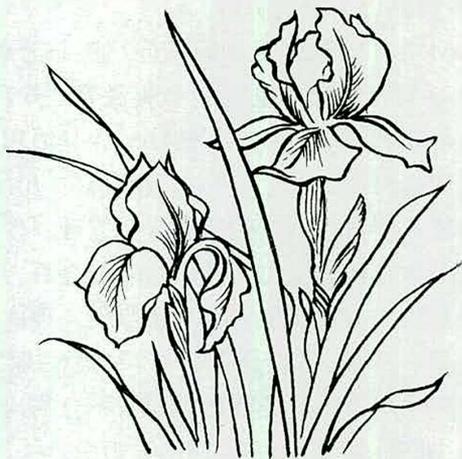
简洁在志书中有全方位的体现。表现在志书的体例上,按照学科和社会分工归类,层次清晰,排列有序。篇章节日以事命题,简单明了,准确涵盖记述内容。在行文结构上,不穿靴戴帽,开门见山,当机立断,不使用“根据”“按照”“为了”和“综上所述”“总而言之”等起承转合的词句及其段落。志书述而不作,叙而不议,寓观点于记述之中。撰稿人要通过选择运用来说明问题,用事实说话,不作空泛的分析、议论和评价。在语言文字上,志书惜墨如金、言简意赅、文约事丰,要用较少的文字包含较大的信息量。句子简短,不过多使用附加成分,少用形容词、语气助词、介词、副词。

尽可能不用表示时态的“了”“着”“过”,特别是“了”的使用频率不能过高。志书记述过去的事,不能了犹未了、没完没了。志书的简洁、简单、简化、简约,充分体现了“大道至简”的古训。

文雅主要是指志书的语言风格。志书是传世之作,语言文字要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志书是资料性著述,要在对资料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撰写,不能照抄照搬,要注意转换角度和表达方式,符合内在的逻辑,达到和谐有机统一。杜绝空话、大话、套话,不使用欧化的词语和不通用的新词,不使用文言句式和口语、方言、土语、俗语。当今志书都采用记述性语体文,语体文是指现行的规范的书面语言。在志书的《凡例》中一般都有此规定。内容全面,客观真实,直陈其事,只述不议,不事夸张,不加雕饰,朴实无华,简明扼要,言辞顺畅,特色鲜明,这些都是古往今来修志实践形成的最佳的表达方式和科学的选择,符合当今志书质量的总体要求。文风是语言文字的风格。志书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文风。志书特定的文风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当代修志工作者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

“事必求其详核,文必期于简雅”,用简明的语言高度概括的方志标准,为广大读者和史志工作者所认可,为地方志书树立起一座标杆,对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处长)



审定志鉴质量的步骤和方法

夏红兵

一部编纂合格的志书和年鉴(简称志鉴),必须做到内容符合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或者科学性;文字通顺,表达准确、简练、生动,形式新颖、形象;全书结构严谨,体例一致,数字、计量单位统一无误,标点正确,无错别字;图表完整清晰,版式设计合理;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由于志鉴编纂出版的特殊性——官修且多与出版单位采取协作出版的方式,出版社对于志鉴稿是否达到出版质量标准的审定,往往前移至志鉴总纂阶段——出版社审稿后志办仍对志鉴稿进行内容和版式上的修改。因此,志办所有编辑人员的努力是达到上述标准的基础,总纂人员专业的审定是志鉴符合国家有关出版物质量管理规定的保证。摆在志鉴编纂人员面前有三个问题:如何总纂和审定志鉴终审稿,如何使志鉴的出版达到国家规定的图书质量的标准,怎样算是合格的出版物。

2004年12月24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2005年3月1日实施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是我国目前管理图书质量的行政法规,其适用范围是对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图书出版单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包括志鉴)的质量进行管理。按照这个规定,志鉴稿送交出版社出版之前总纂人员必须对志鉴稿的编纂质量进行3个步骤4项内容的审查。第一步骤:审查是否存在“一票否决”的问题,志鉴中出现了这类问题就属于不合格出版物了。第二步骤:审查是否存在超过“万分之一红线”的问题,志书中编校、设计和印刷方面的差错超标

就属于不合格出版物。第三步骤:在公开出版前要对志鉴稿的编校质量进行自评。

第一步骤 审查志鉴稿中是否载有“一票否决”的内容

具体说,志鉴的总纂人员要按照下列4个要点审查内容质量:

一、内容质量标准

内容质量等级主要分为两类:

合格——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第25、27条的规定

不合格——不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第25、27条的规定

国务院2001年12月25日颁布、2002年2月1日起实施、2011年3月16日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5、27条是判定志稿内容质量等级的依据。凡是出版的志鉴书中有第25、27条禁止记载的内容均为不合格志书。

二、志鉴稿禁止记载的内容

审查志鉴稿的内容,是总纂人员的重心工作所在,具体审查是否有《出版管理条例》明令禁止的内容。主要涉及2条11款项:

(一)审查是否含有《出版管理条例》第25条明令禁止的内容。

1. 禁止有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内容。

例如:有关志书编修的指导思想,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即《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

输油管道、海上航空通道等等,以做到全方位的利用所有可利用的交通资源。

3. 发挥地理位置优势,建立海陆联运循环的大交通战略

我们纵观国内与国际,地理位置其实也是一种战略资源。

以国内来看,地理位置的优劣,决定着一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当我们放眼全球时,情况也是这样。从古到今我们虽不能说中华大地就是世界地理的中心,但是我们确实是有着这种天然的地理优势的。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开拓就是很好的实证。以目前的国际格局来看,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独一无二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发挥所长,利用好这种优势。这方面我们今后不仅要加强相关口岸的建设,还应当重视诸如现代导航、现代气象、现代通讯、现代大数据和现代物流集散地的建设。以保障货物的低成本和安全、合理的运输和配送。

综上所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适应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趋势。我国就必须建成一个内外相连、畅通无阻、四通八达的现代化、立体化的交通运输体系。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应把陆海空通道统筹规划,统一运作,统一布局,首先在

我国幅员辽阔的版图上,实现东西贯通、海陆贯通的大循环通道,实行宜海则海,宜陆则陆,海陆联运的原则,最终实现以中国为世界物流中心的全球化的陆海空及地下管网全方位的大通道、大循环格局。例如以陆海联运的方式,就可以通过中国大陆把欧洲、非洲、中亚、南亚与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及台湾地区的运输连接起来,使中国大陆成为广阔的物流平台和巨大交通枢纽,而不仅仅是一座桥梁。

这方面我们应当加强民航、铁路、公路、航海的联程联运服务研究。要打破行业壁垒、部门壁垒、区域壁垒,甚至打破国界限制,一切以服务对象为中心。不能各自为政,恶性竞争。这种联程联运的好处是,多种方式混合,一站式服务,尤其适合于远距离、大跨度、大密度物流的需要,可以发挥不同运力和地域的各自优势,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节约时间,减少手续,方便客户,适合未来现代经济社会的需求。

展望未来,上述设想如果加上我国的人力资源和制造业优势,未来的中国成为世界级的物流中心就不是一种梦想了。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省政府参事)



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

志鉴稿中记述的历史事件,要注意中共中央对此最新的决议。对于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政策方针的认识和评价,要做到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允许持否定或怀疑的态度。

例如,有的志鉴稿将有关“文化大革命”活动记述为:“通过运动,共破获反革命集团13个,挖出现行反革命分子207人,查出历史反革命分子228人。”这样的记述会给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造成歧义。对于这类事项,一定要注意背景情况的介绍(要加注释),注意编纂者的立场。上段话中的“反革命集团”“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按照《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如果已经全面平反,就应该记述为:“通过运动,共破获所谓的‘反革命集团’13个,挖出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207人,查出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228人”。将执政党的观点贯穿在记述之中,这才是事实就是的态度。

2.禁止有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内容。

例如:使用地图时,行政区划图要注意国境线的准确性;不可遗漏钓鱼岛群岛、南海诸岛,而且比例尺务必准确。

要注意新华社公布的涉及我领土、主权和港台澳新闻报道中的禁用词。香港、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任何文字、地图、图表中都要特别注意不能将其称作“国家”。不得将台湾、香港、澳门与中国并列提及,如“中港”“中台”“中澳”等。可以使用“内地与香港”“大陆与台湾”或“京港”“沪港”“闽台”等。

对南沙群岛不得称为“斯普拉特利群岛”,钓鱼岛不得称为“尖阁群岛”。

3.禁止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内容。

哪些属于保密范围,《新闻出版保密规定》([1992]国保34号)第五条规定:“新闻出版单位和提供信息的单位,应当根据国家保密法规,建立

健全新闻出版保密审查制度。”第七条规定:“新闻出版单位和提供信息的单位,对拟公开出版、报道的信息,应当按照有关的保密规定进行自审;对是否涉及国家秘密界限不清的信息,应当送交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上级机关、单位审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对涉及国家秘密但需公开报道、出版的信息,新闻出版单位应当向有关主管部门建议解密或采取删节、改编、隐去等保密措施,并经有关主管部门审定。”《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应当组织有关保密、档案、历史、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参加”。

从笔者审读的志鉴稿看,军事部类问题较多,凡是设军事部类的志鉴,要特别注意审查验收阶段军事专家的意见,请军事专家参加初审和终审志鉴稿的步骤绝对不能缺失,这方面目前比较薄弱。

4.禁止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内容。

5.禁止有宣扬邪教、迷信的内容。

6.禁止有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内容。

7.禁止有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内容。

8.禁止有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

例如:有的志稿在卫生章节中记述医疗事故或者重大医疗技术突破等方面的事项时,把一些病人的真实姓名及病历写出来,东部省份的县市将当地接收的三峡移民的真实姓名、现在住址、身份证号码一一列举出来,等等,均涉及个人隐私权的问题。又如:志鉴稿中使用图片或书法、绘画作品,要取得著作权人的使用许可,避免出现著作权方面的纠纷。

9.禁止有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志鉴稿要避免将一些社会陋习作为当地民俗记述,避免将一些“三俗”语言作为方言记述。例如,有些志鉴稿误将官场吃喝时使用的一些酒令

作为民俗予以记述。这些内容应该归在腐败现象内容中记述。

10.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二)审查是否含有《出版管理条例》第27条明令禁止的内容。

【链接资料】第二十六条 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志鉴司法部类中不要记述未成年人犯罪和被强奸的内容。

“考镜源流求其真”,志稿不能因“内容不真实或者不公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

第二步 审查志鉴中编校、设计和印刷方面的差错率是否低于“万分之一红线”

一、审查编校(含编辑加工整理和校对)质量

志鉴进入出版阶段时,出版社对于志鉴稿要进行三审、三校。受政府采购的约束,志鉴书的印刷多由地方政府负责。这就要求志鉴稿总纂人员具有较高的出版专业水平。其中,有两点要特别注意:一方面,编纂人员必须达到出版单位编辑对书稿的审校水平,掌握必需的国家现行的有关出版方面法律、法规、国家标准、方针政策等专业知识;另一方面,由于有关这方面的文件是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等部门对口下发到出版单位的,地方志系统很难及时了解 and 掌握这方面的规定,从而加大编纂人员对志鉴稿总纂和审查的难度。

(一)编校质量标准

编校质量等级主要分为两类:

合格——差错率低于万分之一

不合格——差错率高于或等于万分之一

编校质量2个等级标准:差错率不超过1/10000的为合格,差错率超过或等于1/10000的为不合格。举例来说,大16开版本的志稿如果每页是38行,每行38个字,也既是说每页有1444字,这就意味7页内容只能出现不超过1分的差

错。

对于判定编校质量等级的依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五条进行了规定:“图书编校的判定以国家正式颁布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相关行业制定的行业标准为依据。”这就需要志鉴的编纂人员平时要注意学习相关规定,要及时掌握国家最新的相关法律、法规、国标和政策。

(二)编校差错类型

具体来说,编校差错主要有9个类型:

错字、别字、多字、漏字、倒字差错

自造简化字、同音代替字及混用简繁体字的差错

外文、少数民族拼音文字、国际音标、汉语拼音差错

外文缩写词大小写的错用,不同文种的单词、缩写词的差错

字词差错 外文中文的人名、地名、国家和单位等专用名词词首大小写的差错

误解词义

误用异形词、成语

使用缩略语造成误解

人名、地名、单位名称不正确

阿拉伯数字用法差错

编校差错类型 数字用法差错

汉字数字用法差错

标点符号和其他符号的差错以及格式的差错量和单位的中文名称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差错

知识性、逻辑性、语法性差错

一般性的科学技术知识差错

(三)志鉴编校差错率的计算方式

志鉴编校差错率是指一本志鉴的编校差错数占总字数的比率,用万分比表示。实际鉴定时,可以依据抽查结果对全书进行认定。如审查的总字数为10万,审查后发现两个差错,则其差错率为0.2/10000。

志书总字数的计算方法,一律以该书的版面字数为准,即:

总字数 = 每行字数 × 每面行数 × 总面数

具体计算方法包括7项:①除环衬等空白面

不计字数外,凡连续编排页码的正文、目录、辅文等,无论是否排字,均按一面满版计算字数。分栏排版的图书,各栏之间的空白也计算版面字数。②书眉(或中缝)和单排的页码、边码作为行数或每行字数计入正文,一并计算字数。③索引、附录等字号有变化时,分别按实际版面计算字数。④用小号字排版的脚注文字超过5行不足10行的,该面按正文满版字数加15%计算;超过10行的,该面按注文满版计算字数。对小号字排版的夹注文字,可采用折合行数的方法,比照脚注文字进行计算。⑤封一、封二、封三、封底、护封、封套、扉页,除空白面不计以外,每面按正文满版字数的50%计算;版权页、书脊、有文字的勒口,各按正文的一面满版计算。⑥正文中的插图、表格,按正文的版面字数计算;插图占一面的,按正文满版字数的20%计算字数。⑦以图片为主的图志,有文字说明的版面,按满版字数的50%计算;没有文字说明的版面,按满版字数的20%计算字数。

审查志稿编校差错把握3个方面:①文字差错(9项)的计算标准;②标点符号和其他符号差错(6项)的计算标准;③格式差错(7项)的计算标准。

图书编校差错的计算方法

编校差错种类	每处计差错个数
1. 文字差错	
封底中的一般性错字、别字、多字、漏字、倒字	1
勒口中的一般性错字、别字、多字、漏字、倒字	1
版权页中的一般性错字、别字、多字、漏字、倒字	1
正文中的一般性错字、别字、多字、漏字、倒字	1
目录中的一般性错字、别字、多字、漏字、倒字	1
出版说明(或凡例)中的一般性错字、别字、多字、漏字、倒字	1
前言(或序)中的一般性错字、别字、多字、漏字、倒字	1
后记(或跋)中的一般性错字、别字、多字、漏字、倒字	1
注释中的一般性错字、别字、多字、漏字、倒字	1
索引中的一般性错字、别字、多字、漏字、倒字	1
图表中的一般性错字、别字、多字、漏字、倒字	1

	附录中的一般性错字、别字、多字、漏字、倒字	1
	参考文献中的一般性错字、别字、多字、漏字、倒字	1
	前后颠倒字,可以用一个校对符号改正的	1
	书眉(或中缝)中的文字差错	1
	同样性质的差错重复出现	全书按一面差错基数加1倍计算
(2)	同一错字重复出现	每面计1个,全书最多计4个
	每处多、2-漏个字	2
	每处多漏5个字以上	4
(3)	封一上的文字差错	2
	扉页上的文字差错	2
	相关文字不一致	有1项计1个
(4)	外文以一个单词为单位,无论其中几处有错	1
	少数民族文字以一个单词为单位,无论其中几处有错	1
	国际音标以一个单词为单位,无论其中几处有错	1
	汉语拼音不符合《汉语拼音方案》规定	1
	汉语拼音不符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规定	1
(5)	字母大小写和正斜体、黑白体误用	0.5
	不同文种字母混用	0.5
	字母与其他符号混用(如把汉字0错为英文0字母)	0.5个(同一差错在全书超过3处,计5个)
(6)	简化字、繁体字混用	0.5个(同一差错在全书超过3处,计1.5个)
2. 数字用法差错的计算标准		
(1)	阿拉伯数字差错,无论几位数	1
(2)	罗马数字差错,无论几位数	1
(3)	阿拉伯数字用法不符合《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规定》	0.1个(全书最多计1个)
(4)	汉字数字用法不符合《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0.1个(全书最多计1个)
3. 标点符号和其他符号差错的计算标准		
	标点符号的一般错用	0.1
(1)	标点符号的一般漏用	0.1
	标点符号的一般多用	0.1
(2)	小数点i误为中圆点,或中圆点误为小数点的	0.1
	冒号误为比号,或比号误为冒号的	0.1
	专名线错位、多、漏	0.1
	着重点的错位	0.1
(3)	破折号误为一字线	0.1
	破折号误为半字线	0.1
	标点符号误在行首	0.1
	标点符号误在行末	0.1
(4)	外文复合词按音节转行	0.1个(同样差错在每面超过3个,计0.3个差错,全书最多计1个差错)
	外文单词按音节转行	0.1(同样差错在每面超过3个,计0.3个差错,全书最多计1个差错)

	漏排连接号的	0.1 (同样差错在每面超过3个, 计0.3个差错, 全书最多计1个差错)
(5)	图序标注差错	0.1个 (全书超过3出, 计1个)
(6)	表序标注差错	0.1个 (全书超过3出, 计1个)
(7)	公式序标注差错	0.1个 (全书超过3出, 计1个)
(8)	乐谱符号	0.5个 (同样差错同一面内不重复计算, 全书最多计1.5个)
4. 量和单位的中文名称不符合国家标准差错的计算标准		
(1)	法定计量单位符号差错	0.5个 (同样差错同一面内不重复计算, 全书最多计1.5个)
(2)	使用计量单位不符合国家标准《量和单位》的中文名称的	1个 (同一差错多次出现, 每面只计1个差错, 同一差错全书最多3个)
(3)	科学技术各学科中的科学符号	0.5个 (同样差错同一面内不重复计算, 全书最多计1.5个)
(4)	使用科技术语不符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规范词的	1个 (同一差错多次出现, 每面只计1个差错, 同一差错全书最多3个)
5. 知识性、逻辑性、语法性差错的计算标准		
(1)	知识性	2
	逻辑性	2
	语法性	2
6. 格式差错的计算标准		
(1)	影响文章的、不合版式要求的另页	0.1
(2)	影响文章的、不合版式要求的另面	0.1
(3)	影响文章的、不合版式要求的另段	0.1

总纂人员通过对志鉴稿的审查,不但可以提升志稿的编校质量,而且可以因志稿质量达到合格出版物的标准缩短出版周期。

(四)审查编校内容差错率是否越红线——超过万分之一

1. 审查是否有文字方面的差错

审查全书中是否有错别字、多字、漏字、颠倒字;审查全书中是否有已明令停止使用的异体字、不符合《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字形规定的旧形字,以及汉语拼音和外文等方面的差错。

2. 审查词语是否规范

(1)审查全书引用的缩写词、缩略语、简称是否造成误解,是否符合规范性并前后统一。

(2)审查人名、机构名、地名是否正确,是否符合规范并前后统一。其中,知名度高的外国人的译名以新华社译名手册为准;国外地名的译名以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最新地图和地名录为准;

小的地方之前需冠以省、市、地区名称;小单位之前需冠以大的地域和高一级领导单位名称。

(3)审查新词语使用是否规范

要注意流行语言的使用,越是时代性强的语言传承性越弱。志书编纂中应该使用规范的字词,使用流行语言时要对其内涵进行注释。2012年5月29日教育部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人的语言中冒出了594条新词语,在造词热的同时,新词语消亡的速度也在加快,6年前的新词,现在只有4成能够“存活”。

就志鉴中新词语的使用情况而言,对于高频词语,可参照《桂林市志(1991—2005)》在《凡例》后面设一个《专门用语原型词及其缩略语》对照表,也可以采取随文页下注释或随文注释的方式进行规范。对于低频词语,适于采取随文页下或随文注释的方式进行规范。

3. 审查数字用法是否规范

审查数字计算结果、统计结果是否正确;审查阿拉伯数字的书写是否符合规则;审查阿拉伯数字及汉字数字的使用是否正确。

志鉴稿中常见数字用法的问题,主要是阿拉伯数字和汉字数字使用不规范。为达到醒目、易于辨识的效果,应采用阿拉伯数字;如果要突出庄重典雅的表达效果,应该使用汉字数字。

如果表达计量或编号所需要用的数字个数不多,选择汉字数字还是阿拉伯数字在书写的简洁性和辨识的清晰性两方面没有明显差异时,两种形式均可使用。

4. 审查标点符号和其他符号用法是否规范

志鉴稿中常见的使用不规范的标点符号主要是书名号和连接线。

(1) 审查书名号使用是否规范

书名号的基本用法	书名号使用扩大化
标示书名、卷名、篇名、刊物名、报纸名、文件名等	物质产品名、商品名、商标名
标示电影、电视、音乐、诗歌、雕塑、栏目、光盘、图片等各类用文字、声音、图像等表现的作品名称	课程名、活动名、展览名、集会名
标示全中文或中文在名称中占主导地位的软件名	证件名、奖项名、称号名
标示作品名的简称	单位名、组织名

(2) 审查连接号使用是否规范

连接号的形式有短横线“-”、一字线“—”和浪纹线“~”三种,其各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志稿中常见三者使用不规范。连接线规范用法见下表:

连接号的种类	连接号的基本用法
短横线“-”使用情况	化合物的名称或表格、插图的编号
	连接号码,包括门牌号码、电话号码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年月日
	在复合名称中起连接作用
	某些产品的名称和型号
	汉语拼音、外来语内部的分合
一字线“—”使用情况	标示相关项目(如时间、地域等)的起止
浪纹线“~”使用情况	标示数值范围(由阿拉伯数字或汉字数字构成)的起止

5. 审查量和单位的中文名称使用是否规范

195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对送审稿中使用的计量单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事项时,应该一律用法定计量单位。特殊地方必须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也应该括注同比例法定计量单位。

(1) 审查全书中是否使用国家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制

志鉴稿中常见的非法定计量单位主要是:亩(1公顷=15亩,1亩=666平方米)、马力(1马力=735.49度)、石(1市石=50公斤)、斤(1公斤=2斤)。

目前,国家技术监督局对于记述农业事项仍允许使用“亩”作为计量单位。为此,如果编者记述农业方面事项时仍要使用“亩”,须在《凡例》里对于非法定计量单位“亩”与法定计量单位“平方米”的换算比例——“1亩=666平方米”进行说明,然后方可在正文中使用“亩”。要注意的是,仅仅限于记述农业事项时可以使用“亩”,建筑上不能用“亩”。对于不便换算的非法定计量单位,如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10000万元/亩”,不便于记述为“土地出让金10000万元/666.67平方米”,可采取括注的方式,即“土地出让金10000万元/亩(666.67平方米)”。

(2) 审查全书数码、代号、单位国际符号书写是否准确并符合规范

志鉴稿中常见的错误主要是混淆英文字母大小写。如:酸碱度“pH”值常被误记述为“PH”;长度公里的字母“km”常被误记述为“KM”或“kM”;表示功率的千瓦“kW”常被误记述为“KW”;表示电压的千伏“kV”常被误记述为“KV”;等等。

6. 审查是否有违背科学性方面的问题

审查志鉴稿中表述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是否准确,论点及使用科学术语是否正确;审查引用的有关历史史料是否翔实,是否符合史实;审查引用的文字及数字资料是否准确;等等。

众所周知,记述经济部类时篇目名称和排序应该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然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于1984年首次发布以后,分别于1994年、2002年、2011年进行了3次修订。从已经公开出版的二轮志书看,一些篇目立目不科学,篇目名称未突显时代特点,有的还是按照20世纪社会门类立目。例如:GB/T 4754—2011相对GB/T 4754—2002而言,多了“社会工作”大类,取消了“社会福利”大类。从2012年一些送审和出版的志书篇目看,“社会工作”类目普遍缺失。

再如,“消费物价指数(CPI)”涉及居住、食品、烟酒、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八大类商品,但是,志鉴稿中有关“物价管理”篇目鲜见记述时限范围内这八大类商品价格变化内容。

7. 审查语法错误

审查是否有违反语法规则、违背逻辑事理、不合本民族语言习惯的语句。

三、审查设计质量

(一) 设计内容

“设计”所包括的4部分:

1. 图书的整体设计

主要包括正文的版心、眉题、正文用字、下面2—4项的内容、正文用纸、插图用纸、装帧等。

2. 封面——包括封一、封二、封三、地封、勒口、护封、封套、书脊

二轮续志的装帧不能停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水平,在装帧设计上要有特色,要突出时代特点。例如:2010年出版的《桂林市志(1991—

2005)》在设计上庄重、大气、传统、典雅的特质,体现了21世纪的装帧设计水平,是一部设计、装帧、印刷方面的精品。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封面材质选用棕色仿皮特种纸。二是封面设计采用中国传统竖版书法做底衬,在设计好的古宣纸竖写格图案中,凸现古今名人赞誉桂林的名诗佳句。三是封面装帧采用了目前先进的热压机凸的特殊工艺。四是内扉页版面设计达到最大限度且合理的利用率,即:正面不但载有篇名,而且载有篇下一级标题章名,为读者提供便利的检索条件;背面载有本篇撰稿人、通稿人、编辑人员和副主编的姓名。

3.扉页——包括书名页和版权页

要特别注意5点:

(1)书名页、封面书脊、版权页上的书名、作者和出版单位必须与CIP数据中相同的记述一致。

(2)扉页正面(单页)为扉页,背面(双页)为版权页。

(3)书脊厚度大于5毫米的图书及其他出版物,应该设计书脊;图书和其他出版物及其护封的书脊名称,应与其封面、书名页上的名称一致,不应有文字或措辞的变化;一般图书书脊上应设计主书名和出版者名称(或标志),如果版面允许,还应加上著者或译者姓名,也可加上副书名和其他内容。

(4)书名页包括本册图书书名、作者、出版者、版权说明、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版本记录等内容,包括扉页和版本记录页;扉页提供图书的书名、作者、出版者;书名包括正书名、并列书名及其他书名信息;作者名称用全称;出版者名称用全称,并标出其所在地;版本记录页提供图书的版权说明、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和版本记录,位于主书名页的背面,即双数页码面。

(5)图书在版编目数据——CIP数据,不能有任何的擅自改动。包括行数、文字、符号等。

4.插图

“图”作为志书7个主要记述手段之一,图释是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般图释应该包括五个要素,即五个“W”:什么事(What,何事)?谁被牵

连到这个事件之中(Who,何人)?这个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When,何时)?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Where,何地)?为什么发生这个事件(Why,何故)?有的还要加上一个H(How,怎么样)?

例如:首轮新编《徐州市志》文前彩色插图中的图释:

《徐州黄牛》——遗漏何故;《德国客人在徐州》——遗漏了何时、何故;《XXX来徐州视察》——遗漏了时间;《无图、多功能微循环仪和电脑乳腺诊断仪》——遗漏了何时、何人、何地、何故;《城区中心古彭广场》《徐州城区鸟瞰》——遗漏了何时。

(二)设计质量标准

主要包括合格、不合格2个等级标准。图书整体、封面、扉页、插图4项的设计均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其设计质量属合格;上述4项的设计中有一项的内容不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其设计质量属不合格。

合格:封面(包括面封、封二、封三、封底、勒口、护封、封套、书脊)、扉页、

插图等,能够恰当反映图书的内容,格调健康,全书版式设计统一,字体、字号使用合理的

不合格:①封面(包括面封、封二、封三、封底、勒口、护封、封套、

书脊)、扉页、插图等设计,不能够恰当反映图书的内容,或格调不健康,或全书版式设计不统一,字体、字号使用混乱,其设计质量属不合格。

②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危害国家安全违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宣传淫秽色情和凶杀暴力等内容。

③凡形式上不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

(三)审查版面格式的内容

审查全书结构是否完整,是否符合凡例(编辑说明)的规定;审查全书篇、章、节是否完整,顺序是否正确;审查目录与正文标题是否一致;审查图表序号是否连贯、编排是否合理;审查封面设计与正文内容是否相符;审查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是否符合国家标准,书名、作者、出版社及出版年份是

否著录完整。

已出版的志书中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封面、书名页、CIP数据中的书名、作者、出版时间不一致。1997年出版的《滦平县志》，面封的书名为《中国地方志丛书·滦平县志》、扉页的书名为《中国地方志丛书·滦平县志》，而CIP数据中的书名为《滦平县志》，而CIP数据中的书名是国家确定的书名；面封上的作者为“河北省滦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扉页上的作者为“河北省滦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主编XXX、XXX、XXX”，CIP数据中的作者为“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其中受国家著作权法保护的是CIP中的作者。再如《磁县志》，面封上的作者为“河北省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扉页上的作者为“河北省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主编XXX”，CIP数据中的作者为“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面封上的出版时间为“二〇〇〇年十二月”，而CIP数据中的出版时间为“2000.1”。CIP对于一本图书来说，就像是人的户口一样，其中的书名——“姓名”、作者——“父母”、出版时间——“生日”、出版单位——“接生医院”、ISBN号——“身份证号码”。这几项内容都是唯一的，在全世界都不可能雷同的，否则就是侵权。所以，编纂人员在与出版志书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给志书“报户口”的事项。

四、审查印制质量

《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印刷质量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行业标准——《印刷产品质量评价和分等导则》(CY/T2-1999)，这也是判定印刷质量等级的依据。

印刷质量等级标准：

合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行业标准《印刷产品质量评价和分等导则》

印制质量(CY.T2-1999)规定的图书

不合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行业标准《印刷产品质量评价和分等导则》

(CY.T2-1999)规定的图书

第三步 编校质量评定的标准及方法

志书的总纂者，对于通过终审的志稿的编校质量可以按照两个标准——内部评定标准和国家

合格出版物的评定标准，进行一次自我评定。

一、评定标准

(一)内部评级标准

1997年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将图书的质量分为4个等级：

优秀：差错率在0.25 / 10000以下

良好：差错率在0.25 / 10000-0.5 / 10000之间

合格：差错率在0.5 / 10000-1 / 10000之间

不合格：差错率高于1 / 10000

这个标准对出版物的要求比较具体和严格，细化了不同标准等级，可以作为内部评级标准，也可以作为精品编校质量志书的评定标准。

(二)国家现行合格出版物的评定标准

2005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将出版物的简化为2个等级——合格、不合格，即差错率低于万分之一以下的合格图书的质量不再分合格、良好、优秀。

二、编校质量评定方法

对志稿进行上述各项总纂和审查步骤后，在送交出版单位之前，还应该对志稿的8个具体质量范围实施审查。

(1)正文(抽查必须内容或页码连续且不少于10万字，全书字数不足10万字的必须审查全书)；

(2)封面——封一、封二、封三、封底、勒口、护封、封套、书脊；

(3)扉页；

(4)版权页(送印制单位之前审查)；

(5)前言(或序)；

(6)后记(或跋)；

(7)目录；

(8)插图及其文字说明。

总之，为了保证编纂出一本精品志书，担任对志稿总纂和审查工作人员的责任重大，国家现行的有关出版方面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行业标准，为我们提供了保证志书编纂和出版的依据和标准。

(作者系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志鉴编校中心总编辑)

省志编纂工作的实践和思考

刘娟

省志的工作模式一般为：省直部门负责其分志编纂工作的组织启动、机构设立、人员选聘和经费保障，并承担业务培训、资料搜集、初稿撰写，组织召开评议会，修改完善志稿等任务，志稿经省史志办总纂后出版。这就决定了在省志工作中，省直部门是主角，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业务水平直接关系到整个省志工作的进度和质量。承编单位的机构调整、人事变动、干部轮岗、工作重点的变化，甚至修志人员的情绪波动，都有可能使正在进行的修志工作回到零起点。一部省志由数十部分志组成，几十个分志编委会，几十位分志主编，要做到编纂标准统一，文体文风一致，出版质量全优，在内容和形式上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的确不易。

二轮修志中，如何使省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工作方法和编纂要求符合省志工作实际，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新情况？回顾几年来从事省志工作的实践，我的体会是：省志工作要又好又快地发展，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省志编纂的实际出发，不断创新服务理念，加强业务规范，以服务推动工作的开展，以规范提高志书的质量。山东省在省志编纂工作中，认真总结首轮修志工作的经验教训，加强对省直承编单位修志工作的服务和协调、指导，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提高志书编纂出版质量，推动了整个省志工作的开展。目前，规划编纂的78部分志已出版5部，正在总纂及评议后修改的6部，进行初稿内评修改的12部，撰写初稿的19部，编写资料长编的18部，搜集资料的11部，启动阶段的2部。省直承编单位

的修志工作按省史志办的计划要求，基本形成梯次工作格局，已出版志书质量比首轮修志有明显提高。

一、树立服务的工作理念

(一)与承编单位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全省修志工作中，省史志办是主管部门。在省志编纂工作中，省史志办与省直承编单位应是业务上的指导关系，工作上的联系关系，事业上的伙伴关系。二者之间不是上下级，也不需要企求对方。我对你业务指导，协调督促，有利于你开展工作；你前期工作水平高，我后期志稿总纂质量才有好的基础；你完成了任务，我才能完成任务。省史志办与承编单位是相互依存、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二者只有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才能收到双赢、共赢的效果。省史志办应改变工作作风，由管理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部门修志人员着想，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诉求，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二)摒弃“催耕催种”的工作模式，实行全程介入、跟踪服务。省志分志由省直单位负责编修，编纂的进度和质量主要取决于省直单位。省史志办作为修志工作的主管部门，不仅负有总体的组织、协调、指导、督促职责，而且承担志书总纂、出版的最终责任。要改变“等”承编单位开展工作的思维定势，把我(省史志办)摆进去，自部署工作开始，就与承编单位一起“共同”进入角色，对志书编纂实行全程介入、跟踪服务。

(三)鼓励承编单位积极探索，实践创新。此修

志(第二轮修志)已不是彼修志(首轮修志)。要破除因循守旧思想,改变一个思路、一套办法一成不变、一管到底的做法,适应修志工作的新发展新变化,用新的眼光、新的视角观察、研究问题。要重视一线承编单位的实践创新和新鲜经验,鼓励新思路、新模式的产生和运用,以创新促进发展。

(四)努力培养方志工作者的两种能力、两种本领。各级修志机构具有双重职能:一是组织管理职能,二是业务编纂职能。方志工作者应既长于组织协调、管理指导,又能出色地从事志书的编纂业务。省志工作者尤需如此。承编单位在初稿撰写过程中,省史志办人员组织管理能力的强弱左右着该承编单位修志工作的进度和效率;志稿总纂过程中,省史志办编辑业务水平的高下决定了志书质量的优劣。

二、探索适宜的工作模式

(一)加强工作联系。二轮修志以来,山东省史志办与省直承编单位的工作联系更加密切,联系的方式与交流的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经常性的联系促进了工作的交流和沟通,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理解,加深了彼此的感情和友谊,增强了修志工作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年度工作会:山东省每年召开一次全省史志工作会,由省政府通知省直承编部门、单位的分管领导和史志办主任参加会议。省志工作的进度、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要求均写入分管省长的讲话和省史志办的工作报告中。每年全省工作会均挑选若干省志工作开展较好的单位作大会发言,介绍经验。全省性会议规格高、影响大,对激励先进、督促后进、提振信心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分阶段培训:将省志的整个编写过程分为篇目设置、资料搜集、长编编写、初稿撰写、评议总纂、出版印刷等几个大的业务阶段,根据多数分志的工作进度,在每转入下一阶段之前,由省史志办组织各承编单位参加的转段前业务培训,每年1-2次,规模100人左右。

对口交流:省史志办根据工作需要,经常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工作调度会和志稿讲评会等小型会议,组织十几个业务相近或工作进度相同的单

位参加。会后各承编单位根据会议的内容和要求,分别召开工作会、培训会,省史志办省志处有关人员按工作分工到会议现场释疑解惑。

上门走访:省史志办省志处每人都负责联系、指导十几个省直承编单位,经常到承编单位走访,每个编辑平均每星期拿出半天的时间走访。承编单位也经常来访。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既是工作沟通,又是直接的业务研讨,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同时,也是一种感情交流。

联系点制度:省史志办省志处同志在抓好自己分工负责的省志分志的同时,每人确定一个分志作为自己的联系点,参与该分志编写工作的全过程。

(二)实行分类指导。针对省直承编单位修志人员的编纂业务水平参差不齐的实际,除全省集中培训外,省史志办还加强相关的业务指导。业务指导贯穿修志工作的全过程,如业务座谈,疑难问题解答,篇目研讨,试写稿讲评,专题交流等。在分志篇目制订阶段,我们对篇目制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规范了报批程序。对每一部分志的篇目,省史志办都要认真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并与承编单位一起修改完善,最后由省史志编委会批复,其间要经过三四个来回。对部分省直承编单位,省史志办从工作方案的拟制、篇目的制订、资料的搜集到资料长编编写、初稿的撰写、讲评等,逐个逐项进行讲解辅导。少数单位甚至从修志的基本知识讲起。正是从这种手把手、面对面的业务指导开始,省直承编单位的修志人员认识了史志,了解并逐步开始了比较规范的修志工作。

(三)帮扶后进单位。省志编纂中,总会有一部分单位工作相对滞后,影响修志工作的总体进程,对此,我们采取关注、走访、帮扶的做法。每年召开1-2次有十几个部门参加的后进单位座谈会,督促其尽快开展工作;以上门走访形式向承编单位分管领导通报全省修志情况,确定下一步工作计划;分析后进原因,协调有关方面改善或解决存在的问题。二轮修志开始后,省志工作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部分省直工业厅局改革、改制为行业办或行业协会后,职能、人员、经费发生很大变化,开展

工作困难很多,个别先行启动工作的单位,受经费、人员问题的困扰,修志工作无法坚持下去。省史志办向省财政厅作了专题汇报,建议财政部门在经费上给予支持。省财政厅对修志工作十分支持,为行业办、行业协会增拨了专项资金,保证了这些单位修志工作的正常进行。

(四)制定业务规范。二轮修志以来,山东省志工作陆续制定、出台了《续修新方志工作纲要》《山东省志编纂通则》《省志编纂业务规定》《省志志稿审查验收规定》《省志总纂工作规定》《省志编纂若干业务问题的规定》《行文规定》《送审稿版式规定》《大事记收录标准》《人物志收录标准》等10个业务规范性文件。严格的编纂、审查、验收工作程序和业务规范,为把《山东省志》编纂成为体例完备,文风一致,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高质量志书提供了制度保证和审查验收标准。

(五)抓好典型示范。第二轮修志,山东省确定了“典型示范、以点带面、稳步推进、质量第一”的工作方针。几年来,总结、推广了省工商局依法修志、开门修志、全员修志的经验;省水利厅、山东黄河河务局以课题形式组织撰写资料长编的经验;省公安厅、济南铁路局搜集资料大兵团作战,撰写初稿由专家组承担的经验;省国税局先试写部分初稿,讲评后再铺开的工作经验;省政法委、省烟草公司对志稿多次评议、反复修改的经验;省民政厅实行逐级审稿责任制的经验等。为使志书质量标准要求看得见、摸得着,具体、形象、直观,有可操作性,从2007年开始,每年推出一部新出版的省志分志。截至目前,分别推介了《山东省志·工商行政管理志》《山东省志·铁路志》和《山东省志·税务志》,供省直承编单位评议借鉴,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重点志书的编纂,我们采取全程跟踪、工作倾斜的方法,从志书编纂的指导思想、篇目设计到资料搜集、志稿撰写以及评审修改等各个环节提前介入,重点指导,具体帮助解决编纂过程中的难点问题,使志书既符合第二轮修志的总体质量要求,又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

三、建立互动的工作机制

(一)实事求是地调整工作计划。省史志办在制

定省志工作规划、计划和具体要求时,事前均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并照顾省直承编单位的实际情况。执行过程中,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原定的计划、要求客观上无法执行时,从实际出发,对原计划、要求作出部分调整。二轮修志,山东省原规划编纂一部《山东省志·税务志》,由省国税局和省地税局共同承担。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税务机构分设前的税务内容无人承担,致使税务志篇目拟订工作陷入停顿状态,人员、经费迟迟不能到位。为解决这个矛盾,税务部门提出将税务志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税务机构分设前的税务内容和国税内容,由省国税局承编,下册为地税内容,由省地税局承编,并向省史志办写出了调整报告。调整方案分工合理、责任明确,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省史志办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及时审查、批复了分志篇目,税务志的编纂工作又重新紧张有序地开展了起来。

(二)编发《省志续修工作》简报。二轮修志开始后,山东省史志办决定专门编发省志工作简报,把中指组、省史志办的指导意见,省志各承编、参编部门、单位开展工作的做法和经验、措施与现状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及时向省委、省政府和省直各部门、单位通报。这几年,每年编发《省志续修工作》简报17—18期,发稿100多篇,信息涉及省直几十个部门、单位。

(三)成立省志续修工作协作组。为加强省直各承编部门、单位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本着业务相近、进度相似、规模相当的原则,成立了5个省志续修工作协作组。每个协作组均有1名省史志办省志处同志做联络员。每次活动,承办单位都请厅领导参加会议并讲话,各成员单位交流工作、做法,省史志办通报情况,提出要求,活动结束后都有单位主动申请承办下次活动。这一活动形式符合省志工作的实际,便于省史志办组织协调,也有利于承编单位间的相互沟通,促进了省志工作的开展。

(作者系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凡例的写法

朱光临

所谓凡例,即发凡起例之意。发凡即指阐明全书宗旨、大纲和概要;起例即指拟定著述的思想、原则、体例、格局、样式等。

一、作用和内容

1.作用。凡例的文字虽然不多,但其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其一,它对志书编写起着指导和规范作用。这是凡例的主要功能。其二,它能帮助读者读志用志。一部志书有了一个详密的凡例,那么对于读者来说,就等于有了可遵循的阅读指南。读者就可以凭借凡例获得阅读之大纲,知晓全志之大要,赢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内容。就抽象而言,修志凡例内容就是修志方案内容的具体化,就是在可操作层面上,具体回答“为什么修、修什么和怎么修”的问题。凡例内容可归纳为三类:一为通例,即贯通全书且对各分志编写均有约束力的部分。二为分例(或称专例),即对某些内容和某些分志具有约束力的部分。三为特例,即用于处理本志某些特殊问题的一些原则和方法。综合当代学者的意见,新志编修凡例当包括这样诸方面的内容:(1)规定编纂思想;(2)规定编纂目的、目标和读者对象;(3)规定编纂原则;(4)规定志书体式;(5)规定时间断限和记述范围;(6)规定体裁构成和层次结构;(7)规定记人原则;(8)规定行文要则;(9)说明资料来源;(10)规定对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理原则和方法。

二、制订和要求

1.制订。在修志方案制定之后,就应该把凡例制订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草拟于编修之先,修订于编修之中,定稿于编修之末,这就是凡例制订的基本流程。在修志伊始所草拟的凡例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随着修志人对于地情认识的逐步深入和修志实践的不断发

展,就应适时对凡例条文进行增删、修改。在志书定稿之后和付印之前,还应该以“言行一致”为准则,再对凡例作一次全面审订、修改,并以读者为主要对象将语气加以改变。如把“应该”“必须”之类的词语改为“采用”“通过”之类的词语。这样凡例便由编者的编纂法则变为读者的阅读指南。

2.要求。如果说修志是一门学问和一种学术,那么制订凡例则是其中的一个攻坚课题。人们制订凡例的过程就是把方志编纂理论、编纂指导思想与具体编纂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修志凡例的优劣直接反映其编者的学识和胆识。作为一个成功的凡例,它应该符合如下两个要求:

(1)知行统一,虚实结合。撰写凡例既不同于一般的理论性阐述,也有别于一般的技术性说明。作为一个成功的凡例应该做到方志编纂观和编纂法叙述的有机统一,既要有足够的条文说明编纂宗旨和思想,又要有足够的条文说明为实现既定的宗旨和思想而规定的编纂原则和方法。也就是说,志书编纂者不仅要通过凡例说明自己对编纂指导思想的理解和认识,还要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志的编纂思想,以规范众人的编纂行为。因此,凡例在总体上必须做到虚实结合,即不仅要

对编纂思想、志书内容和形式做出明确规定,指明应该怎么办,而且还要说明为什么这样办。只有这样,凡例才能真正发挥指导编纂、制约全书和引领读者的作用。

(2)重点突出,体现特色。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故在修志凡例中既要有某些共同性的内容,更要注意突出重点和体现特色。一篇有个性的修志凡例,它必须说明本志的记载重点和表述上的某些特点,以此展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凡历代相因且至今没有疑义的传统体制,不必详述,点到即可。凡述及全国的统一规定和当代约定俗成的某些规则,其文字也要尽量简约。尤其需要注意突出本志的记载重点、内容特色以及表述特点,从而使本志异于旧志,横别于它志。

编纂《甘肃省志·检察志》的实践与体会

乔汝楠

《甘肃省志·检察志》于2009年9月启动,2010年元月正式动笔,2012年8月完成初稿,9月完成征求意见稿,10月完成初审评审稿,11月23日召开初审评审会,2013年6月完成送审稿,并报送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2014年3月13日通过复审,4月21日通过终审,目前正处于出版审查阶段。在编纂过程中有以下体会:

一、明确编纂思路,分析检察业务门类,设计好篇目,是编纂《检察志》的基础性工作

1990-2010年,是检察工作快速发展的21年,检察业务比21年前扩展了许多,第一轮《检察志》的篇目结构,已远远不能满足二轮《检察志》编纂的需要。如何设计二轮《检察志》的篇目结构,既是编纂二轮《检察志》的第一步工作,也是最基础性的一项工作。我们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做了两件事:

一是学习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了解什么是志书,熟悉志书的写作方法和质量要求,使我们这些只懂检察业务,不懂志书写作的编纂人员,对志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做好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二是分析检察业务门类,明确《检察志》的编纂思路。根据志书横排竖写的要求,我们将各项检察工作首次分析排列了13类,一类为一章,每类又将该项检察工作的内容分为若干问题,一个问题为一节,首次分析排列了40个问题即40节。将这个13章40节的提纲,广泛征求意见,对遗漏的检察工作进行补充后增加为15章45节。初审评审后,根据章下不能无节的要求,合并两章增加四节,终审以后第三章又增加一节,最终以13章50节反映21年检察工作的全貌,做到了横不缺检察

工作内容,纵不断检察工作主线。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是学习写作志书,还是分析检察业务门类,设计篇目,这三个月仅仅是一个开始。上述两件事是贯穿于整个编纂过程的,特别是篇目设计,要在编纂过程中,根据编纂实践,不断补充完善,修改篇目。纵不断检察工作主线容易做到,横不缺检察工作内容,需要在编纂中不断的思考、分析和调整。

二、熟悉吃透检察工作的主体资料、背景资料、宏观资料和微观资料,找准四类资料的结合点,将四类资料有机融合入志

1990-2010年,21年检察工作的资料,复杂繁多,如何梳理归类,分析取舍,有机融合,是编纂《检察志》的硬功夫,是决定《检察志》编纂成败的关键。每一章正式动笔写作的第一步,就是将该章21年检察工作的资料分为四类进行梳理辨析:

一是检察工作的主体资料,主要是甘肃检察工作每年干了哪些事要梳理清楚;

二是背景资料,主要是甘肃检察工作所依据的中央精神、省委精神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要求要梳理清楚;

三是宏观资料,就是作为甘肃检察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的省检察院对全省检察工作有哪些部署、安排、决策和要求要梳理清楚;

四是微观资料,就是各级检察院,主要是市、县两级检察院,具体开展检察工作的情况和做法,办理的一些重要案件要梳理清楚,这类资料的梳理要抓特点。

以上四类资料的使用,不能平分秋色,要从实际出发,各有侧重,找到四类资料的结合点,有机融合入志。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各章节的记述中做得比较好,但在概述的写作中是走了弯路的。概述

第一稿是按照王平检察长三年,李德奎检察长第一任五年、第二任五年,蔡宁检察长五年,乔汉荣检察长三年为历史分期,分五个阶段。成稿后发现三大弊病:一是没有特色;二是具体内容重复太多;三是届与届之间工作不好平衡。经过分析,我们认为检察工作发展的21年,实际上是检察改革在推动检察工作的发展。为此,确定了概述写作的指导思想和主题是:检察改革推动检察工作发展。因为检察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上层建筑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所以我们调阅了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两次的检察长会议文件,结合甘肃的工作情况,分社会背景资料、检察工作宏观资料、检察工作主体资料、检察改革资料四个方面,沿着21年检察工作和检察改革主线进行梳理,寻找检察工作和检察改革的“交汇点”和“节点”,提出了《关于1990-2010年甘肃检察工作划分四个时期的依据》,根据这个研究成果成功地完成了概述的写作。《关于1990-2010年甘肃检察工作划分四个时期的依据》收录在《检察志》的附录中。

三、制定工作进度,责任到人,处理好编纂速度与编纂质量关系,坚持编纂《检察志》速度与质量的统一

《检察志》编纂是一项周期较长的工作,编纂第一轮《检察志》用了8年,如何既缩短编纂时间,又保证编纂质量,我们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根据设计的篇目制定编纂进度。初次设计的篇目是15章,每章完成初稿时间预计3个月,机动和修改1个月,总共4个月,完成15章约需60个月,两位编纂人员从2010年元月开始同时工作,预计2012年5月完成初稿。据此排出工作进度表,责任落实到人,严格按进度开展工作。

二是把专门固定编纂人员与临时固定编纂人员有机结合。常年在史志办参与编纂工作的同志共计3人,1人负责总纂,2人负责各章节编纂,这3人承担了编纂的大部分工作。按照最初的编纂工作进度实践的结果,在编纂期限内只能完成10章。据此,我们果断调整编纂方式,剩余的5章抽调相关业务处室干部,临时固定到史志办参与编纂工作,每个人一般脱离本处室3—4个月,编完

一章换一个人,以保证编纂进度计划的最终实现。

三是坚持进度服从质量的原则,不因为赶进度而粗制滥造,宁可进度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有了质量才有编纂速度。按照我们原定的进度计划是在2012年5月完成初稿,总体进度推迟了3个月,直到8月底才完成初稿,就是因为坚持执行了进度服从质量的原则。

四、广泛征求检察干警意见,依靠检察干警编纂《检察志》

甘肃检察工作的历史,是甘肃全体检察干警创造的,他们是甘肃检察工作的主人,对甘肃21年的检察工作最有发言权,最能提出有价值的编纂意见。从编纂一开始,我们就坚持唯物史观,从设计篇目到最后完成《送审稿》,不间断地、广泛地征求检察干警意见。我们先后采取不同方式共四次征求意见:

第一次是对首次设计的篇目章节,以编纂提纲的形式,呈送各位领导、各处室提出修改意见。

第二次是采取逐章征求意见的形式,编写完一章,由我们提出名单,经省检察院乔汉荣检察长批示由该章内容涉及的部门工作过的留在省检察院工作的处长、副处和内勤,请他们发表真知灼见,征求意见人数高达52人次,征求到修改意见数十条。

第三次是2012年9月,初稿完成后对初稿进一步修改,并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普遍征求意见,对象是已经离任、退休和调任的有关领导及省检察院机关各部门。

第四次是初审评审会后,在认真听取研究评审意见的同时,对《初审评审稿》由各部门负责征求1990-2010年在本部门工作过的正副职和内勤的意见。这一次征求意见是最集中和最广泛的一次,共征求到意见80余条,加上初审评审会提出的60余条意见,为修改报送《送审稿》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五、依靠和取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及时指导,是编纂《检察志》不走或少走弯路的重要原因

编纂《检察志》不仅需要了解和熟悉检察业务,而且还要懂志书的写作。参与编纂《检察志》的

同志,都是学习法律专业的,对检察业务比较了解和熟悉,但是在志书写作上是门外汉。虽然在编志前和编志过程中也学习了一些有关材料,但是编纂中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省史志办的同志是志书编纂方面的专家,是我们编纂《检察志》的老师。认真听取省史志办的意见,按照他们的意见编纂和修改《检察志》,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我们把注意集中听取意见和随时请教相结合。在报送送审稿之前,我们曾两次集中听取了省史志办的意见。第一次是在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在省委党校参加培训,听了“二轮省志编纂记述问题三议”等专题讲座,对我们修改《检察志》帮助很大。我们对

照征求意见稿,按照讲课的内容,将不符合志书的语言和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删除,形成了初审评审稿。第二次是初审评审中,省史志办针对初审评审稿提出了十多条意见。这些意见是初审评审中的核心意见,关系到送审稿的质量,我们认真听取,件件采纳,给予高度重视,为修改好评审稿,及时报送送审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另外,平时我们加强与省史志办省志处的联系与沟通,遇到问题及时向他们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使《检察志》的编纂少走了许多弯路。

(作者系《甘肃省志·检察志》执行主编)

(接 54 页)

最高洪水位 1738 米
坝址以上流域面积 18.17 万平方公里
水库面积 140 平方公里
水库总库容(1735 米以下)57 亿立方米
有效库容 41.5 亿立方米
最低运行水位 1694 米
坝顶全长 840 米
最大坝高 147 米
坝顶宽度 16 米

溢流坝:

堰顶高程 1715 米
孔口尺寸 3—8.5 X 10 米
闸门型式定轮平板闸门
最大泄量 4260 立方米 / 秒

泄洪洞:

进水口底槛高程 1665 米
孔口尺寸 1—8 X 9.5 米
闸门型式弧形闸门
最大泄量 2150 立方米 / 秒

泄水道:

进水口底槛高程 1665 米
孔口尺寸 2—3 X 8 米
闸门型式定轮平板闸门
最大泄量 1500 立方米 / 秒

排沙洞:

进水口底槛高程 1665 米
孔口尺寸 1—2 X 1.8 米
闸门型式弧形闸门
最大泄量 105 立方米 / 秒

厂房:

型式地下坝后混合式
装机容量 122.5 万千瓦
设计水头 100 米
最大过机流量 1350 立方米 / 秒
水轮机型式混流式
转轮直径 5.5 米
进水口底槛高程 1680 米

主体工程量:

土石方挖填 1895 万立方米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浇筑 182 万立方米
金属结构安装 6497 吨
帷幕灌浆 17825 米
机电安装 21687 吨

施工:

开工日期 1958 年 9 月 27 日
复工日期 1964 年 4 月
第一台机组发电日期 1969 年 4 月 1 日
竣工日期 1974 年 12 月

(本文摘自《甘肃省志·电力工业志》)

博采众长 秀外慧中

读《金川区志》有感

桂发荣

某日到甘肃文化出版社办事,一部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金川区志》在书架上映入眼帘,我顺手卸架饱览,便有趣地认真翻阅起来。看着这部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志书,装帧考究、印刷精美,彩图印制清晰艳丽,油墨清香扑鼻而来,真有点爱不释手。古人云:“书非借而不能读也”。只好从编辑那里借上一本带回家,说是借,其实是有借无还啊!《金川区志》带到家中后,经数日仔细拜读,笔者感受到通览全书的惊喜与美感,这无疑是一部文化品位较高、质量上乘的佳志。它给第二轮新编志书理论与实践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现书写片言,谈谈自己的读志心得,以飨同仁。

一、篇目科学 构思缜密

《金川区志》是金川区建区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客观记载全区自然、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大型地方文献。《金川区志》用序述编纂者之意,用凡例明确编纂规则,用概述做全志之纲,用大事记为全志之经,纵述历史。后设附录后记,以便辑存更多重要历史文献。在篇目设计上,反映出了志书编纂者扎实、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的工作方法。《金川区志》篇目设计坚持了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的实际,立足更好地反映区情、更明确地突出特色,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特色鲜明的篇目。《金川区志》始终从该区实际出发,在坚持志体的前提下,把志文按照事物属性分为地理、综合经济、民主政治、社会事业、社会生活、荣誉人物6大块;然后按照事物的类别及相互

关系分为19篇83章379节;节以下按行业属性类别设目,目下以事物发展先后时序设有子目为实体。《金川区志》从篇目、体例结构上看,结构严谨,内容安排合理得当,即有传统志体的继承又有新志体的创新。比较有新意的亮点设置有:鸟瞰图之后的金川名片,列举了15项金川在全省乃至全国较有为的产业、工作,一页纸尽数金川家珍,未读正文就感受到鲜明的金川特色;政区人口篇把地域、建置、区划、地名、人口状况、人口结构集中前置,一览总括,突出地情,从根本上体现出了编者对地方志书的深刻理解;资源环境篇将矿产资源前置,体现区域自然特色,折射出矿产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城乡建设篇将城乡一体化建设、“五城”联创工作升格单列成章,突出体现了金川区城市化进程的时代特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知名度提升成果显明。党派群团篇和政权政务篇章节突出重点、明确要务,以分别单独设节方式详细介绍各自的工作方式、方法及政绩成果,看似简单的大小拆分组合,实则突出“地方官书”要义,全面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和政权组织建设及施政成果的变化过程。

二、存真求实 全面系统

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这是衡量志书质量的核心和关键所在。笔者认为《金川区志》是一部体现方志本质的典范之作,

其全面、系统、准确、详实并经精心撰著的资料全集,为金川区竖起了一座历史丰碑,也为《金川区志》成为良志佳品奠定了雄厚的根基。从《金川区志》近120万的文字载量看,编纂者对编纂目的和资料的重要性是有明确认识的,始终能坚持贯穿详今略古、存真求实,全面系统的原则,能正确和恰当处理区属事物与驻区事物的关系问题,采用大区志模式灵活处理编写。《金川区志》用大手笔、大气魄紧紧把握改革开放及建区后的时代脉络并融合于各篇章,主要表现在:一是突出改革开放的成果,高奏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旋律;二是突出新时期时代发展的亮点;三是突出地方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特色。志文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既写经验又写教训,既写成绩又写失误,特别是对一些深层矛盾和热点、难点问题,坚持求真务实、简洁明快的原则,如实记述。《金川区志》在辑录资料时,始终在遵循“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原则的基础上,在类目上以全面为要,在资料上以详尽见长,与许多志书相比,增加了一些类目,有的内容更为详尽。比如:在党派群团篇、政权政务篇中,独立增设了重大决策、履行职责、施政纪略、履行职能节拓宽视野,超大篇幅全面详细的记述了1985至2010年期间历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所完成的重要政事,突显了历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功绩和工作成果。再如:在反映地方经济发展的财政篇中通过大量数据和一系列图表,采用纵横对比的方法详细阐述了建区至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三产收入、财政收支、工业生产总值、粮食总产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各项经济统计数据。另外,在方言记述中,除从当地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入手外,还大量收集和增加了当地常用谚语、歇后语等带有生活情趣的内容,具有一定的传承性。

三、图文并茂 形式新颖

方志学家常讲,文述其事,图视其状,照显其相,表具其详。志书插图已成通例,新出版的志无不有图。翻开《金川区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精制的彩印图、照、表穿插于文中,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并有效增强了志书的直观性、欣赏性、感染力。该志从数千幅照片中精选900余幅入志,其特点一是量大,二是面广,三是精选。《金川区志》政区图、城区平面图、鸟瞰图、各类经济指标示意图、区域社会发展彩照图组及志中实物现场图组,给人以“一图胜千言”之感,感觉看完图组就已经基本了解了金川的区情、区貌。《金川区志》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大16开精装版,采用高端纸材全彩版印制,图表排列内在逻辑严密,大小疏密有致,画面清晰,构图巧妙,把历史栩栩如生地展现给读者。特别是志前图组主题表现为亲切关怀、城乡嬗变、资源物产、农业发展、工业腾飞、商贸繁荣、教育兴荣、医疗服务、文化风韵、文物古迹、作品选集、旖旎风光等,使全志形成了一种鲜明和独特的风格,也充分展示了金川区各项事业发展的全貌。其次《金川区志》还有一大批表格,如矿产资源开发表、人口流动统计表、农作物种植统计表等等,纳万字于图表内,既直观又醒目,大大提高了志书信息的承载量,增强了志书的服务功能。由于《金川区志》采用的图照较多,故印制采用铜版纸和高档涂布纸印制,精致彩页厚重美观,既确保了印刷装帧质量又提高了志书的印刷装帧档次。

四、美中不足 值得探讨

志书有良志和佳志,但无完志。笔者就《金川区志》提出四点不足与读者思考探讨。一是经济部类的篇目设置基本是以部门来设章立目,包含面相对不够宽泛,不能完全很好地解决好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领域各个行业的社会经济成分发生的巨大变化。二是彩插文字说明太简,要素不够全,部分缺少时间、方位、事由等影响存史价值。三是人物传、简介应配放人物证件照,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增加志书信息量。四是应借鉴年鉴和某些二轮志书的做法,在中文目录之外,再设英文目录,将志书的影响和使用范围大大扩展。

(作者系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甘肃省志·档案志》

目 录

概述	(1)	七、声像档案	(95)
第一章 档案资源	(13)	(一) 照 片	(95)
第一节 古代档案	(14)	(二) 录音、录像带	(96)
一、清代以前档案	(14)	第四节 资料	(100)
(一) 秦汉档案	(14)	一、志书、谱牒	(101)
(二) 魏晋南北朝档案	(18)	二、报 纸	(103)
(三) 唐五代档案	(18)	三、刊 物	(103)
(四) 西夏档案	(21)	四、著 作	(106)
(五) 元代档案	(23)	五、汇 编	(107)
(六) 明代档案	(24)	六、报 告	(108)
二、清代档案	(29)	七、图 表	(108)
(一) 甘肃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	(30)	八、职员录、同学录、通讯录	(109)
(二) 地、县档案馆藏清代档案	(35)	第二章 档案管理	(111)
(三) 企事业单位档案馆和其他部门藏清代档案	(38)	第一节 档案室业务管理	(111)
第二节 近代档案	(42)	一、文书档案管理	(111)
一、民国档案	(42)	(一) 立卷归档	(112)
(一) 甘肃省档案馆藏民国档案	(42)	(二) 整理编目	(121)
(二) 地、县档案馆藏民国档案	(64)	(三) 库房保管	(128)
(三) 甘肃省图书馆藏民国档案	(68)	(四) 鉴定销毁	(134)
二、革命历史档案	(70)	(五) 档案移交	(143)
(一) 甘肃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71)	二、科技档案管理	(151)
(二) 地、县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74)	(一) 产品档案	(152)
(三) 其他部门藏革命历史档案	(77)	(二) 基建档案	(154)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80)	(三) 科研档案	(159)
一、中共甘肃省委档案	(80)	(四) 农业科技档案	(162)
二、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档案	(82)	(五) 地震档案	(165)
三、甘肃省人民政府档案	(84)	(六) 气象档案	(166)
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档案	(87)	三、专门档案管理	(169)
五、民主党派、工商联档案	(92)	(一) 会计档案	(170)
六、人民团体档案	(94)	(二) 艺术档案	(172)
		(三) 教学档案	(173)
		(四) 审计档案	(176)

(五)地名档案	(177)	(二)省内交流与协作	(297)
第二节 档案馆业务管理	(178)	第四章 开发利用	(299)
一、基础业务	(178)	第一节 档案利用	(299)
(一)接收征集	(178)	一、档案室的利用工作	(299)
(二)整理加工	(189)	二、档案馆的利用工作	(303)
(三)清理鉴定	(193)	第二节 开放与公布	(309)
(四)保管	(197)	一、开放档案	(309)
(五)检索	(200)	二、公布档案	(311)
(六)统计	(202)	第三节 档案编研	(314)
二、保管设施	(204)	第五章 档案科研、教育与宣传	(323)
(一)馆库建筑	(204)	第一节 科 研	(323)
(二)装具设备	(211)	一、档案行政管理部的科研活动	(323)
(三)保护技术	(212)	(一)档案基础理论研究	(323)
第三章 档案事业管理	(217)	(二)档案应用技术研究	(326)
第一节 档案室	(217)	二、档案学会的科研学术活动	(330)
一、文书档案室	(218)	第二节 教 育	(336)
二、科技档案室	(224)	一、学历教育	(337)
三、综合档案室	(227)	(一)大专教育	(337)
四、联合档案室	(229)	(二)中专教育	(339)
五、文件中心	(230)	二、干部培训	(340)
第二节 档案馆	(231)	(一)以会代训	(340)
一、综合档案馆	(232)	(二)现场实习	(341)
二、城市建设档案馆	(248)	(三)短期培训	(342)
三、部门档案馆	(249)	(四)专题培训	(345)
四、企事业单位档案馆	(251)	(五)进修学习	(346)
第三节 档案局	(255)	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	(346)
一、体制、机构	(255)	第三节 宣 传	(348)
(一)体制	(255)	一、媒体报道	(349)
(二)机构	(257)	二、举办展览	(350)
(三)人员	(266)	三、法治宣传	(352)
二、法规建设	(272)	四、工作简报与内部资料	(353)
(一)规章制度	(272)	五、《档案》期刊	(354)
(二)执法监督	(276)	附录	(357)
三、行政管理	(278)	一、大事记	(357)
(一)监督指导	(278)	二、先进个人与先进集体名录	(393)
(二)目标管理	(288)	三、专 记	(399)
(三)重要工作会议	(289)	四、档案工作重要文献辑存	(409)
四、工作交流与协作	(294)	后 记	(431)
(一)省外交流与协作	(294)		

陇右地名考(续)

薛仰敬

十八里铺水库 在甘肃古浪县城南 13 千米,古浪河支流龙沟河末端,水库以地处十八里铺乡境内而名。抽调民工 4000 人于 1970 年 11 月开工,1973 年 10 月竣工。后又两次进行加固。水库主要为防洪、灌溉。保灌土地面积 6 万亩,解决了水库下游古浪县定宁、泗水、胡家边、土门、永丰滩 5 乡 10 万人灌溉饮水困难。

人宗口 又名人祖山口,人峻口。在甘肃张掖市西北 20 千米龙首山西段山间干沟南口,是河西走廊通往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捷径。

人头疙瘩 在甘肃瓜州县城东布隆吉黄粘土地带,是风蚀台地自然现象,为荒漠一景。周围是人迹罕至的戈壁滩。因地处风带线上,常年多刮大风,泥土剥蚀,留下坚硬和有红柳草根的部分,形成土墩星罗棋布,酷似人头,故名。

八松 在甘肃康乐县附城镇西南 25 千米的八松河南岸。原为藏族居住地,名木哈湾松,后译为八松。今属八松乡辖地。

八坊 宋元为枹罕县治所辖。地处甘肃临夏市城区西南隅,明代城南关厢一带因建有进士等牌坊共八座,故称八坊。地名沿称至今。原是明代所建主城之稍城,面积 1.8 平方千米。清末至民国间,为西北五马建设经营地,曾誉称“上有苏杭,下有八坊”。至 1935 年“八方一隅,内有五大寺十八小寺”,为伊斯兰教教堂密集区,亦多为回民所居之地。解放路、前河沿路是古老繁华的商业街道,今设八坊街道办事处,办事处驻解放路 57 号。

八角山 顾祖禹《方輿纪要》卷 59 巩昌府陇西

县:八角山“在县北八十里,以山岩层峙而名”。在今甘肃陇西县北。

八龙山 《方輿纪要》卷 59 秦安县:八龙山,“山阜有八,回合如龙,其势如羈如御,亦谓之把龙山。”在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六十里。

八道泉 在甘肃景泰县一条山镇北 5 千米,长岭山东。因村西有八道小泉,七咸一淡,注入一池,故名。原为荒滩,1974 年景电一期提灌工程建成后,寺滩乡移民于此建新村。今为八道泉乡名。产滩羊。乡境有东西走向明长城约 23 千米。明万历年间三眼井村筑汜水关,今已毁。

八宝川 在兰州市西南部,为今永登河桥、连城和红古窑街上下的大通河川谷地。据《晋书·窦允传》载,西晋初年,始平(今陕西兴平东南)人窦允曾在永登八宝川一带推广种桑养蚕。明清称八堡川,以河桥、连城、丰乐、马军、马庄、杜家湾、七里店、红山八个堡子而名。1958 年设八宝公社而沿称八宝川至今。解放前群众称这里有金、银、红土、木材、鹿茸、麝香、大黄、甘草八种矿藏和动植物为八宝。今以金、铝、铅、铜、铁、煤炭、森林和水利资源等名八宝。

八峰崖 在甘肃西和县城南 35 千米的石峡乡西侧崇山峻岭中。八峰中一峰突起,相对高程约 200 米,山腰有长约 60 米,高 15 米的天然岩穴,原穴内建殿宇大四间,20 世纪 60 年代失火被毁。八峰崖现存佛龕 16 窟,造像 90 余尊,系中唐、宋元明清作品,分上中下三层。杜甫《石龕》诗:“驱车石龕下,仲冬见虹霓”即咏此处风光。现存地藏殿、

大殿、大佛殿、药王殿、娘娘殿、大雄宝殿等。八峰崖亦称八佛崖石窟。

八卦山 在甘肃徽县北部边界上,是与天水市秦城区间之界山,麻沿河、高桥河与白家河的发源地,属北秦岭支脉。主峰海拔 2245 米,山势平缓,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有茂密松、桦、杨、栎等针阔混交林,沟谷中灌木甚茂。

八卦泉 在甘肃天水市城南南郭寺。唐李白“东泉澄彻底”和杜甫“水号北流泉”,其东泉、北流泉均指此泉。泉水甘冽,碧澄不竭,至今尚存寺中菩萨庵内。

八角城 在甘肃夏河县城北 35 千米的甘加滩偏东央曲河与央拉河汇流处台地上。因城周有八个城角和三十六个面的形状,中间为一空心“十”字形而得名。城外西北高地有汉墓群,此城始建于汉代,距今已有二千余年。后废。唐宋间复建,人称此城应是唐代雕窝城。历元明清至清代末废弃。建筑设计突破了以往方形或长方形格局,为我国现存古城之罕见。城全长 2193.4 米,城内占地面积 20 万平方米,开南门,有瓮城,易守难攻。除小部分墙垣坍塌外,保存基本完整。

八角乡 在甘肃临潭县城关镇东北 110 千米。八角为藏语哇交之音演变为汉语,原为祈祷成功之意。乡境有八角关,为明代防守要地。1962 年置公社,1984 年改社为乡。有森林面积 9.7 万多亩,多云杉、冷杉、桦、杨、柳等树木。该乡在莲峰北,农历六月一日至六月花儿会在莲花山举行。

八角盘 在甘肃定西市安定区凤翔镇西 20 余里处永安村。元代称赵阿哥潘,以临洮府元帅阿哥潘派兵驻守此隘口而名,昔为兰州、榆中去渭源、陇西捷径要道,又为元代由陕西经天水、陇西、安定(今定西)西经此处去榆中至西宁(今青海省属)驿路。后转音八角盘,今小岷沟近山顶存古墩台遗址,当是元代军事邮驿重要隘口,军屯驻关卡守处。

八景楼 原唐宋古建筑。在甘肃成县裴公湖侧。一名奎星楼。八景取仇池、子美祠、凤凰台、醉仙岩、仙人龛、鹿玉山、泥功山、裴公湖。北宋张舜民诗:“八景更从何处觅,一湖惟有此楼高。”

八楞山 又称青山,在甘肃永靖县关山乡。因山势呈 8 个楞角而名。西南至东北走向,长 20 余千米,与兰州市马御山相接。主峰海拔 2851 米,是该县境内最高峰。

八力乡 在甘肃宕昌县北部,距县城 50 千米。八力,一作笛篱庄、八里庄、坝里诸写,后为书写方便作八力。清设和睦里。1950 年设八力乡,属岷县间井区。后划属宕昌。1961 年建八力人民公社,1983 年改社为乡,乡政府驻八力村。

八里湾 在甘肃会宁县城东 27 千米,今设乡,乡驻地八里湾。1949 年前属长富乡,1961 年始建八里公社,1983 年 7 月改社为乡。

八里窑 在兰州市七里河水磨沟中段南侧,因距兰州西稍门八里,又因其为古代烧制陶器、砖瓦,故名八里窑。2000 年改花寨子乡为八里镇。镇政府驻八里窑。兰阿铁路、兰宜公路经此。

八盘峡 在兰州市西固区西 26 千米的石峡谷地,黄河经流其中。1980 年建成八盘峡水电站,1982 年发电量 8.3 亿度,总装机 18 万千瓦,总库容 0.49 亿立方米。是河床式发电厂,为甘肃省重要电力企业之一。该水电站至 2002 年底,累计发电 226.6852 亿千瓦时,累计创工业总产值 15.93 亿元,相当于电站总投资的 10.66 倍。

八盘峡黄河特大桥 位于兰青铁路 K9+705 米处。1974 年初开工,1975 年 5 月 27 日竣工,全长 887.2 米,为 2×64 米下承栓焊钢连续桁梁+15×31.7 米+10.23.8 米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

八盘峡黄河公路吊桥 在兰州市西固区八盘峡水库下游。桥长 179 米,宽 5 米。设计荷载等级汽-15。于 1983 年 6 月竣工通车。桥由八盘峡水电站建设,水电四局设计施工。

八盘山 在甘肃定西县宁远乡政府驻地东北数千米处,旧为西兰公路必经山岭,山路曲折八盘始至山顶,直通华家岭。公路两旁三十年前共植树木 1700 多万株,造林面积 73000 多亩,总长 100 千米,是甘肃当时最长的公路林带。在甘肃岷县东北部,为岷县与礼县之界山,属北秦岭的一支,主峰海拔 3068 米。属暖温带湿润气候区。北坡有桦、杨天然次生林,山腰生长云杉、油松、华山松、栎等

针阔混交林;山坡再上有冷杉、油松、柏等;山坡为古夷平地,生长大片高山草甸。

八佛岩 在今甘肃西和县南。清何廷楠曾游于此,有诗。

八斜岩 在甘肃宕昌县北。金兴定二年(1218年)乌古论长寿攻宋,进军于此。

八里铺镇 在甘肃临洮县城北八里处,位于洮河东岸。西部川区地沃水丰,有洮惠渠水灌溉农田,有水地 2.4562 万亩。该乡五六十年前文化教育已普及。1993 年改八里铺乡为镇。今制毯业发达,有制毯重点户 500 多家。盛产名贵花卉唐菖蒲,并有卫生香加工等厂。甘川公路横穿镇境,交通便捷。

八里河桥 在甘肃平凉市西 4 千米处,地当泾河及页河会流之下游。民国十九年,华洋义赈会拟修此路未遂。1930 年后西兰公路工务所于北岸建钢筋混凝土过水桥,因大汛河改道废。1938 年复建 19 孔石拱桥,长 118.4 米。主管工程师蒋爨。该桥南端东侧石护墙嵌有《修建平凉八里河桥志》今存。是当时甘肃能够通行汽车的第一座单车道石拱桥。1983 年曾进行加固维修。

八旗会馆 清光绪十七年(1891 年)建在兰州水北门内北侧,即满州旗人会馆。有前庭、戏楼、正堂、大门等建筑。辛亥革命后改为五省会馆,即直(河北)、鲁(山东)、豫(河南)、奉(辽宁)、吉(吉林)五省会馆。建筑现已不存。基址为今兰州市第四十中学。

八卦营 古城在甘肃民乐县永固乡八卦营村西北 1 千米。城分内、外、宫城三部,有护城河,今尚存残迹,面积 6800 平方米。八卦营因霍去病于此布“八卦阵”以退匈奴而得名。汉代古城,魏晋后废弃。该城平面呈形,富有军事防御能力。八卦营之西的背背山、簸箕凹山、直岭岭山、麓沟山、乱疙瘩山等五条山岭布满汉墓约 600 多座,十分密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城有人捡到“大吉”二字筒瓦当、云纹瓦当、长乐未央残当;笔者在这里捡到多种不同布纹的残瓦片,又见到东汉残磨。八卦营墓群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有砖室墓、土室墓、瓮棺葬。出土陶灶、陶壶、一刀平五千钱币、弓箭、弩

机、铜镜等。近年墓有被盗挖者,墓内壁画有四神、日月星等图像。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 前身为红军联络处,是党中央为营救被流落的红西路军将士设立。办事处 1937 年 8 月成立,次年 2 月由原南滩街 54 号(今互助巷 2 号)迁到孝友街 32 号(今酒泉路纪念馆地址)。1943 年奉命撤回延安,历时六年。期间,在党代表谢觉哉、处长彭加伦、伍修权等同志领导下,在开展营救,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同苏联外交代表和军事代表的联络,指导甘肃工委工作,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接待有关过往人员和转运抗战物资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被周恩来亲切的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部”。20 世纪 90 年代重修。纪念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陆续征集不少革命文物及图片供展出参观。

九功 在甘肃崇信县锦屏镇东 7 千米的洮河下游北岸。原名九弓城,北宋建隆四年(963 年)选址建县于此。旧时一弓等于五尺,合 1.6 米,该城仅筑九弓而罢。城移筑锦屏。后将九弓写九功、九宫、九工等者,音同意异。今为乡名。1990 年有农业人口 1375 户,6671 人。

九层楼 亦称米拉日巴佛阁。在甘肃甘南州合作市北端坡地。合作去兰州公路经寺旁。佛殿经堂错落,寺前即九层楼,碧瓦红墙,巍峨庄严。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合作寺高僧洛桑达吉兴建。高近 40 米,红色,楼上供莲花祖师等像。“文革”被毁,20 世纪 80 年代信众集资重建,佛阁中供奉历代吐蕃藏王和藏传佛教诸神像及艺术品,各类佛像 1270 多尊,有“佛像博物馆”之称。现有僧人 200 余人。

九层佛阁 是藏区少有的高层佛教建筑。在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亦称九间殿。顾颉刚在《西北考察日记》中云:“九层楼,楼中供铜质大佛像。……像身有弹痕,宁海军所遗也”。

敦煌莫高窟第 96 窟即是。俗称大佛殿。唐代称北大像。为莫高窟标志性第一大窟。楼高 43 米,窟檐木构建筑九层,下七层依山而建,上两层突出崖顶。楼内有高 34.5 米,宽 12.5 米,倚坐弥勒佛

像,是全国第五大佛,是世界上现存室内泥塑第一大佛。唐代倚山凿成石胎,外敷泥彩绘而成。史载此像建于武则天延载二年(695年),初建有窟檐四层,唐乾符间(874-879年)改建五层,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五层为七层。民国17-25年重修,道士王圆箎改建为九层,并重新彩绘大佛。楼层重叠,巍峨壮观,为莫高窟最大建筑物。

九道沟 今甘肃瓜州县布隆吉乡东北的九道沟村。清代去新疆驿路必经地。

九巅峡 也称九甸峡。在甘肃卓尼县藏巴哇乡境内,以峡中有九座峰巅而名。又称酒店峡,相传有妇人于峡内设酒店而名。为甘川古道捷径,历代商旅行人络绎于途。峡长10余千米,两岸群峰竞秀,苍松翠柏高耸云表,石壁悬崖上至今存有栈道遗址多段。在古桥道堡附近岩崖上,有石洞佛龕,栈道石壁上有数处摩崖石刻。此峡是洮岷两地北去兰州等地的水陆咽喉。2002年12月12日,引洮水利枢纽工程及引洮供水一期工程于此峡燕子坪奠基筑坝。

九间楼 原在兰州市华林坪北端为华林寺之一部分。楼始建于清代中叶,面向西北,以半规之形,凌空飞架,建木结构悬楼九间,故称九间楼。登楼凌空可观赏黄河浪滔,西川烟霞。1942年8月10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曾在九间楼为行宫下榻。1954年扩建西津路时拆出。

在天水市秦城区民主东路南,为孔繁锦1918-1925年任陇南镇守使期间建造,砖木结构二层楼,座南向北,上下各九间,建筑面积806.7平方米。今天水市百货公司批发部占用,是天水最早的楼房建筑。

九甲乡 在甘肃夏河县大夏河上游南北两岸。乡境内有阿米九千和甲莫两座神山各取前一字而名。阿米九千山顶松栢苍翠,人称九甲林。清光绪时,拉卜楞寺高僧在该山建修静寺为静修地。该乡目前是为夏河县城提供乳制品、蔬菜和燃料基地。人多经商成风,又兼运输业、建筑业、饮食服务业之长,活跃于县内外。

九九桥 在甘肃宁远县(今武山)境内。此地本高桥堡。清嘉庆间修土桥,不数月圯,复整石建大

桥,额曰“东巩”,亦数年而圯,人皆呼高桥之名。沟深无桥,民绕道而行。道光十三年(1833年)宁远县令苏得坡重修,此年九月九日桥成,因是重九,即名,亦寓桥久久安恙之意。

九龙河 在甘肃宁县境。古称九陵河。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云:“川中有九堆似陵”而名。后以狄梁公斩九龙的传说而称九龙河,或九陵讹称九龙。其河自龙池一带由东向西,至县城西南汇入马莲河,长56千米,有灌溉之利。川口内之菩萨庙是著名桃乡。

九龙川 在甘肃宁县境。一名九陵川,源自横岭,流至县城西南入马莲河。其九龙川、城北川、马莲川三水至县城西南合一称马莲河。环抱萦迴,一方胜概。

九龙山 在甘肃秦安县城蜿蜒至五营乡境,是秦安四大名山之一。县东中山乡四顾山下元代建有九龙庙。“文革”中被毁,近年新修大殿一座。清《秦安县志》载:“九龙山九峰磅礴起伏,为本县之主山”,海拔1982米。此山中部有掌、湾、坪,地势平坦,土质肥沃。近30年山上栽油松数万株,长势良好。在甘肃漳县香桥梁北,九峰环绕如龙,因名。又有二水来朝,上有朝阳寺。在甘肃静宁县城西北5千米,一名救龙山。海拔1998米,属祁家大山余脉。山上有古建筑玉皇殿、灵官殿、钟楼、天坛、山神庙等。每年农历正月初九为庙会日。

九陇山 在甘肃酒泉市境内。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云:“九陇山在(酒泉)县南百里。传昔神人射酒泉郡西金山之白神,射得九筹,画此山上,遂成九龙,因以为名”。

九龙泉 在甘肃镇原县西10千米。其地有九龙庙,唐代建。一泉九眼。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姚仲救原州,由九龙泉上北岭与金人战,即此。在甘肃西和县城北65里。四时湛清,水旱不减不增,夏凉冬暖。清代泉上建九龙亭。

九龙峡 藏语名亚卡加隆,在甘肃迭部县境中部旺藏乡东,是白龙江横穿该县境四峡之三。峡道东西走向,长1500米宽数米至数十米不等,南北两面悬崖绝壁,高达800多米,是四峡中峡道最长、峡壁最高,其景最为壮观的大峪谷,素有“九龙

金镇”之称。喧啸的江水响彻峡谷。古代直至解放前仅有悬空栈道供人畜通行。1960年修筑两郎公路,洛(大)电(尕寺)段时,在峡谷北壁上劈石凿道修通公路,后又铺成柏油路面,已变险峡为通途,百姓歌之。

九泉山 在甘肃礼县北。山麓有九泉,旱不涸,涝不溢。山上有湫神庙、玉泉观。附近居民多汲水于此。

九运街 在新疆阜康市东7千米九运街镇。九运之名源于清乾隆间乌鲁木齐北路营塘路线军需物资急递转运,后以部队番号称五运、六运、七运、八运、九运、十运、东八运、东五运等形成村落名。九运街光绪间有小街而名。今为镇政府所在地,有农机修造、面粉加工等厂和农贸市场。人口千余,汉族为主。

九女山 甘肃环县城南5千米。相传古代有九女游于此,羽化成仙而名。

九岷镇 甘肃宁县城东55千米九岷原中,以在九岷原取镇名。从县城至九岷镇途经东山、石鼓、洼子、巴原、连壑子、鲁甲子、石疙瘩、北庄南、北庄西等九道岷而名,地形险要。原有旧城,今无存。清中叶以前集市建于鸦儿沟。1938年,新宁县政府重建集市于北庄庙院,次年移旧城内。今为乡政府驻地。

九眼泉 在甘肃嘉峪关市嘉峪山坡下,泉色清碧不竭,历代因有水源之便,此处设关并置嘉峪驿。清初泉水尚旺用以溉田。至今泉水造福当地。

在甘肃漳县城西三岔镇寺崖头村前。该处有大小清泉99眼,简称九眼泉,一名温泉星聚。泉水甘冽,严冬蒸气升腾。

在甘肃临夏市折桥乡慈王家村,大夏河由南转北环流入泄湖峡口平阔地带。面山近水多泉。明代嘉靖《河州志》载:“九眼泉,州东10里,一泉九眼……引流灌溉,居民赖之”。村旁路南有植于400多年前古柳一株,需四人合围。九眼泉至今百姓开塘养殖,造福一方。

九阳堡 宋置,金废。故址在甘肃庆城县西北。

九州台 在兰州市安宁区东黄河北岸,海拔2067米,山势陡峻。传大禹导河,登台指点九州形胜之地。明肃王曾在此台建望江楼。清乾隆翰林皋兰人秦维岳咏《九州台》有“望远九州著,台原号九龙”句。昔日荒山濯濯,今造林碧树荫浓。九州台南麓2003年移建皋兰县文庙于此;2007年修成文溯阁,《四库全书》珍藏于此,新建的藏书楼为仿清式中国园林化布局,在建筑规模、安全性能、内部设施,现代科技应用等方面达到全国领先水平。九州台如今为“文化兰州”靓丽风景线。

九眼泉墩 甘肃临泽县东30千米。此处泉流甚细,有九眼而名。这一带川原平旷,绿草蒙茸,为塞外风吹草低见牛羊佳景之地。

九支莲花山 在甘肃镇原县南30千米。山形如莲,九峰环抱似花瓣,四水回绕犹如池沼,上有明代建堡寨及关帝庙一座。

九巖峡栈道 甘肃卓尼县藏巴哇乡境内。从包舍口村入峡至宗石村出峡,在全长约15千米石峡内沿途均以断断续续的栈道连接。九巖峡是洮河下游最险峻的一段石峡,两岸石崖万仞,河水在峡内咆哮。栈道修在北岸向内倾斜的半崖上,道路面宽不足三尺,各段栈道长数丈、数十丈,二、三里不等,道路面仅容驮畜单行而不能转身,单人尚可互让通过。穿越地形复杂栈道时,或吹牛角号,或高声吆喝,以传递信息,使对方在尚未踏上栈道时止步,待其通过后再行,其道路难行若此。该栈道为洮岷两地通往狄道东线上必经之路,此道形成于唐末宋初,盛行明清,是甘川驮道运输捷径之一。

九如卡古城 在甘肃迭部县达拉乡达拉沟内加阿卡村西,达拉河西岸河谷阶地上。该古城为南北朝、北周恒香郡城,唐代恒香戍恒香县城。古城今仅存两段残垣。(未完待续)

(作者系兰州市博物馆退休干部)

“华夏首县”——冀县新考

张宏伟 裴应东

《史记·秦本纪》：“中湫在西戎，保西陲”，“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秦人先祖最早在甘肃活动的中心区域“西陲”，就是今天水及附近的礼县、西和一带。据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调查：犬丘应是秦国最早的都城，在今礼县红河、盐官一带。随着秦人势力的发展壮大，沿渭水西上不断拓展他们的势力范围。到了秦武公时期，打败了渭河上游的邽戎和冀戎，《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建县”最早的文献记载。“冀县”，主体范围在甘肃省甘谷县内，甘谷县因而被誉为“华夏首县”。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分析，冀县的性质而言应是县鄙之县，功能而言应为县邑之县，而非后世意义的郡县。

春秋早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国与鄙、野对立甚为明显，县与鄙二字经常连用，如《楚语》说：“国有都鄙，古之制也。”《左传》也曰：“晋之县鄙，何国之为？”韦昭注云：“国，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认为：县与鄙相同，为县，为野，三者同义。武公时，秦国都城已迁至平阳（陕西眉县），但依然视犬丘为“祖都”，仍在当地保留管理机构。《史记·秦本纪》载：“五十年（前716年），文公卒，葬西山（礼县大堡山）”。《周礼·正义》云：距王城（国）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县鄙。周代的1里约合现今0.839华里，“邽、冀二县”距离秦“祖都”犬丘也就是300多华里，这恰合周制县鄙之置。

《周礼·县士》“……皆公邑也，为之县”。可

见，春秋初期，地方行政单位仍是以邑为通称，《尉缭子·兵谈》云：“量土地肥磽而立邑”，“邑地疆场为成师”）但加上“县”称县邑的地方，一般是直属国君的边地军事重镇。《说文》释县：“县，从系持县，繫也”；“县，邑也，从口已声”。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认为，“县”字金文结构是作在树杪倒悬人首之形，古代的部落与部落之间，战争结束后常常将对方部落首领的“头”或“耳”悬挂在树上，以此树杪为分界的。金文里记载战功的文字，有许多说“执馘”，是枭首示众，含有征服、镇压之意。《虢季子白盘》：“献馘于王”，就表示了军事占领范围之意。秦武公设置冀县，所谓“初县之”，其实重点是在说明以之为自己的领土的意思，实质是将邽、冀二地纳入了自己的军事管控之下，冀县还是县邑之县。而赋予了县行政管辖的职能的郡县之县，应是秦孝公十三年（前349年），“初为县，有秩史”算起的。有秩史就是设县令、县丞、县尉等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县令是县之长。在县官之下，开始设置县丞（掌管民政）及县尉（掌管军事）。这是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实施郡县制的一个重要标志。

秦武公十年（前688年）设冀县，到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彻底征服洮河上游的狄戎置狄道县。再到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西斩豳王渭水边”，使陇西、武山一带的豳戎完全归顺，置豳道县（治所在今武山桦林乡天局附近）。可见，在秦人长达300多年向西拓展进程中，当时的冀县邑地作为秦人攻防西部诸戎的屯戍要塞，与西部诸戎长期在此对峙。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调查表明:洛门大南河以东的毛家坪、东早坪遗址,不论其陶器形态或是丧制葬俗,都与周秦文化相同。出土的多是地域特征鲜明的早期秦文化典型连裆鬲、圆腹罐、侈口罐、大喇叭口罐等器物,而都不见寺洼文化的典型器物马鞍口罐、双耳罐、单耳罐。(见赵化成:《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黄小永、卢冬:《毛家坪遗址秦文化管窥》,毛瑞林:《甘肃武山东早坪战国秦汉墓葬》)。而向西不到两里的西早坪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多出土以夹砂红褐陶为特征的羌戎文化器物。上世纪90年代末,毗邻西早坪遗址的洛门冯庄砖厂取土时,出土了大量寺洼(羌戎)文化类型的陶器,其中马鞍口罐、高领袋足鬲当地村民用背篋装背。这说明,当秦武公设冀县之后,秦戎以今武山洛门大南河为界,分居东西长期对峙。

《管子·乘马篇》云:“凡立国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该区域战略地位也极为重要,秦陇咽喉,巴蜀锁钥,秦武公当初设立冀县县鄙就是为巩固对冀戎的控制。这里的位置非常重要,从后来这里发生了两次非常重要的战役可以看出。《后汉书·来歙》载“建武十年(公元34年),来歙在此地擒隗嚣子纯,陇右平。”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秦州曹玮大击之于三都谷(洛门大南河口),斩首千余,获马牛杂畜、器仗三万余,使宋来自吐蕃的边患大除。《宋史·东都事略》。

磐安毛家坪—洛门东早坪遗址位于渭河二阶台地,背靠秦岭、面向渭水,平坦开阔。《汉书·地理志》称洛门为“落门”,《晋书·地道志》称之为落善(扇),落者,顾名思义聚落的意思,门《说文》释门:“門,闾也。从二户,象形。”“門”字的甲骨、金文字形“象两扉形”。《一切经音义十四引字书》:“一扇曰户,两扇曰门。”洛门是大南河、响河汇入渭河而形成的洪积冲积扇面上,后称洛善(扇)也是这个意思,今天武山河道川区这样的地名仍很多,如四门、王门、付门等等。“冀”本义就是北方有田的地方,《说文》冀,北方州也,《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本区到了汉代依旧“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后

汉书·西羌传》。在上个世纪末甘肃省考古所调查洛门西早坪遗址时,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大地湾一期时的大量陶片(见毛瑞林:《甘肃武山西早坪新石器战国和汉代遗址》),毛家坪周秦文化层出土了我国最早的铁镰、东早坪遗址出土了战国铁斧、铁削。两遗址都出土了马、牛、羊、猪等家畜的大量骨件,这都表明此区域当时农业、畜牧业都很发达。古人云:“观其草土之饶,然后营邑立城”(《汉书·晁错传》),可见,是建城选邑的理想之地。

再结合郦道元《水经注·渭水·卷十七》,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冀县治地。……渭水又东,有落门西山东流,三谷水注之,三川统一,东北流,注于渭水。……渭水自落门东至黑水峡,左右六水夹注。左则武阳溪水,次东得土门谷水,俱出北山,南流入渭。右则温谷水,次东有故城溪水,次东有间里溪水,亦名习溪水,次东有黑水,井出南山。北流入渭,渭水又东出黑水峡,历冀川。又东过冀县北,渭水自黑水峡至岑峡,南北十一水注之。北则温谷水,导平襄县南山温溪,东北流,迳平襄县故城南……春夏水盛则通川注渭。次则牛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长壑谷水,次东有安蒲溪水,次东有衣谷水,并南出朱圉山。……其水北迳冀县城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县之。……渭水又东合冀水,水出冀谷,次东有浊谷水……次东有黄土川水,俱出南山,北迳冀城东,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出岑峡,入新阳川……

这是《水经注·渭水·卷十七》记述渭水从今天武山洛门到甘谷地段完整流程,引文中省去了几处有关地段发生的历史典故,对考证当时冀县治地关键的几处地名,笔者做一探释:①三谷水是指今天武山洛门大南河水;②武阳溪水是指今洛门龙泉响河沟水;③黑水峡是指甘谷三十铺东河滩鸡嘴峡;④岑峡指甘谷县与天水市麦积区交界处长达18公里的石峡。⑤第一处温谷水,是指洛门与黑峡之间流经武山温泉的东坡峪沟溪北流入渭的聂河水,从毛家坪西北部台地下流过,当地群众称小南河;⑥第二处温谷水当是指今甘谷东北入渭水的散渡河,散渡河上源今通渭(平襄县)牛谷水河谷有温泉出露。●故城溪水是指东距毛家坪

遗址不到 2 公里的下南河水。《水经》一般认为成书于东汉时期,此处称“故城”,根据郦道元对《水经》一贯注解法,说明汉代之前此附近处应该有一座(县)城址。⑧朱圉山为秦岭支脉,连绵于甘谷县西南群峰,皆可称为朱圉山,极峰为今甘谷古坡乡石鼓山。⑨“其水北迳冀县城北”此处冀县应指的是汉代时期的冀县治地,应在距今甘谷县城西南三十里的渭河南岸台地上。北魏的郦道元距秦武公设立的“冀县”的时间过了 1200 年,囿于历史条件限制,难免在注解《水经》时误把汉代的冀县县城当做春秋冀县治地,故有了后面“秦武公十年,伐冀戎,县之”的结论。⑩水出冀谷……北迳冀城东。此处冀城应指的北魏时期冀城县城,北魏时期改冀县称冀城,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认为冀城在距今甘谷县城东十余里六峰乡渭河北岸平地。

2012 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开始对毛家坪遗址进行发掘,毛家坪遗址位于渭河南岸台地,总面积约 60 万平方米,分沟东和沟西两部分。沟西的北部为居住区,大部分被村庄叠压,沟西的南部为墓葬区,历史上盗掘严重。2012 年发掘地点 3 处,共发掘灰坑 210 余个,发掘墓葬 21 座、墓葬分洞室墓、竖穴土坑墓两类,年代从春秋早期延续到战国中晚期,发掘车马坑 2 座,都为 2 马 1 车,随葬马是先杀死,再侧卧埋入坑。2013 年发掘地点共 6 处,发掘面积近 2700 平方米,发掘墓葬、房址、陶窑、灶址、灰坑、灰沟等各类遗迹 735 处,其中墓葬 153 座,出土各类遗物 1000 余件。其中金属器主要有铜鼎、铜簋、铜戈、铜矛、铜镞、铜牌饰、铜剑、铁镰、铁削、带扣等,陶器主要是鬲、鼎、盆、豆、罐、壶等,石玉器有绿松石、炭精、料珠、石玦、玉玦等饰件,两件玉玦属春秋早期,墨绿色,半透明,材质为西距毛家坪 30 多公里武山县鸳鸯镇出产的鸳鸯玉。兽骨百余件,主要是羊、马、牛、猪、狗等家畜骨件,其中羊骨最多 32 件,此外,还发现野生动物羚羊角、鹿骨各一件。

商周时期用鼎陪葬、车马随葬是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也是贵族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鼎,坐什么样的车有严格的规定,即

用鼎制度和乘舆制度。2013 年,毛家坪遗址一春秋秦墓出土一组五件鼎,《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同年,另一墓地还出土了“三车十马”坑,其马头均朝东,系贵族出行车辆,车舆带漆皮彩绘,车轼上有蟠虺纹彩绘,舆板白底红彩。《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春秋时期是大夫最兴盛时期,《左传·襄公三十年》:“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可见,县邑长官一般由大夫级别爵位的贵族担任。毛家坪墓葬用鼎制度和乘舆制度也都集中体现了周代“大夫县邑”制之特点。据此推测,毛家坪遗址极有可能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冀县城的墓地。特别是这些保存完好的春秋早期车马坑的出土,对两周车制的演变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考工记》说:“周人商誉,故一器而工聚者车为多。”这也说明,秦国当时在本区应有集大成的综合性手工业生产部门。这些出土的遗存,也充分验证了《诗经·秦风·驷驖》描写秦人举行盛大田猎的情景:“驷驖孔阜,六辔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奉时辰牡,辰牡孔硕。公曰左之,舍拔则获。游于北园,四马既闲。輶车鸾镳,载猃歇骄。”秦军的英武、骏马的嘶鸣、仪仗的盛大、猎犬的凶猛、群鹿的肥硕、战车的豪华等,将秦人“在西戎,保西垂”时“修习战备,高尚勇力”的创业立国精神风貌,“射猎为先”的民情风俗展示无遗,这都表明本区域是秦早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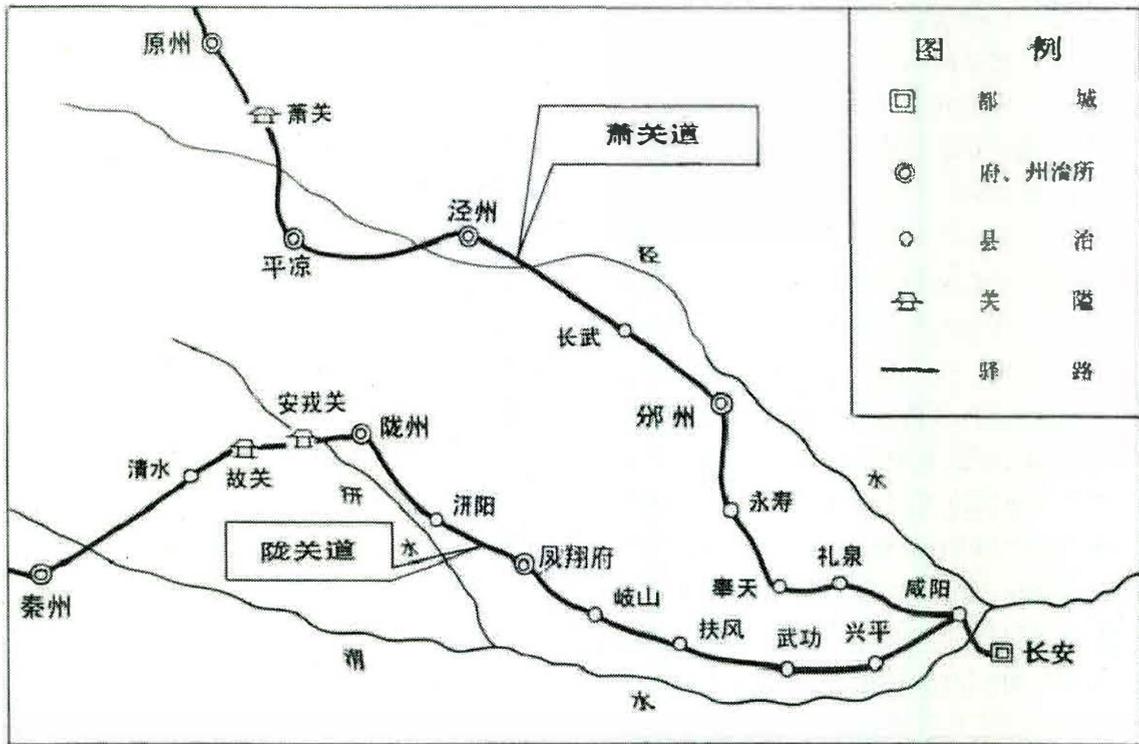
甘谷县磐安毛家坪遗址与武山县洛门东早坪遗址间距不到 1 公里间由一小遗址(刘家墩遗址)相连,毛家坪与东早坪遗址同位于渭河南岸的二阶台地,同属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层相同,墓葬形态(竖穴土洞墓)、出土文物也都极为相似,两个遗址其实是完整的同一遗址,东早坪遗址比毛家坪遗址更为宽广开阔,遗址东西长 8000 米、南北宽 400 米,总面积约 320 万平方米,从地理状况来看,东早坪遗址更可能是冀县县治的主城区。为配合“宝兰”二线的建设,2000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北部边缘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这次发掘共清理墓葬 71 座、灰坑 2 个,

出土铜、铁、陶、骨器 300 余件,其中发现了一座带有围沟的战国秦墓,这一特点在这一地区同时代的墓葬中尚首次发现,围墓沟可能为战国时期秦墓所特有,在秦大型陵园秦东陵一号陵园、凤翔秦公陵号,III 号、X 号陵园均发现有人工壕沟,从墓葬的规模、出土的随葬品上看,这座墓比同时期其他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这显示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毛瑞林:《甘肃武山东旱坪战国秦汉墓葬》)。需要指出的是,东旱坪战国晚期秦墓出土了一些漆器残片,因其严重腐蚀无法辨识器形(2012 年冬,其邻近的西旱坪遗址洛门初中建设工地,武山县文物局在清理西汉早期墓地时,也发现了一些漆器残片,刚出土时光靓色鲜,但很快风化碎蚀。)。《诗经·秦风·车邻》:“有车邻邻,有马白颠?……?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杨……”这说明当时本区多产漆、栗、桑、杨等树木,至今天水地区这些树木仍较多,特别是天水张家川及其邻近的西和、礼县等地盛产漆树,闻名于世的天水传统雕漆工艺,便是一个明证,这也表明,甘肃天水地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漆器工艺生产区之一。以上这些考古成果,特别是“用鼎制度”“车舆制度”“带围沟秦墓”都反映出本区域春秋战国的

墓主身份起码属于县大夫以上级别贵族规格,结合《水经注·渭水·卷十七》有关故城溪水的记述,毛家坪—东旱坪遗址区域应该就是《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前 688 年)伐邽、冀戎,(冀县)初县之”的治所地。

早期冀县县域,除包括今甘谷渭水流域广大地区外,还应包括今武山县洛门镇东部地区,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这不仅在毛家坪—东旱坪遗址考古调查发掘器物之间联系体现,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亦可说明,《汉书·地理志》云:“冀……有朱圉山,有缙群山,有洛门聚”,《后汉书·輿器传》云:“洛门,聚名也,在今秦州伏羌县西”,有学者认为,历史上有大洛门、小洛门之别,大洛门指伏羌县西四十里有永宁镇一带(该镇在清康熙年间被地震湮没),《后汉书·郡国志·冀县》:“洛门聚,来歙破輿器处”。依据《水经注疏》清楚的表明《汉书·地理志》所载洛门聚应该指的是今天洛门镇东部地区。民国吕式斌撰著的《今县释名》一书即认为今甘谷县名之来源,系因县内原有“三谷水”而得名,而“三谷水”指的就是洛门东部的大南河水。

(作者单位:武山县文物局)



敦煌卷子流散记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二十二日,看管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篆在16号洞窟发现了数万卷唐代写卷,多为经卷、文书、写本、绢画等,因之,16号洞窟被称为“藏经洞”。敦煌卷子发现之始就开始流散。

早期流散是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间。在藏经洞发现的当年,敦煌县令严泽就得到藏经洞的一幅观音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敦煌知县汪宗翰也得到一些佛画和经卷,汪宗翰又将自己所得的一部分转赠给叶昌炽、张筱珊、张友履、陆季良等人。其中,甘肃学政叶昌炽得到藏经洞佛画两轴、写经5卷。后来,王道士挑出一批写本经卷,赠送给驻扎酒泉的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敦煌石室记》载:王道士“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廷栋没有表示出特别的兴趣,也没有提出任何保护的措施,但将自己所得陆续转赠,一部分作为礼物送给了一个比利时的税务官和远在新疆的伊犁将军长庚,更多的卷子仍存于廷栋家中。这批卷子的去向,据水梓《张广建督甘时期的见闻》记载,民国六年(1917年)十二月,肃州驻军哗变,廷栋被杀,卷子落入甘肃督军张广建、甘凉道尹许承尧、安肃道尹杨炳荣、肃州巡防帮统周炳南手中。后来这些卷子辗转流传,有的不见踪迹,有的收藏于国内和国外的博物馆、图书馆,其中,张广建分得的卷子后来出现在日本三井文库。在敦煌卷子早期流散中,还有一些政要也得到一些卷子。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出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两江总督的端方等人,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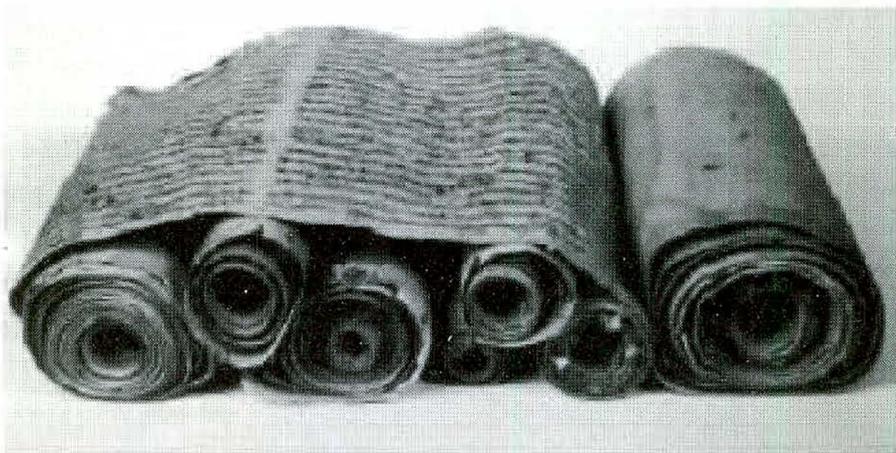
过敦煌县长汪宗瀚、敦煌文人王宗海,以及在兰州任职的严金清等人,获得一些敦煌卷子。其中,叶昌炽的《水月观音像》等藏品,后来由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收藏。

敦煌卷子流失异域是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开始的。是年三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敦煌,当他得知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写本和绘画后,带着他的中文秘书蒋孝畹直奔莫高窟,“准备用最为妥善的办法获取这批写卷”。斯坦因被允许进入藏经洞。当时的藏经洞中塞满了写卷、绢纸绘画的包裹,只能容下两个人站在里面,所以,斯坦因就在16号窟中搭了个帐篷,由蒋孝畹和王道士夜间把包裹运到帐篷中展示。斯坦因付给王道士四个马蹄银(相当于200两银子),就将29箱装有汉、藏文写经和更多的美术品、非汉文写卷捆载而去,从西北边境悄悄出境,开创了敦煌卷子流失异域的先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法国人伯希和接踵而来。由于他可以讲流利的汉语,很快被王道士允许进入藏经洞内拣选写卷。伯希和知道自己无法获得所有洞内的资料,因此为自己订立了几个选择标准,即选取背面有非汉文的卷子、带有写经题记的卷子、估计未入佛藏的卷子和非佛教的典籍与文书。伯希和以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藏经洞宝藏的精华。之后,斯坦因又第二次来到藏经洞,又攫取了一些写卷。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在敦煌获取600余卷写卷。

清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伯希和把从敦煌所获的卷子运回法国后,携带一箱样本来到北京,并在他居住的八宝胡同展示了敦煌卷子。一时间,北京的学术界人士董康、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

蒋黼等,或观看,或抄录。伯希和向他们透露了敦煌藏经洞的实情,说敦煌石室上留存有 8000 轴写卷,如不早日购运北京,将会被人攫取散尽无疑。罗振玉听后又惊又喜,立即报告学部左丞乔茂楠,请火速拍电报给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藩,立即查封敦煌藏经洞,收拾残余,购回学部。并由罗代拟电报:“行陕甘总督,请飭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石碑,勿令外人购买。宣统元年己酉八月二十三日。”而此时,距藏经洞发现已整整 9 年。

敦煌卷子运京途中和运京后又遭到流散。甘肃方面接到学部电报后,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刚刚到任,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点查剩余卷子,解运京师。1910 年,劫余敦煌卷子从敦煌启运。陈泽藩派傅宝书、武相臣两人负责运卷大车的押运。傅、武两人押解途中,不尽心力,所经之地,敦煌卷子任由当地官员抽取、挑拣。第一站先到敦煌城内,停车于东街小学院内,敦煌官绅乘机窃取。据吕钟缙修《敦煌县志》载:“当时敦煌官绅共拿过二千余卷。”傅、武两人又为掩人耳目,一卷撕开充作两卷。许承尧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他原藏的敦煌卷子题跋中,对运卷大车途中分散卷子的情形说得十分清楚:“清学部乃遣人犍其经人都,号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数。其留于武威、张掖、皋兰者不少,皆精整。”许承尧民国二年(1913 年)到兰州时,碰见市面上出售敦煌写经,购买多达 200 卷。民国八年(1919 年)至民国十年(1921 年)任兰山道尹和甘肃省长的陈阉,自称在甘肃为官时,与朋友争购敦煌写经。甘肃督军的张广建竟以敦煌卷子为买官契,根据卷子多少换取官位大小。贾纘绪在民国六年(1917 年)之后的 10 年里,曾先后任甘肃烟酒



总办、甘肃省教育厅长、安肃道尹,在任期内购得敦煌卷子多达百余卷。此后,北京大学陈万里、向达等人西行敦煌,一路上还时时看到开出大价钱出售的敦煌藏卷。

运卷大车自敦煌至北京,沿途流失者甚多。到达北京后,没有直接开进学部的大院,而是进了代理甘肃巡抚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的家里。何震彝叫来他的岳父藏书大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廷琛、方尔谦等人,在私家宅第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挑选,选出的精品收入自家书房。当时,报官的敦煌卷子清单上只有卷数,没有具体卷名、行款等,所以,这些人在取走一些精品后,又将一卷撕成两份、三份,以符合上报清册的数量。之后,才移交学部,共 18 箱,编号计 8679 卷。这些卷子就是今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的来源。民国年间敦煌写本收藏家周廷元 20 世纪 30 年代末所著《周廷元敦煌写经守残留影》之(编目赘劫记载道:“而今北平图书馆所存的八千余写卷,是其糟粕残余者,言念及此,尤堪痛恨心碎矣。”那么,被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等人私吞之卷子下落如何呢? 嫡目赘前载:“学部贻书甘肃,令购运来京,其菁华固已无多,时获甘督何彦升有子在都,故先落其手,佳者复为其所留。其妇翁李盛铎且分得唐人所写札注书经等,尤可宝贵,凡与何子相契者无不得之,有分至数百卷之多者,故肆出售不绝也。”

不久,这种分裂卷子以充件数的行径很快就暴露出来。当时,学部侍郎宝熙发现运送学部的卷子有问题,于是,他写了上告奏折,负责押运的

傅宝书被扣留。只因辛亥革命起,清朝官员自顾不暇,不得已,将傅某放回甘肃,此事不了了之。(摘自《甘肃省志·档案志》)

《甘肃省志·军事志》概述

编者按:《甘肃省志·军事志》是首轮《甘肃省志》第十卷,上限溯自有关军事工作发端时期,下限断至1990年,分上、下两册。转载志稿《概述》全文,以供鉴赏。



甘肃省位于祖国大西北腹地,东连陕西,南接四川、青海,西邻新疆,北靠内蒙古、宁夏,并与蒙古共和国接壤。全省现设14个地级行政单位,86个县级行政单位,幅员辽阔,东西长1655公里,南北最宽处530公里,最窄处25公里,总面积45.4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七位。地形狭长,纵深深远,具有东蔽关中,西通新疆,南应巴蜀,北控朔漠的重要战略地位,是我国战略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军区,均驻省会兰州市。

甘肃地势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境内多高原和山地,大部分海拔在1000米~3000米之间,盆地、川滩、平原、草地坐落其间;西部地区有广大的

平原绿洲,并有宽阔的沙漠、戈壁分布。复杂的地势对军事活动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陇东和陇西地区:系黄土高原偏西部分,以陇山为界,以东为陇东高原,以西为陇西高原,南接陇南山地,东起甘陕省界,西至乌鞘岭。区内沟壑纵横,平面起伏较大,黄土梁峁、山丘密布,并有较大的盆地和川地。黄河沿线峡谷较多,自南向北,有寺沟峡、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桑园峡、小峡、大峡、乌金峡、黑山峡等,均有良好的水库建坝地址,水利发电潜力很大。交通比较便利,有铁路、公路干线通过。人口密度较大,工农业生产较发达,是本省兵员和军用物资的主要供应地区。

河西走廊:位于祁连山和北山之间,东起乌鞘岭,西止甘新交界,地形东西狭长、平坦,分布着3

个农业灌溉区,即石羊河水系的武威、永昌绿洲灌溉区,黑河水系的张掖、酒泉绿洲灌溉区,疏勒河水系的玉门、安西、敦煌绿洲灌溉区。河西走廊是全省的主要商品粮基地,亦称“河西粮仓”,又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起着屏障关陇、连接新藏的作用,历来是经略西域的前进基地。历史经验表明,河西存,西域即存,河西不保,西域必然丢失。河西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其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祁连山位于河西走廊南部甘青两省交界地,东起乌鞘岭,西至当金山口,长达1000余公里,主峰海拔5564米,许多山巅终年积雪,发育着现代冰川,是河西走廊天然的“高山水库”。祁连山是河西走廊的南面屏障,山区内分布着许多沟谷,是战时的战略机动通道。北山山地包括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等,海拔2000米~3400米,干燥缺水。两山地区的高海拔和高寒特点,是军事行动的不利因素。

陇南山地:位于本省南部,属秦岭西延部分,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迭山、岷山是本区最高山脉。区内山峦重叠,岭峻、坡陡、谷深,险关、隘口密布,易守难攻,是阻滞军事行动的天然屏障。虽有几条国道、省道分布,但总体格局仍是交通不便。高山狭谷对机械化部队行动和给养运输影响较大。

甘南高原:位于本省西南隅,属青藏高原东延部分,高山较多,山间有广阔的草原,并有部分洼地、沼泽。区内地势高峻,气候严寒,对行军、作战有较大影响。

甘肃境内共有大小河流450多条,分属黄河、长江、内陆河3大流域、9个水系。黄河支流主要有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河、庄浪河、苑川河、祖厉河、泾河等;长江流域主要有嘉陵江及嘉陵江水系的西汉水、白龙江、白水江等;内陆河流主要有石羊河、黑河、北大河、疏勒河、党河等。全省年径总流量603亿立方米。黄河干流纵贯本省中部地区,水能资源丰富,但年内流量变化大,夏秋水多,冬春水少。长江流域在省境东南部,水源充足,年内流量比较稳定,冬季不封冻。内陆河流都在河西,大部分发源于祁连山,最后流入内陆湖泊或消失于沙漠戈壁中,其特点是流程短,流速急,下游

浅,水量少,河床多变。江河是行军作战的天然障碍,利用江河、克服障碍,是古今军事行动的重大问题,也是未来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必须重视的课题。

气候对军事行动影响很大。甘肃属大陆性气候,自然降水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各地差异大。特别是西部地区,因远离海洋,暖湿气流不易到达,成雨机会少,气候干燥,干旱缺水。解决饮水和机动车辆用水,始终是军事工作的重大难点和难题。

甘肃省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经过40余年的经济建设,全省已建成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工业为支柱,包括黑色冶金、建筑材料、煤炭、轻纺、医药、食品、电子、交通运输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形成兰州、天水、白银、金昌、嘉峪关、玉门等一批工业城市和一大批工业城镇,造就了一支产业工人队伍和技术人才队伍。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一批水利工程建成,使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300余万亩。农业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日益普及。省内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国防建设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甘肃战略资源丰富,其中镍资源居全国之首,在军事工业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铂、钨、钼、钽、铀、钴、铬、锑等稀有金属,储量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在国防和科研上具有重要意义。铜、铝、铅、锌、白银、黄金储量和产量也相当可观。这些宝贵的矿藏,将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持续发展,做出更重要的贡献。

甘肃是西北交通的枢纽地区,已建成陇海、兰新、兰青、包兰、干武等多条铁路干线和109、211、212、213、215、309、310、312、313、316等多条公路干线,全省公路交通网络已经形成,多条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铁路、公路的发展,极大地方便了各地的交通。特别是贯穿东西的陇海、兰新铁路和312号公路,是国家的重要交通干线,是连接内地和新疆的交通大动脉,具有承东接西、聚散转运的功能,加强了我省同东西各地的联系,进而向西延伸至中亚、西亚和欧洲。民用航空以兰州为中心,

与北京、上海、成都等 16 个大中城市通航,省内可直达嘉峪关、敦煌、庆阳。邮电通信事业发展迅速,省内已形成光缆、微波、卫星等现代化通信网,多种通信手段互为补充、相互协调。交通和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为军队的机动运转、通讯联络、信息传递,提供了有力保障。

甘肃人口众多,军事潜力大。全省现有人口 2237 万余,其中男性 1159 万余,如以 10% 计算,后备兵员在 100 万人以上。目前,民兵组织普及全省,组建预备役师 2 个,一旦发生战争,广大青年即可奔赴保卫祖国的战场。

甘肃特殊的军事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便利的交通,使其在未来反侵略、反分裂的战争中,更具重要战略地位。

二

甘肃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军事活动,发端久远。据古文献记载,商朝时期,周人先祖即活动于今陇东的庆阳、宁县一带;商朝中期,周人部族同戎人部族曾在这一带多次发生战争,周人受戎人攻掠,被迫东迁岐下。商朝末期,周人部族已很强大,其首领姬昌(后称周文王)曾率兵西入陇东,先后消灭密须、阮、共、油、彭、卢等国。这些小国,其位置大都在今平凉地区和庆阳地区西南部。周人控制泾水上游后,建立了稳固的后方。不久,居于渭水流域的羌人部族也归顺了周人。姬昌之子姬发(后称周武王)——兴兵灭殷商时,羌兵即随从东征。姬发建立周朝后,命贵族“伯”及“黑伯”统军镇守陇东,对这一带进行统治。

西周时,秦部族在陇西地区兴起。《史记·秦本记》记载:秦人先祖非子,居西犬丘,好畜牧,“邑之秦”,筑“秦亭”以居。此后,秦人和戎人曾在陇山以西多次发生战争。西周末,西戎攻秦人,秦人遭受巨大损失,大骆一族被灭。周宣王即位后,封非子后裔秦仲为大夫,命其攻伐西戎,是秦国立国之始。公元前 822 年,秦仲战死,宣王又派兵七千,命秦仲子庄公统率,再伐西戎,破之。庄公受封为“西垂大夫”,“居西犬丘”,“保西陲”。公元前 777 年,秦襄公东迁地。不久西戎攻占周都镐京,杀周幽王,秦襄公率陇西兵救援周室,并护送周平王东迁

雒邑,是为东周之始。襄公救周有功,被平王封为“诸侯”,并“赐”岐山以西之地,秦国日益强大。秦武公十年(公元前 668 年),秦国兴兵西进,攻灭“邽冀之戎”,在其地置邽、冀 2 县。战国时,秦国不断兴兵征伐西戎,开拓疆土,先后剪灭绵诸、獯、狄、襄、罕、开、义渠等戎国,把势力扩张至洮水一带和崆峒山以西、以北地区。秦国在陇东置北地郡,在陇西置陇西郡,“筑长城以拒胡”。秦国在北地、陇西 2 郡设置郡尉,掌管一郡兵事;其下分置许多县、道尉,掌管本县(道)兵事。郡县尉的设置,是中国历史上在地方政权机关设置军事机构的开始。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秦王朝。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 年),命大将蒙恬率军驱逐匈奴过黄河,占领了陇西、北地 2 郡西部地区,陇东、陇西、陇南广大地区尽数为秦王朝所有,其势力范围西达于黄河一线。为了保卫新开辟的地区,秦始皇又命蒙恬沿黄河一线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今岷县),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

汉承秦制,进一步发展了封建制国家,并使中国古代社会出现强盛时期,与之相适应的军事体制也得到新的发展。汉朝的兵种分为羽林军(朝廷警卫部队)、外军(朝廷直辖的野战部队)和郡县地方部队、边防戍守部队;普遍实行征兵制,为军队提供数量充足、训练有素的兵员,开创了中国古代军事体制的先河。西汉武功很盛,开拓了不少新的疆土,特别是对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开拓,对战胜匈奴,巩固汉朝边防,具有重大意义。东汉时期,虽然羌人数次起兵反汉,但大统一的格局并未被打破。综观两汉历史,军队在维护国家大统一的事业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两汉 400 年大统一的历史,基本奠定了中国的版图疆域,汉民族和汉文化得以形成。

三国时期,今甘肃省地分属魏国、蜀国,兵制较两汉时期有所发展,境内广设州、郡、县三级政权,建官置守;州刺史、郡太守,统领州兵、郡兵,镇守地方。三国时期虽短,但征战频繁,省境辖地是魏、蜀两国角逐的主要战场之一,发生过许多著名的战役和战斗,如曹操夺取陇右、河西,诸葛亮“兵

出祁山”攻魏,蜀将姜维“九伐中原”,魏将邓艾夺取陇南等等。西晋时,晋王朝在陇右与河西鲜卑贵族进行了激烈的军事对抗。西晋末期,朝政腐败,“八王之乱”引起社会矛盾激化,北方少数民族乘机南下,迫使晋室南迁。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政权,接着出现的是宋、齐、梁、陈4个朝代;在北方出现了许多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接着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从公元四世纪初一直延续到六世纪末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为止,前后持续了近300年时间。在此期间,今甘肃地区先后建立的割据政权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西秦、仇池、武都、阴平、宕昌等国;立国于南方的宋、齐、梁和北方的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北魏、西魏、北周,也都把势力伸张到陇南、陇东、陇右、河西等地。这些割据政权的出现、争夺和更替,反映了当时社会极端混乱的局面。这种混乱局面,一方面使生活在这里的广大人民遭受极大苦难,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又引起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以及各种经济、文化的大交流,为国家、民族的大统一和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隋唐时期国家实现大统一,特别是唐代前期,是我国古代封建制国家高度发展和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这种大统一局面的出现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是与当时军力的强大是分不开的。初创于西魏、发展于隋唐的府兵制,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兵制,寓兵于农,寓兵于民,平时生产,定期训练,轮流上番(服役),不仅节省了大量军费,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保证了充足可靠、训练有素的兵员,从而加强了军力,巩固了边防。唐初,朝廷大力发展河西,使之很快繁荣起来,成为经略西域的前进基地。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李世民派行军总管侯君集出敦煌,收复西域。贞观十六年,唐朝大军再出河西,击败西突厥,设立安西都护府,大力经略西域。后又设立西域四镇(龟兹、焉耆、疏勒、于田),置官驻军加强统治。唐军入西域作战,所需粮草,皆从河西运送;军队进退,官员休养生息,也以河西为基地。唐朝前期,由于军力强盛,因而朝廷统治有力,全国统一,社会安

定,贸易发达,是河陇地区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中原地区发生“安史之乱”,河陇驻军东调平乱,吐蕃势力乘机东犯,至唐肃宗末,即侵占河西和陇右大部分地区。陇右既陷吐蕃,使关中和京师长安失去屏障,吐蕃兵遂于广德元年(763年)10月东入大震关,长驱直入,进逼长安,唐朝守军战败,唐代宗慌忙逃往陕州(今河南陕县)。贞元后,唐王朝在陇东先后置邻宁、泾原节度使,筑马岭、方渠、木波、合道、安国、百里、长武、西屯、崇信、永信等城,置军设防,从而遏止了吐蕃兵的侵略势头,关中、长安始安。

宋代以文臣知军,路、州地方长官多兼马步军都总管,并置提辖、都监专理军事和社会治安。宋代的兵种有禁兵(朝廷直辖军)、厢兵(镇戍部队)、州兵(地方部队)、乡兵(民兵)、蕃兵(收编的少数民族部队)。北宋王朝为防止西夏军内侵,在陇东、陇右分设泾源、环庆、秦凤、熙河4路,与陕北之邠延路合称为“陕西五路”,并在庆州、渭州、秦州、熙河分别驻有管理各路军事的经略使;县以下设堡、寨、城、关,均筑城堡于“扼险控御”之处,置兵保民。三陇四路常年屯兵20余万,最多时近30万。北宋王朝为了同西夏争夺三陇、陕北地区,自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至靖康二年(1127年),双方进行了100余年的战争。这期间,尽管宋军中也涌现出一批治军有方、用兵有道的杰出将才,也打了一些胜仗,但由于宋王朝对边将的军权限制过死,推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总体上败多胜少,直至国力、军力损耗巨大,被金灭亡。完颜氏建立的金王朝攻占中原后,即转锋西北,消灭了宋王朝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势力,从此,秦陇地区的军民,展开了长期的抗金斗争。

西夏是公元11世纪初兴起于西北的地方割据政权,立国时间长达190余年,最盛时,其疆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辖领20余州,今甘肃省河西地区尽为其所有,并与宋王朝长期争夺陇东、陇西,打了一些漂亮仗。公元1205年,蒙古军开始进军河西、银州,经过多次战役、战斗,于1226年攻灭西夏,接着占领三陇地区,进而向中原进军,至1279年灭亡南宋。至元八

年(1271年)世祖忽必烈改蒙古汗国为元朝。元朝在甘州(今张掖)设置甘肃行省,这是甘肃设“省”的开始;又置甘肃行枢密院。自此后,甘州遂成为元王朝统治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元王朝统治中国90年,若从成吉思汗进军西北时算起,统治河西、三陇地区则长达150余年。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加强国家武装力量建设,创设了都司、卫、所制度,将军队编入卫所之中,实行屯垦与守御相结合的制度。在今甘肃境内设立26卫、9个千户所,分别由陕西都司(驻节西安)和陕西行都司(驻节甘州)统辖。这种“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寓兵于农、屯守结合”的军事制度,对巩固和维护明王朝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明代的主要边患是北方的鞑靼和瓦剌。为了防御鞑靼、瓦剌入犯,明王朝很重视边防建设。明朝建立不久,征虏大将军冯胜西征,就在肃州以西之嘉峪山下,修筑了“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与万里之外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东西遥望。此后,明朝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财力,先后18次在北部地区修筑长城,以嘉峪关为西端起点,全长6000余公里,其中甘肃境内有1800余公里。明王朝为了保卫北部边疆地区,曾设置“九边重镇”,相等于九个省级军区,其中甘肃、宁夏、延绥三镇被称为“西三边”,并设陕西军务总督,驻节固原,督理西三边防守事务。甘肃镇是“西三边”最西一镇,总兵官挂平羌将军印,驻守甘州,专守河西边防。其下所设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军官,分驻河西各地,统领守兵,守备长城沿线各要点。但由于明朝奉行“来则御之,去勿穷追”的御敌于长城之外的消极防御战略,因而始终未能解除鞑靼、瓦剌对边疆地区的威胁,边患一直伴随明王朝灭亡。

明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是时,甘肃的陇东地区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和陕北一起,成为农民起义的策源地。庆州人郝临庵、刘道江、何崇渭,原州人红军友等,在崇祯二年(1629年)就领导安化、原州、合水、宁州等地农民起义,攻州破县,杀死反动官吏,开官仓赈济灾民,继而打土豪、分粮食、分牛羊。农民起义军的

行动,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者日众,达数万人之多。郝临庵等农民起义首领,在同官军作战中先后牺牲,所率农民军大部分投归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队伍。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首领,率农民起义军转战中原大地,并数次入陇转战。崇祯三年(1630年)他率部众入陇,先后在临洮、渭源、河州一带杀官放粮,抗击官军追剿;崇祯七年,他又入陇,率农民军攻平凉,围通渭;崇祯九年,又由川陕入陇,攻阶州、巩昌、成、徽、两当等地,后率众东入商洛山。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派部将贺锦、田见秀等率部西来,先后攻破平凉、兰州、甘州、肃州等地,杀死明王朝韩王朱亶嶠,击毙甘肃巡抚林日瑞、甘州镇总兵官马圻等。农民起义军在甘肃活动10余年,最后被官军击败。

公元1644年,清王朝乘大顺政权立足未稳之机,南入山海关,攻占北京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建立了全国性政权。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建立的封建制国家,在其统治的260多年中,实现了全国的空前大统一;但由于满洲贵族推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因而不断激起各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顺治五年(1648年),甘州驻军中的回族军官米喇印、丁国栋发动反清起义,一度攻占凉州、兰州、狄道等城,给清王朝的统治以有力打击。嘉庆三年(1798年)白莲教农民起义军进入甘肃,共有五六股、两三万人,活动遍及陇南、陇中,时间长达4年多,猛烈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同治初期,平凉、金积堡、秦安、河州、西宁、肃州等地先后爆发回民起义,配合陕西回民军反抗清王朝统治。这次回民起义,遍及全省各地,时间长达11年,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因战乱时间长,地域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

三

公元1911年(清宣统三年,农历辛亥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腐败统治,结束了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甘肃虽然地处西北边陲,但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后,孙

中山的革命思想仍然通过一些先进分子传播到了甘肃,并爆发了甘州、凉州、肃州、宁州、阶州、灵台、文县、渭源、秦州等一系列起义。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起义,有的围攻县城,有的捣毁税局,有的攻打官军,有的捕杀贪官污吏,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其中以秦州起义规模最大,坚持斗争时间最长。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黄钺领导秦州革命志士2000余人起义,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通电南京、上海、武汉及川、陕各省,同甘肃省的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并牵制了攻陕甘军的力量,有力地支援了陕西革命军的反清斗争。

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它极大地提高了甘肃广大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使人民大众获得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从而为尔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甘肃的辛亥起义,最终在省内外封建势力的镇压下遭到了失败。民国元年3月15日,北京袁世凯政府任命前清甘肃护理布政使赵维熙为甘肃都督,甘肃军政大权依旧为封建官僚所把持,辛亥革命成果为之丧失。此后,相继担任甘肃都督、督军的有张炳华、张广建、陆洪涛等人,他们在北洋军阀政府支持下,反对民主共和制度,竭力维护前清封建统治的陈规旧制,重用旧吏,把持政权中枢、要津,宣扬封建思想,排挤、迫害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在甘肃各地,则形成了陇东、秦州、河州、凉州、甘州、肃州、西宁、宁夏八镇镇守使分疆割据的局面。这些镇守使都是清朝的封建官僚,民国成立后摇身一变,打着“拥护共和”的旗号,拥兵自重,各霸一方,委派县官,任意摊派粮款,搜刮民财,把全省广大人民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在封建势力统治下,统治者与劳动人民之间、民主革命派与封建顽固派之间、统治者相互之间充满了尖锐的矛盾,不断爆发武力对抗。

民国3年(1914年)4月下旬,河南白朗起义军万余人进入甘肃。起义军高举反袁旗帜,所到之处,“打富济贫”,赢得了各地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支持,纷纷起而响应。同年夏秋,甘肃督军张广建推行“新税制”,加紧剥削农民,陇东16县的农民纷

纷奋起抗税,迫使统治者废除“新税”。民国6年,甘肃革命志士响应孙中山“打倒假共和国,建立真共和”的号召,在狄道发动护法起义,同盘踞甘肃的封建军阀进行斗争。民国8年和9年,甘肃人民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开展“倒张”运动,终于迫使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于民国9年12月倒台离甘。

民国13年(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北洋军阀贿选总统曹锟统治的政府,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冯部改称“国民军”。民国14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管辖范围包括甘肃、察哈尔、绥远等省,故又称冯部为“西北军”。不久,冯又兼任甘肃军务督办。10月,冯派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部入甘,并代行甘肃军务督办职,开始了国民军统治甘肃的历史。国民军入甘后,刘郁芬借统一全省军政号令,限制地方军阀势力,因而同各地方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形成混战局面,先后发生了陇东镇守使张兆铨、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等联合反抗国民军;凉州镇守使马廷勃发动兵变,屠杀人民;特别是民国17年(1928年)的马仲英兵变,是国民军统治甘肃时期发生的规模最大的军事事件。马仲英拥众2万余人,同国民军作战,历时1年有余,国民军以6师之众,与之殊死战斗,消耗了不少兵力,致使冯玉祥在同蒋介石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马仲英同国民军的战争,祸及10余县,数万回、汉人民惨遭杀戮,给甘肃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民国18年夏季爆发了冯玉祥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驻甘国民军东调参战,蒋介石抓住时机,插足甘肃,收罗和扶持地方势力,反对国民军,积极创造条件,控制甘肃。民国20年8月,兰州发生“雷马事变”,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属冯玉祥部),以武力扣押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使甘肃政局再次出现混乱局面。这时,蒋介石命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派兵入甘平乱,杨派其参谋长孙蔚如率陕军主力第十七师进军甘肃,击败国民军残余势力,控制了甘肃全省局势。但陕军并非蒋介石嫡系,蒋遂于次年派其嫡系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率部入甘,逼陕军退出甘肃。同时,蒋又用“封官”

等方式,收买甘肃地方势力。这样,蒋介石集团便直接控制了甘肃。自此,甘肃省成为蒋介石集团控制甘、宁、青、新诸省的重要基地;省会兰州市从抗战时期起,先后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西北行营、西北行辕、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驻地,成为蒋介石集团统治西北的军事、政治中心。

四

在现代革命史上,甘肃是人民革命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甘肃特支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而解体,甘肃党的工作暂由陕西省委领导。自30年代初起,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东蛟、梁干丞、李艮、焦唯炽、孙作宾等来甘肃,开展兵运工作,先后发动了10多次革命兵变,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当兵变、靖远兵变、西华池兵变,而只有西华池兵变取得成功,其余均遭敌军追剿、镇压而失败。这些兵变播下了革命火种,锻炼出一大批革命骨干,推动了甘肃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

1929年底,著名共产党员刘志丹来到陇东东北部的南梁地区,开展群众武装斗争。1930年10月,刘志丹组织了一些革命青年,夺取驻合水县太白镇民团的一批枪支弹药和马匹,组建了陕甘边界地区的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党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和陕北保运队来到庆北林镇庙,同南梁游击队会合,史称“林镇会师”。这两支游击队会合后,陕甘边界的革命力量大大加强。1932年1月,两支游击队在正宁县柴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移驻正宁县三嘉源,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西北的革命武装斗争进入公开打出红旗,实行土地革命的阶段。

红军游击队建立后,在陕甘边界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1932年3月,在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党委领导下,在正宁县寺村塬召开了寺村塬、湫头、五顷塬、南邑堡、徐家庄等72个村庄的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界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的赤卫军总指挥部。但为时不久,即遭到敌军

的“围剿”,红军游击队不得不向东转移,该革命政权因失去依托而解体。

1932年12月,陕甘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西北地区建立正规红军的开端。红二团成立后,在陕甘边界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33年3月,成立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根据地建设。4月,在照金召开边区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此后,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在陕西耀县、旬邑和甘肃正宁3县交界地相继建立了5个乡级革命委员会和20多个农会,根据地面积达到2500多平方公里。当年4月,国民党调集军队和民团,对根据地进行“围剿”,红二团南下作战失利,陕甘边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10月,照金根据地中心薛家寨失守,周冬至主席牺牲,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被迫向陇东北部转移。11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总结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11月8日,红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王泰吉任师长(后由刘志丹接任),高岗任政委(后由杨森接任),辖第三团和骑兵团,共500余人。从此,陕甘边界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包家寨会议之后,红四十二师在南梁地区分路打击反动武装,拔除敌军和民团据点,消灭土匪,惩治恶霸;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乡村政权,展开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运动。至1934年初,红色区域扩大到方圆100余公里的范围,建立了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农民协会和赤卫军组织,个别地方建立了共产党的农村支部。1934年2月,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堡小河沟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牛羊,实行土地革命,使南梁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红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有了可靠的后方。这时,陕甘两省的地方军阀,纠集8个团、1万余兵力,对南

梁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红四十二师在游击队有力配合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纵横驰骋,南征北战,给予进攻的敌军以有力回击,至5月,“围剿”的各路敌军便先后退去,南梁根据地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5月22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地区的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特委,由张秀山任书记;同时决定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红四十二师改由杨森任师长,高岗任政委。此后,红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英勇奋战,把根据地扩大到东至洛河川、西至元城川、北至宁条梁、南至正宁、旬邑的广大区域,解放了包括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在内的部分农村,先后建立了华池县苏维埃政府和庆北、合水、赤安、甘洛、安塞等县革命委员会,使南梁根据地成为较为稳固的红色战略区域。

1934年11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地区的荔园堡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亦称南梁政府),习仲勋任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任副主席;同时选举了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和赤卫军总指挥部(朱子清任总指挥)。此后,南梁根据地武装斗争迅猛发展,红四十二师在根据地人民和游击队支援下,不断出击,拔除了敌人在庆北地区的全部据点,成立了赤安、庆北、合水等县苏维埃政府和各级群众组织。在陕甘边南区,武装斗争也取得很大胜利,成立了南区革命委员会,先后建立了14支游击队,根据地和游击区扩大到正宁、宁县及陕西旬邑、耀县、宜君、淳化等县。

这时,蒋介石集团积极策动陕甘宁3省驻军,对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再次进行大规模“围剿”,参加的兵力有胡宗南、马鸿宾、高桂滋、井岳秀、杨虎城等部的5个师、26个团、4万余兵力。为了打破敌军的“围剿”,1935年2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塄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个特委的工作,发动广大军民进行反围剿作战。经过7个月的艰苦斗争,打退了敌军的进攻,共歼敌6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取得了第二次

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地跨陕、甘两省、20余县、人口逾百万的陕甘苏区。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发展到2500人,陕北红二十七军发展到2000余人,地方游击队达到7000余人。

1935年8月,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增调东北军4个军、13个师,配合陕甘宁地方军阀的军队,从东、西、南3个方向进攻苏区红军。敌人的这次“围剿”,动用的兵力之多,规模之大,大大超过了以往对陕甘红军的任何一次“围剿”。正值此时,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甘,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统一指挥边区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经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歼灭东北军6000余人,毙敌师长何立中,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各种炮28门,取得重大胜利。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随即,在陕甘边界发起直罗镇战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歼灭东北军一〇九师全部及一〇六师1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缴获各种枪3500余支。这次战役结束后,“围剿”的各路敌军即慌忙退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结束。从此,陕甘红军汇入了主力红军洪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

五

甘肃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都经过的一个省份,又是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地方。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甘肃的陇东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在这里同敌军英勇作战,守住了边区的西大门,为保卫边区做出了重要贡献。人民军队在甘肃的斗争,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

1935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境内,攻克天险腊子口,进占哈达

铺,并对红军部队进行整编,组成了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的陕甘支队,决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跨越渭河和西兰公路,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陕甘支队改称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1936年8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进入甘肃境内。红四方面军发起岷(县)洮(州)西(固)战役,攻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4座县城及洮河、渭水间广大乡村,扫荡反动势力,歼敌近万人,缴获各种枪炮4000余支(挺、门)。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发动成徽两康战役,攻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座县城及附近乡村,歼敌1500余人,缴获各种枪800余支。从9月下旬开始,红二、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已进占静宁、靖远、会宁等地,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和红军一部抵达会宁县城,受到红一方面军部队的热烈欢迎。10月10日,在会宁县城召开庆祝会师的大会。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抵达将台堡,受到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的热情欢迎。10月23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到达靖远县打拉池,同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及一方面军部队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在靖会地区的会师遂告完成。

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长征,占领了10余座县城及30余县的部分乡村,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甘肃人民中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火种,促进了甘肃人民的觉醒,为发展西北抗日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国民党军队继续追击红军,11月21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密切配合,在环县发起山城堡战役,全歼胡宗南部二三二旅、二三四旅两个团,遏止了敌军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作战,同年11月改称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打通苏联、开辟甘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数倍于

己的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军队顽强拼搏,浴血苦战,历时7个月,大小70余战,毙伤俘敌2.5万余人,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和主观指挥上的失误,这支英雄之师最后弹尽粮绝,遭到失败,几乎全军覆没。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在这次西征中,西路军全军指战员,以不怕一切艰难险阻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同凶恶的敌人、极端艰苦的自然环境,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留下了无比英勇、悲壮的一幕。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华北,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的历史时期。甘肃地处大西北腹地,是支持全国抗战的大后方之一,苏联援华物资都经过这里运往各抗日前线;省会兰州,是我国空军的训练基地之一,又处于中苏交通的咽喉地段。因此,甘肃特别是兰州,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华北、华中大片国土的沦丧,兰州成为日本侵略军进行空袭破坏的重要目标。在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派遣大批远程轰炸机,对兰州实施了长期的战略轰炸,同时对省内的天水、平凉、武威、靖远、泾川、临洮、永昌、陇西等地,也经常进行轰炸、骚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1月初至1943年10月初,日本空军飞机对甘肃领空的入侵,包括空战、轰炸、侦察飞行、空中警戒、战术策应,多达1487架次,其中入侵兰州的竟达1100余架次。在保卫甘肃领空的战斗中,中苏两国空军和地面高炮部队密切配合,共击落敌机27架、击伤2架,沉重地打击了日军,保卫了东西交通的畅通,减少了人民群众的伤亡和财产损失。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在甘肃发展抗日民主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八路军在兰州设立办事处,彭加伦任办事处主任(后由伍修权接任),谢觉哉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代表。办事处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谢觉哉、彭加伦、伍修权等同国民党甘肃省上层人士保持接触,经常交换抗日救亡大计,取得谅解,先后建立了青年救亡读书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剧团、外省留兰青年抗战团、生活书店等抗日团

体；出版了《西北青年》、《热血》等进步刊物；支持进步青年投身革命，介绍300多人赴延安学习，参加八路军抗日；通过各种途径，营救西路军失散指战员近2000人返回革命队伍；协助孙作宾等建立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恢复了兰州、榆中、武威、靖远等地的地下组织。这些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革命力量。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顾合作抗战的大局，公开宣称“联共就是灭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又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政策，接着颁布限制“异党”活动法案，公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加紧军事进攻。国民党甘肃省府遵从蒋介石旨意，把“防共”、“反共”列为施政的首要任务，在陇东地区不断挑起摩擦事件，在1938年12月至1940年10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制造镇原、宁县、合水、庆阳、环县等70余次摩擦事件。驻守陇东的八路军部队，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行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保卫了陇东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于1946年6月发动了全面内战。次年春，胡宗南部、马步芳部等23万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占领革命圣地延安，陇东解放区几乎全部被敌军占领。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央军委决定，由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统一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反击敌军，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经2年英勇奋战，歼灭大批敌军，扭转了西北战局，扩大了解放区。陇东解放区人民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6、7月间，第一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制定了“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集中兵力攻击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7月，一野胜利结束扶眉战役，歼敌4.3万余人，胡宗南主力被消灭，残余势力退守秦岭以南地区，西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随后，一野又制定“钳胡打马”的作战方针，以十八兵团2个军牵制胡敌，集中10个军歼灭马步芳、马鸿逵两个军事集团。7月底，一野各部队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分左、中、右3路向甘肃进

军，发起陇东南战役，至8月15日，歼敌1.1万余人，解放县城23座，并切断马步芳集团（“青马”）同马鸿逵集团（“宁马”）的联系，为最后歼灭西北敌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8月20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起兰州战役，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兰州守敌。8月21日，攻兰各部队向固守兰州市区以南各山头之敌发起攻击，25日拂晓发起总攻击。在一野广大指战员的猛烈攻击下，敌军难以支撑，于当日晚全线溃退。26日凌晨，解放军占领城区各要点和黄河铁桥，11时攻占黄河以北之白塔山，战役胜利结束。是役，第一野战军歼灭马步芳部队及地方武装2.7万余人，溃散1.5万余人，“青马”军事集团主力被歼。兰州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军河西、新疆的大门，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军残余势力作最后抵抗的意志，加速了西北全境解放的进程。

9月初，人民解放军乘胜西进，发起河西战役，迫降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甘肃省府，起义、投诚4万余人，缴获大量枪炮、弹药、马匹和其它军用物资，解放县城16座。12月初，人民解放军进军陇南，国民党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副军长蒋云台等，在武都通电起义。12月15日，解放军攻占文县碧口镇，至此，甘肃全境均告解放。甘肃广大人民历经长期的艰苦斗争，获得了解放，从此跨入了新的历史。

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和人民赋予人民解放军的重任是反侵略、反分裂、反颠覆，即坚决反对外国势力的侵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反对分裂祖国的各种阴谋，实现祖国领土的统一、完整；保卫人民政权，粉碎一切颠覆阴谋和活动；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我军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上述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90年，甘肃驻军的建设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年10月至1959年，是甘肃武装力量由革命战争向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逐步转变和打基础的阶段。在此期间，驻甘人民解放

军在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胜利完成了剿匪、平叛作战任务,安定了社会秩序,为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认真执行中央军委的建军方针,完成了精简整编、缩减部队员额、建立健全兵役民兵工作机构及正规化训练等任务;在全省范围内实行普遍民兵制和义务兵役制,建立了国防后备力量动员体制。

第二个阶段,1960年至1966年10月,是驻甘部队和广大民兵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各级党委不断排除“左倾”思想干扰,领导部队、民兵建设不断向前发展,并取得较好成绩。广大指战员和民兵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加强,较好地发挥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了官兵团结。在部队中认真开展形势战备教育,广泛进行政治动员,圆满完成了支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福建前线炮战、参与打击美蒋高空飞机侦察等任务。按照中央军委制定的训练方针,加强部队军事训练,开展以创造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练兵热潮和“比、学、赶、帮、超”竞赛活动,使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五大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党政军民热烈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大办民兵师”的号召,积极组建民兵师,大力推进民兵工作“三落实”工作,并在民兵中进行了对空射击、抢险、抢修、救护、消防、防化、通信、运输、治安等方面的训练,组建了防空、参战、抢救等分队,增强了民兵队伍的战斗力。后勤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基本实现了军事运输机械化,省内重要国防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与此同时,驻甘部队、院校响应中央军委号召,组织力量进行农副业生产,解决了部队部分粮、油、肉的供给,对战胜当时的生活困难起了重要作用,保障了部队执勤、训练等任务的完成。

第三阶段,1966年10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驻甘部队和民兵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期间,由于受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干扰和“左”倾思想的影响,部队和民兵建设受到严重损失。广大指战员和民兵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排

除各种干扰,各项工作在困境中曲折前进。在地方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被“夺权”、工作陷于瘫痪的情况下,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组成“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担负起组织领导工农业生产的重任;在社会局势严重混乱的情况下,军队和民兵在制止派性武斗、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响应毛泽东主席“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加强战备训练,部队普遍进行野营拉练和“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训练,先后组织了25次战役、战术实兵演习;普遍举办教导队轮训干部,提高了各级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重点城市的人防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民兵工作“三落实”不断深入,普遍组建武装基干团(营),配发常规武器,战备训练取得了较好成绩。

第四阶段,1976年10月至1990年,省军区及驻甘部队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要指示,在改革开放中开创军队工作新局面,向现代化、正规化全面迈进。

现代化、正规化军事训练取得重大成果。1977年12月,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后,驻甘各部队认真贯彻落实,普遍加强了技术、战术基础和三打三防训练,各种轻武器实弹射击的及格率和优等率,均有大幅度提高。在现代化、正规化训练的基础上,注重了训练改革,1984年,首先改革单兵基础训练,打破了战术、技术和共同科目的界限,以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突出重点,增大战术训练与应用训练的比重,使技术与战术、基础与应用、进攻与防御、一专与多能、体力与智力有机地结合起来;1985年开始分队训练改革,本着逐级训练,逐级完成,逐级提高的原则,区分必训和选训的课题,合并共同课目的内容,保留独具特点的内容,协调各兵种专业训练的时间和内容,突出分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这种训练方法,全面提高了基本战斗单位的作战能力。与此同时,着重抓了团以上干部和司令部训练,加强了现代化战争理论的学习和军事学术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并运用学术研究成果进行首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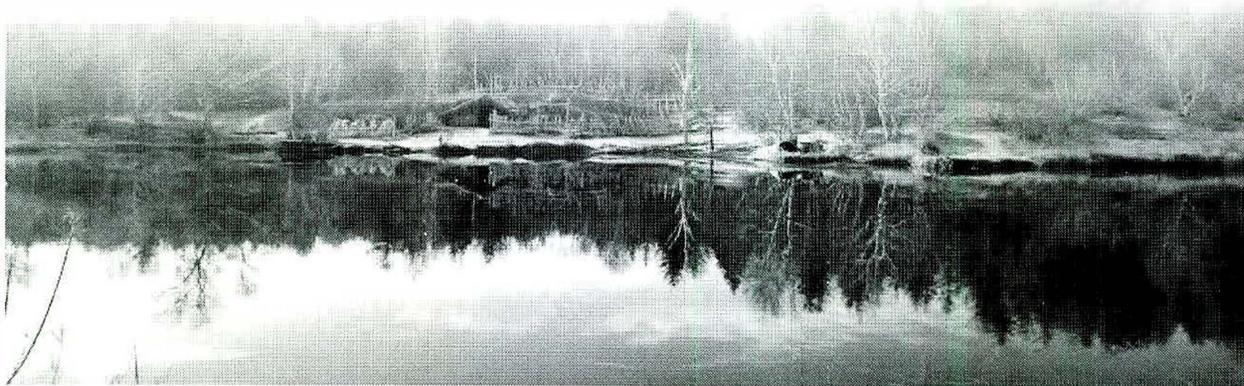
机关指挥演习和实兵指挥演习；注重抓好各兵种同步、合成训练和实兵检验性综合演习；加强外军研究，开阔眼界，扩张思路，增强现代化训练、作战意识，着重研究现代条件下外军大量装备夜视照明器材对我军夜战行动的影响，探索训练新路子和新方法。随着部队传真、微机现代化仪器的大量装备和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建立，相应开展了指挥机关现代化指挥训练。通过改革训练，大大增强了部队在现代条件下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野战生存能力。

对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并取得新的成绩。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对民兵组织进行了调整，缩小组建范围，简化组织层次。开展了对退伍军官和士兵的预备役登记统计工作，实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把预备役军人编入民兵组织，并组建了2个预备役师。根据总参谋部的有关规定，减少民兵训练人数，突出训练重点，改进训练方法，提高了训练质量。

政治工作在拨乱反正、发扬优良传统基础上的改革与创新。为了建设一支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遵照军委指示，结合军队体制改革，在干部工作制度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从80年代开始，按照“四化”要求，几次选拔和配备各级领导班子，使军、师、团三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有了较大下降，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改革了基层干部的选拔办法，实行经过院校培养

干部的制度。认真贯彻执行《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军衔条例》、《文职干部条例》和《预备役军官条例》，使干部的选拔、培训、考核、升降、交流、待遇、退休和转业、复员等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完善了干部工作制度。政治思想教育进一步加强，不断端正干部、战士的服役态度。教育方式上更加讲求实际，采用了讲演会、讨论会、知识抢答、图片展览、电视录相等形象、生动的形式，增强了思想教育的趣味性、知识性，引人入胜。经过几年工作，部队中形成了自觉抵制社会不良思潮、安心服役、努力学习、追求进步的良好风尚，工作积极负责、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成为普遍现象。

后勤保障工作全面加强，现代化建设进展迅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要求，驻甘部队大抓后勤建设。调整后勤供应体制，健全战略、战役、战术三级供应保障体系。在工作指导上，增强了科学性、计划性和主动性，逐步实行指挥、管理自动化。并运用现代管理科学方法和手段，掌管各项业务，不断提高后勤保障管理水平。大量装备现代化机械、仪器，以电子、机械操作代替人工操作，使各类保障工作机械化、自动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程度。加强各类技术训练，特别是汽车、医疗、营建等方面的技术训练，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各类事故大大减少，达到了开得动、拉得出的要求，使部队的机动性能大大提高。



刘家峡水电站建设始末



刘家峡水电站是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决定建设的,是中国人民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建成的全国第一座装机容量百万千瓦以上的大型水力发电站。该工程由水电部北京水电勘测设计院设计,西北水电勘测设计院负责勘测,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现水电四局)承担施工任务。1955年7月开始勘测,1956年3月开始设计,1958年6月提出初步设计,1958年9月27日开工兴建,1961~1963年停工缓建,1964年复工,1968年10月下闸断流蓄水,1969年4月1日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1974年12月5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毕,1980年6月由电力工业部会同甘肃省人民政府组成竣工验收委员会进行总体验收后,全部移交甘肃省电力局刘家峡水电厂负责运行管理。

刘家峡水电站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境内,距兰州市100公里,是黄河水电开发中的第7个梯级。坝址以上流域面积18.17万平方公里,占黄河流

域面积的25%,多年平均流量866立方米/秒,年径流273亿立方米,占黄河年均水量的60%。年输沙量0.89亿吨,占黄河年输沙量的5%,水量充沛,泥沙含量相对较少。坝址岩石以云母石英片岩为主,夹有少量角闪片岩,岩石坚硬,强度高。电站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灌溉、防凌等综合利用效能。正常蓄水位1735米时,水库总库容57亿立方米,其中有效库容41.5亿立方米,水库面积140平方公里,回水长65公里,原设计汛期防洪限制水位1726米,龙羊峡水库蓄水后提高到1730米。共装机5台,总容量122.5万千瓦,竣工验收时核定为116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57亿千瓦时。出线5回,4回220千伏线路分别向兰州和青海省西宁送电,1回330千伏线路经陇西、秦安至陕西汤峪向天水 and 陕西关中送电。

刘家峡水电站属大型工程,地震设防烈度8度。采用千年一遇洪水设计,万年一遇洪水校核,相应流量分别为8720立方米/秒和10600立方米/秒,设计洪水位1735米时,最大下泄流量

7500 立方米 / 秒,校核洪水位 1738 米时,最大下泄流量 9220 立方米 / 秒。电站枢纽由拦河坝、泄洪排沙建筑物和电站厂房三部分组成。拦河坝包括整体式河床混凝土主坝,左右岸混凝土副坝及右岸黄土副坝,坝顶全长 840 米,最大坝高 147 米,坝顶高程 1739 米,顶宽 16 米。泄洪排沙建筑物有右岸溢洪道、泄洪洞、排沙洞和左岸坝内泄水道,均系高速水流建筑物,挑流消能,最大流速 35~45 米 / 秒。电站厂房为地下坝后混合式,其中地下厂房开挖跨度 29~31 米,最大高度 51 米,长 86 米。5 台水轮发电机组系哈尔滨电机厂制造。5 号机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是国产第一台单机容量最大的双水内冷发电机组。主变压器 6 台,总容量 176.6 万千伏安。

刘家峡水电站,河谷狭长,流量大,枯水期短,基坑开挖量大,按照河道地形条件和工程特点,采用隧洞导流高拱围堰挡水、一次断流全年施工方案。主坝混凝土用 20 吨缆机吊 6 立方米混凝土罐浇筑。厂房及泄洪洞用混凝土泵浇筑。混凝土拱围堰高 51 米。导流隧洞左右岸各设 1 条,其断面为 13×13.5 米,工程完工后,左岸导流隧洞改建成 330 千伏开关站,右岸导流隧洞改建为永久泄洪洞。

1958 年初,水电部成立刘家峡水力发电工程局(现水电四局),承担刘家峡和盐锅峡两水电站的施工任务。拟定了“两峡同上马,重点刘家峡,盐锅峡先行,八盘峡后跟”的施工方案。同年 9 月 27 日刘家峡水电站正式开工,在机械设备不足、技术手段落后、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1960 年 1 月打通左岸导流隧洞,进行河道截流,开挖坝基,采用长条高块浇筑大坝基础混凝土,由于没有温度控制措施等原因,致使所浇筑的 13 万多立方米混凝土质量低劣。1960 年 7 月,国家经济暂时出现困难,刘家峡水电站停工缓建。

1964 年,国民经济形势好转,刘家峡水电站复工,为确保大坝安全,水电部和水电总局决定全部炸除了 13 万余立方米质量低劣的混凝土。广大职工吸取教训,努力改善施工条件,改进工艺作风,严格质量管理,不断提高施工机械化水平,保

证了大坝混凝土浇筑质量。经过 4 年多的紧张施工,1968 年 5 月开始机组安装,10 月下闸蓄水,1969 年 4 月 1 日第一台 22.5 万千瓦机组并网发电,1974 年 12 月 5 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毕,电站竣工。1981 年被评为优秀设计和优质工程,获全国优秀工程设计奖。

整个工程共计完成土石方挖填 1895 万立方米,其中:洞挖石方 68 万立方米;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浇筑 182 万立方米;金属结构安装 6497 吨;帷幕灌浆 17825 米;机电设备安装 21687 吨。用水泥 48.24 万吨,木材 12.41 万立方米,钢材 5.516 万吨。厂房地下高压电缆敷设总长 1 千米。工程总投资 6.38 亿元,总造价 5.11 亿元,单位千瓦投资 512 元,单位千瓦造价 417 元。水库淹没耕地 5181 公顷,其中水田 3638 公顷,果树林木 24 万余棵,迁移人口 32639 人,拆迁房屋 62665 间,公路改线 29 公里。位于库区大夏河与黄河交汇处的莲花镇是原永靖县城所在地,水库蓄水后淹没,县政府机关迁至大坝下游三公里处的小川。水库尾端,有始建于西秦的炳灵寺石窟,是旅游胜地。为保护文物古迹和游客安全,电站施工期间用浆砌块石挡墙作了防护。1985~1986 年刘家峡水电厂和甘肃省文化厅共同投资,由水检公司负责设计施工又进行了加固处理。

刘家峡水电站是当时国内第一座单机容量最大、送出电压等级最高的水电站,1969 年投产后,电厂广大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致力于技术革新和设备完善化工作。1982 年以后连续几年设备完好率达 100%,其中一、二类设备各占 50%,设备年利用小时 4597 小时。设备改造项目有:22.5 万千瓦机组水轮机水导轴承改进;5 台主变压器冷却控制回路改进;220 千伏高压开关更换;坝内排水泵房改造,落实防止水淹厂房措施;5 号发电机汇流排改进,恢复部分机组铭牌出力;5 号主变压器修复;机组加装晶体管闭锁装置;建立大坝激光观测系统,提高大坝观测精度等。

黄河系多泥沙河流,支流洮河在坝前 1.5 公里处汇入黄河,洮河的泥沙严重威胁电站安全运行。1974 年开展了“洮河异重流排沙”试验,排沙

比在 50% 以上,取得了明显效果。异重流排沙只能排除洮河入库泥沙中的细颗粒,粗颗粒泥沙仍然淤积在坝前库段并向黄河干流倒灌形成“沙坎”,1980 年 6 月沙坎高程达 1691 米,高出电站进水口 11 米。同年 6 月 14 日 20 时,坝前水位 1696.5 米,机组负荷增至 18 万千瓦时,坝前水位骤降达 0.96 米,发生沙坎阻水现象,过机泥沙大量增加,机组磨损严重,直接威胁发电机组正常运行。1981~1988 年先后四次组织“汛前低水位拉沙”,总计排出泥沙 3342 万吨,效果明显。截止 1990 年底,刘家峡水库共淤积泥沙 11.61 亿立方米,占总库容的 20.4%,其中有效库容淤积 3.96 亿立方米,占 9.6%,平均每年损失有效库容 0.43%。

刘家峡水库系不完全年调节水库,1986 年 10 月龙羊峡水库下闸蓄水以前,一般年份汛末刘家峡水库皆有大量弃水下泄,为适应全省日益增长的用电需要,力争多发水电,1978~1986 年汛末,刘家峡水库共超蓄水 6 次,每次超蓄水位约 0.5 米,总超蓄水量 4 亿立方米,增发电量 2.5 亿千瓦时。

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后,水库防洪标准达不到设计要求,1981 年 9 月,黄河上游发生特大洪水,当时正在施工中的龙羊峡水电站土石挡水围堰按 50 年一遇洪水设计,挡水库容达 15 亿立方米以上,一旦溃决,下泄水量将直接泄入刘家峡水库。9 月 10 日,刘家峡水库水位 1728.41 米,超过防洪限制水位 2.41 米,入库流量 4190 立方米/秒,龙羊峡入库流量 4350 立方米/秒,堰前水位 2428.65 米,对刘家峡水库构成极大威胁。根据黄河上游水情预报,洪水继续上涨,为确保水库防汛安全,甘肃省人民政府于 9 月 10 日晚发出加高刘家峡水库大坝命令,联防指挥部连夜部署,兰州部队指战员 1300 人,永靖县民兵 1300 人,刘家峡电厂和工程分局 980 人,共计 3580 人组成抗洪大军,出动机动车辆百余台,抢筑大坝子埝。9 月 13 日,国务院电令,加大刘家峡水库下泄流量,兰州流量按 5500 立方米/秒控制。经广大军民奋战 5 天 5 夜,于 9 月 15 日胜利完成大坝加高工程,完成土

石方堆筑 9560 立方米,黄土副坝加高 3.6 米,主坝加高 2.3 米,全长 862 米,取得了抗洪斗争的重大胜利。甘肃省省长李登瀛、电力部部长李鹏亲临现场指挥抗洪抢险工作。

刘家峡水电站是陕甘青宁电网的主力电厂,担负着系统调峰、调频和事故备用的任务。1969 年 4 月发电以来,在发电、防洪、灌溉、防凌等方面均发挥了巨大作用,有效的服务于陕、甘、青、宁、内蒙古等省(区)的工农业生产,特别为甘肃有色冶炼、铁合金、电石、化工等高耗能工业和高扬程电力提灌工程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截至 1990 年底共发电 882.93 亿千瓦时,发电产值 55.96 亿元,相当于电站投资的 8.75 倍。刘家峡水库建成前,甘肃、宁夏、内蒙古三省(区)沿黄河两岸灌溉面积 66.6 万公顷,现已发展到 106.6 万公顷,每年 4~5 月春灌期间,刘家峡水库为下游补水 8~12 亿立方米,灌溉保证率提高到 85% 以上,粮食连年增产。在防洪方面:刘家峡水库建成后解除了兰州市百年一遇洪水灾害,使百年一遇的洪峰流量由 8080 立方米/秒削减为 6500 立方米/秒。1981 年 9 月,黄河上游发生了 200 年一遇特大洪水,据推算,兰州天然流量达 7000 立方米/秒以上,是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值,由于龙羊峡施工围堰和刘家峡水库的共同调蓄,兰州最大流量 5560 立方米/秒,削减洪峰 1400 立方米/秒。在防凌方面,由于黄河从兰州到包头,流向由南到北,地理纬度相差 $4^{\circ} 37'$,温差大,开河时间不同,致使包头一带每年黄河解冻时水鼓冰裂,形成冰坝,引起洪水灾害。据统计,刘家峡水库建成前的 1950~1967 年,包头一带黄河堤防决口 8 次,平均两年一次,1968 年刘家峡水库蓄水后,每年 3 月中下旬的 15 天控制兰州流量不超过 500 立方米/秒,凌汛灾害只在小范围内发生过,灾害损失大大减少。此外,在提高下游梯级电站效益、养殖等方面,刘家峡水库也发挥了显著作用。1989~1990 年对刘家峡大坝进行了首次全面鉴定,其结论为正常坝。

工程特性

正常蓄水位 1735 米

(转 24 页)

刘知几的史学方法论

符定波

一、史学为经国之要道必须“直书”“实录”

刘知几是我国初唐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史通》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系统阐述史学理论和史学评论的名著,也是他一生精力所萃的杰作。他论史有许多精到的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而且自成体系,有他一套史学方法论。他认为史学乃经国之要道。

他说: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筐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

接着刘氏又从反面指出:

“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瞬,商、冒之与曾、闪,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

刘氏对史学的意义和作用说得很透闢,他不仅从史书上去认识褒是贬非、劝善惩恶的道理,而且还从史书上去认识史学“为国家之要道”,取得前人的经验教训,以应用于当前的实践,做到“古为今用”。其实这也是古代的传统看法。例如:孔子作《春秋》,孟子在《滕文公下》就认为:“《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左



传》上也说:《春秋》之义,“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这就是说,孔子修《春秋》,有褒贬是非、劝惩善恶的意旨。这个问题影响甚大。所以后来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也评论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而且,此后的史学家司马光,也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于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一书”,名曰《资治通鉴》。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末尾,解释《资治通鉴》这个书名,他更详细发挥读史所以“资治”,即所以经国的主张道:“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由此看来,刘知几说史学“为国家之要道”,正是继承了古代史学家所固有的史学见识,表现了他为经国致用而治史的精神。

由于历来对修史的要求很高,刘知几继承古代的史学传统,在其所著《史通》中便郑重提出“直书”“实录”的真实性原则。在史学史上,也有人能够比较真实地记录一事或撰写史书,便博得后人的高度赞扬。在春秋时代就流传着两个著名的故事:一个故事是,齐庄公被弑,太史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继续这样写,崔杼又把他杀了,可是太史的另外一个弟弟仍旧这样写,崔杼没办法,只好由他去写。南史氏听说太史尽遭杀害,执简前往,准备代写,听说他的弟弟已经坚持写了,他才返回。(《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另一个故事是: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赵盾(宣子)出奔,闻公弑而还,太史董狐写道:“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赵盾说:“不然。”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无言以对。(《左传·宣公二年》)所以《左传·宣公二年》云:“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汉书·司马迁传》赞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于是,董狐被认为史官记事的好榜样,司马迁被认为史

家著作的好典型。这些良史均表现了敢于直书不畏强暴的优秀品质。因此,刘知几对撰写史书,特别强调直书、实录的真实性原则。所以他在《直书》和《曲笔》两篇里集中地表扬了比较正直的史家,同时在其他各篇也随时发挥了这方面的言论。他的这种精神几乎贯穿在全书之中。

不过,修史者并不都是“直若南、董”。要真正做到“直书”“实录”,并非一件易事,因其中还有一个史学家的治史态度与统治者的权势之间的矛盾问题。如有的史家修史,爱憎由己,褒贬任情。魏收曾说:“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人地!”(《北齐书·魏收传》)这就暴露了他在修史中以个人恩怨而任意褒贬的思想。所以刘知几就曾以魏收所修《魏书》为例,着重指出:“魏收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古今正史》)《称谓》篇又说:“魏收自我作故,无所宪章,其撰《魏书》也,谄齐则轻抑关右,党魏则深诬江外,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端,语必不经,名惟骇物。”其实这种情况,何止魏收如此,在旧史中,是不乏其例的。有的因修史者的政治立场不同,多存偏蔽。《曲笔》篇指出:“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用可致诬,列诸湘素,难为妄说,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之于史邪。”《曲笔》篇又说:“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毋丘,齐兴而有刘秉、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由于史官站在本朝的立场记事,有隐讳,有厚诬,最能博得统治者的欢心,“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曲笔》)甚至因为统治阶级的威慢,不能秉笔直书。《直书》篇指出:“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因此,在当时统治阶级的威胁下,有能不顾生命危险而忠实于史实撰写的人,确是很少了。所以他在《直书》篇感慨不置地说:“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

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正因如此,所以刘知几才极力主张直笔,才称赞那些“不避强御”和“无所阿容”的史学家。他在《直书》篇说:“盖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至于今称之。”同时他在《曲笔》篇又贬斥了那些丑态百出的史学家。他认为:“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如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至于对那些尤为恶劣的,如“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以仇”,刘氏更以无比的愤怒声讨痛斥说:“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坏传统呢?他以为是当代某些史臣畏忌威权,苟且取荣所致。所以刘知几极力强调史学家记人载事要公正,应该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惑经》),才能真正达到“彰善瘴恶”(《曲笔》)的目的,完成“激浊扬清”的史学任务。

由于刘知几认为史学乃经国之要道,可以历史上的善恶是非、成败得失之经验教训,引为鉴戒,做到“古为今用”,故对古代记事者专凭主观爱憎,或慑于封建统治者的威胁,不敢直书,以致毁誉失实的时弊,一一予以揭发和批判。这给后人的启示是很大的。尽管时代的局限性,使他只能从封建伦理出发来论述“直书”“实录”的要求,但在今天看来,他的这些史论和主张仍有借鉴的意义。

二、反对以文代史和文史合一强调修史应掌握叙事方法

历代设官修史,多由文人执掌史笔,特别是自南北朝以来,史职几乎完全由文人担任。文人修史,必然导致“繁华而失实”(《载文》),忽视史事的叙述,弄得距离实录精神愈来愈远。《核才》篇指出:“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凡所拜授,必推文士。

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委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杂说下》篇又说:“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话俚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刘氏认为自魏晋以来日甚一日的这种“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载文》)的现象,必须以古代经典为范本,由虚返实,因丽就质,从而达到“文约而事丰”(《叙事》)的要求,因此《鉴识》篇着重指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采,欲求实录,其可得乎?”(《鉴识》)特别是到了唐初,“文人修史”沿袭形式主义的骈丽倾向,更为严重,刘氏便义正词严地指斥,说:“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藉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论赞》)看来,刘氏反对以文代史,特别是对“务以淫丽为宗”(《载文》)的习气,尤为深恶痛绝,所以他提出崇质黜饰的主张,认为一部好的史书,一定要有“质”,要“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沈在”(《叙事》),也就是说要有充实的史实,这种见解对于初唐修史的“骈四俚六”的倾向,是起着补弊救偏作用的。

刘氏又认为文史是有区别的,既不可以文代史,也不可文史合一。“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皎然异辙。”(《核才》)《载言》篇又指出:“《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与)事有别,断可知矣。”但是他看到“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入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纷扰,古今是同。”象这样文词和事实夹杂在一起,叙事既不清晰,文章也不条贯,不仅会打断读者对史实的观察之联系,也大大阻碍了史学的发展。刘氏认为记载史事固然需要

用文字来表达,也需要一定的文学技巧,所谓“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叙事》),但史家有史家的文,跟文士的文不同。所以他认真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说:“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放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又诗人之什,自成一书,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这种主张,虽没有被后来修史的人们所采用,但是大大地丰富了封建时代历史编纂学的内容,并收到了革除积弊、推动史学进步的作用。

刘氏既反对以文代史,又反对文史合一,但究竟怎样撰写历史才合乎理想的要求呢?他认为撰写历史的方法,最主要的就是叙事。他在《叙事》篇里就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三个重要论点:

一是提出“简要”。《叙事》篇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什么是简要呢?就是以最简练的文字叙述最多的事实,所谓“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因为自两汉以后,史籍之文,日趋烦冗芜杂。“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这种作风必然违反了叙事简要的原则,而陷于烦芜累赘,使历史著作的质量,受到严重损害。

刘知几为了进一步说明“简要”的要求,还从表现形式上提出四种叙事方法:“有直记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叙事》),凡此四种,只要根据写作实践的需要,灵活选用其中一种叙事方法,就可以取得理想的效果。但后来的作者,往往四者并用,迭床架屋。所以刘氏首先提出简要的原则,是非常必要的。

二是主张“用晦”。刘氏在《叙事》篇中指出:

“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缚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又指出:“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但他决不是要求把文字写得晦涩艰深,故弄玄虚,把人们引入难以揣摸的境地,而是要用简约的语言,开拓一个“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以上引文均见《叙事》篇)的境界,含意无穷,余味不尽,使人们有思考想象的余地。

三是强调真切。反对一切不符合史实的比拟及虚饰。《叙事》篇指出:“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鸛者也。”这样刻意讲究词藻的雕饰,就必然掩盖了史实的叙述。《叙事》篇又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为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又云:魏收《代史》“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吴均《齐录》,“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又云: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鸾撰以新史,重规(百药)删其录,乃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由此可见,后来作者,多以古事比于近事,古人比于近人,设喻十分不当,于是使史实失去真切。

总之,刘氏强调“简要”“用晦”“真切”这三个论点,都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发,当然,同时也涉及到在他以前相当久的时期内历史著作的文风之弊。看来,刘氏特别强调叙事方法的重要,已把叙事的工拙当成衡量历史著作优劣的先决条件。如果不以记事为重的作法,以文代史,或文史合一,则是刘知几所极力反对的。

三、比物连类,历史联系时事

刘知几在著作生涯中是和当时现实有矛盾的。当他任史官时,常常想把他的历史学创见,应用于国史的编修,但是事实并不如他所想,由于当

时的史馆组织,是“监修制度”,史官注记,必须仰承监修的意旨,没有撰著的自由,“故退而撰《史通》,以见其志”(《自叙》),因此,刘知几写《史通》,是写历史,也是写现实,处处联系到当时的现实上来。说他“古为今用”也好,“借古讽今”也好,都无不可。只要我们把《史通》中所谈论到的不少问题与当时现实联系起来看,就可理解得更为深刻。且看他论述历史学方法问题,大致不外以下几方面。

第一,反对模拟著书,强调要有创见。他在《模拟》篇中说:“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在这里,刘氏指出历史的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发展的,学者不应以模仿古人之高,撰写史书。若必欲模拟,则其著述,势必弄巧成拙,贻笑当代。他在《六家》篇中指出:“君懋(王邵)《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因此,他以为模拟古人著书,旨在吸取其优点而提高自己著作的质量,不能为模拟而模拟。根据刘氏的归纳,模拟古人著述的途径有二:一种是机械地模拟,形式相同而实质不同,这叫貌同而心异;一种是形式虽不同而实质相同,这叫貌异而心同。他对貌同心异的写作,提出批评说:“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他认为不得已而有所模拟,也只能吸取古人的精神实质,运用于自己的著作。所以他又称许说:“惟明识之士则不然,其所拟者,非为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他最后指出:“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模拟》)这就深刻地道出了旧史家们妄事模拟的病根。

第二,反对在历史学上应用古代语言,强调运

用当世方言俚语。撰写任何形式的历史学,都必须借文字来表现其内容。但如何用文字来表达语言呢?刘氏在《言语》篇中说:“夫三传之说,既不袭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讹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时之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松之)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刘氏认为历史虽述往事,但并非写给古人读的,而是写给当代人读的。应该用当代的语言文字撰写历史。所以三传不学《尚书》的语言,《史记》《汉书》不学《战国策》的语言。因为“记其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便能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这不但能反映历史的实际情况,而且也可从历代言语的变化中掌握时代的特征。在《杂说中》又云:“或问曰:‘王邵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是乎?为非乎?’”他明确回答:“斯并因地而变,随时而革,布在方册,无假推寻,足以知毗俗之有殊,验风土之不类。”这种真实地运用当世方言俚语,可以了解各个时代风土人情的不同特点。然而,有些作者却喜欢袭用古人的词句来记述后世的历史,“援引《诗》《书》,宪章《史》《汉》”(以上均见《言语》篇)。所以刘氏在《言语》篇中批判这些旧史家说:“夫天长地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这样应用古代陈死的语言以撰述今史,就会造成古今不分,真伪相乱,既不能反映出时代的精神面貌,也违背史学的真实性原则。

不过刘知几既反对在历史学上应用古代语言,却又提倡学习古代运用语言的成功经验。对于“或腴辞润简牘,或美句入咏歌”的古代“腴辞”“美句”,及其在叙事上能收到“简而且详”,“疏而不漏”(《书事》)的良好效果的,则十分推崇。他在不少

篇章里都告诫人们要向前人学习，学习他们运用语言的宝贵经验，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反对在史书中记载人物过于繁多，强调要有所选择。按照刘知几的看法，为要达到区分善恶、劝善惩恶的治史目的，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载和品评，必须察看他们在社会历史上是否起了重要作用为准则。而重要作用又包括善与恶两方面：一方面为了彰善，史家必须把那些“其善可以示后”的人，书之于竹帛。所以刘氏在《史官建置》篇指出：历史上不论是“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另一方面是为了惩恶，史家必须把那些“其恶可以诫世”（《人物》）的人，书之于史册。所以刘氏在《直书》篇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并且认为：“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者，则可以不予录，录之则成为“秽史”；“故贤良可记，而简牍无闻，斯乃察所不该，理无足咎。至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竽混吹者矣。”（《人物》）因此他十分强调：史册的记人记事，史家都必须慎重。

刘氏还认为史家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与夺，都要“公平正直”，不偏不倚，以便垂训鉴诫。所以他在《品藻》篇说：“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明，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可是，有些史家，把有些历史人物“存诸简牍，不能使善恶区分，故曰谁之过欤？史官之责也。”这就说明史家对所记载的历史人物，如果不予以公正的品评，使其善恶垂训诫世，那还是没有尽到撰写历史的职责，完成史学的任务。

第四，反对在史书撰写上取材芜杂，强调史料要注意“博采”和“善择”。

刘知几很注意在史书编写过程中对于史料的搜集，首先是强调“博采”，他说：

“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

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槩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平撰》）

其次还要“善择”。他在《杂说下》篇说：

“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祗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篋’、‘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

因此，对搜集的史料必须很好地鉴别和选择。刘氏在《采撰》篇中又说：“讹言难信，传闻多失”。对这类材料，“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所以对史料的精选是非常必要的。

再者，刘知几还大胆地批判某些史书的选材的芜杂，反对把怪诞不经的奇说、迷信虚幻的异闻都载入史册。在刘知几以前，管子、韩非、司马迁、王充等都力图从天命、鬼神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刘知几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他极力批判了旧史上的“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说”。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批判虽然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唯物论者，可是他主张以人事来论历史，反对历史学的“命定论”是可取的。在这里，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历史上的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唐代自高宗以后李武集团的相互争权斗争，他们都是利用所谓“受命于天”的“天人感应说”和“天命论”来神化皇权，甚至不惜编造神学预言，收买符命，惑乱人心，来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刘知几正是在这个时候任职修史，在实践中他深刻认识这一套是统治者的骗人把戏。因而他对于神学和“命定论”的指斥，其现实战斗意义就显得更为光辉。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刘知几反对模拟著书也好，反对在历史学上应用古代语言也好，反对在史书中过多地记载人物也好，反对在史书撰写上取材芜杂也好，他把古今打通一气，比物连类，处处都和当日时事相联系，都可以说是有感而发，决不是为论史而论史的。他的确是把历史上的事看成好象与自己责有攸关一样，而很认真地加以评论。这不仅对当时有现实意义，即我们现在看来，也是很受启发的。

（摘自《古籍整理论文集》）

辉煌千年牙兰氏

贺红梅

牙兰(1460—?),撒里畏兀儿曲先卫酋长脱啼之弟,幼为土鲁番俘虏,成为土鲁番夺取哈密和撒里畏兀儿诸卫,进而威逼肃州(今酒泉)的主将,后归附明朝,同东迁的曲先卫部众会合。

“牙兰”是古回纥语 yaylagar 的汉译名,本撒里畏兀儿部落名称,亦即姓氏。牙兰是以姓代名。

在不同历史时期,yaylagar 的汉译名各有不同:隋唐时期译作药罗葛,五代宋辽金夏时期译作夜落纥、夜落隔、牙懒,明代译作牙兰、伊兰、牙木兰,当今译作亚拉格、亚乐。

隋唐时期的药罗葛为氏族名称,是回纥“内九族”之首,以药罗葛氏为首的回纥,曾统一了漠北广大草原,建立了鄂尔浑河回纥汗国。药罗葛氏世为回纥汗国可汗,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远在公元 680 年(唐永隆中),后突厥强盛,回纥为避后突厥侵扰,首领独解支将其都督亲属及征战有功者迁入河西。这是河西地区最早药罗葛氏。鄂尔浑河回纥汗国破灭后,又有一部分药罗葛氏迁居河西。至唐末五代之际,以药罗葛氏为首,建立了甘州回纥汗国,而被译作夜落纥。

甘州回纥政权是五代至宋中叶的三大回鹘汗国之一,是回鹘的一支,又是裕固族的先世时期。甘州回纥汗国的著名可汗有夜落纥·密礼遏和被宋朝册封为忠顺保德可汗的夜落纥(以姓代名,人名失载)、怀宁顺化可汗夜落隔·归化、归忠保顺可汗夜落隔·通顺。这些夜落隔氏的可汗,继承鄂尔浑河回纥汗国的意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回纥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尔后裕固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甘州回纥汗国亡散后,夜落纥氏同其他回鹘部众一道,西越当金山口,至阿尔金山一带游牧。历宋中叶的“黄头回纥”、元代的“萨里畏吾”,至明代,成为撒里畏兀儿曲先卫的组成部分,被译作“牙兰”,其牧地应在今若羌和且末之间的阿尔金山北麓,在安定卫之西。

明初的曲先卫在撒里畏兀儿三卫中人口最多、势力最大,其酋长受元裔残余势力的影响较大,动辄劫掠,邻里关系以及同明朝的关系很不协调,不利于撒里畏兀儿的发展,也给曲先卫带来重大损失。公元 1377 年(洪武十年),曲先卫指挥沙刺发动杀死安定王卜烟帖木儿的暴乱,使撒里畏兀儿部众逃离近 20 年之久。公元 1406 年(永乐四年),曲先卫得以复立,徙居柴达木盆地西部的药王淮,以三即为指挥、散即思为副指挥,仍沿袭劫掠旧习。永乐末年,明朝出使乌斯藏(今西藏)的使者乔来嘉、邓诚途经柴达木盆地时,被散即思杀害,使团驼马及财物被洗劫一空。明朝派李英等西征,散即思率众远逃,不敢还故地。公元 1426 年(宣德元年),明朝赦其罪,遣使招抚部众,复业者 42000 余帐。至公元 1430 年(宣德五年),又劫掠西域往来贡使,贡道梗阻。明朝以史昭为大将军,率西宁诸卫军及安定、罕东之众征讨。散即思再次率众远逃,未能逃的数百人被俘,损失马牛羊 34 万,人畜伤亡惨重,实力大为削弱。至此,散即思诚心悔罪,遣其弟副千户坚都等贡马请罪,明朝待之如初,令还故地,并归其俘。此后的曲先卫酋长逐步由祖系药罗葛氏的“牙兰”氏充任(沙刺、散即思等祖系蒙古),遵守国家法度,严格约束部众,步入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

此时,吐鲁番割据集团日益强大,数侵邻境,不断蚕食撒里畏兀儿诸卫,曲先卫首当其冲。刚步入稳定发展时期的曲先卫无力抵抗。大约在公元1465年(成化元年),曲先卫被土鲁番攻破,老酋长力战身亡,部众四散逃离。老酋长有三子,长子牙兰·脱啼(民间传为亚额·陶克),在慌乱中怀揣明朝颁赐的曲先卫印,辗转逃至沙州(今敦煌)的罕东左卫,后娶罕东左卫酋长帖木哥妹为妻,同帖木哥结为姻亲兄弟,求得了立足之地。次子即《明史》所称“牙兰”,全名牙兰·天哥(民间传为喀喇牙兰),被土鲁番所俘。三子阿克牙兰尚幼,族人拥其母子东逃柴达木盆地中部。后来,牙兰·脱啼得知母亲、三弟和部分族人的下落,立即告别姻兄帖木哥,南寻本族,随又恢复了曲先卫。经过这些挫折之后,部落势力大为削弱,卫印虽在,但今昔差别极大,昔日的威力已不复存在。

牙兰被土鲁番俘虏时,年仅8岁,尚属孩童。10年之后,他已黠健机警、骁勇过人。土鲁番酋长阿力十分赏识这位年轻的俘虏,再加他高贵的“牙兰”姓氏,决定以其姓氏为名,加以重用,“以妹妻之,握兵用事”。土鲁番攻取曲先卫,最大的战果是夺得了一位将才。

公元1473年(成化九年),牙兰初被重用,阿力以其为先锋,攻陷哈密。此时,哈密忠顺王无人嗣继,王母弩温答失里摄政。阿力俘掳王母、夺忠顺王金印而去,留其妹婿牙兰守哈密。第二年,明朝派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刘文率兵西进,命罕东、赤斤诸卫协力收复哈密。李文先派锦衣千户马俊持明朝敕令赴吐鲁番,晓谕阿力送归王母、金印和哈密城池,如不奉命,再使用武力。阿力不仅抗旨不遵,并且羁留马俊一月有余。年轻机智的牙兰觉得公开同明朝对抗并无好处,特别是羁留使臣马俊,不合常理。阿力骄横固执,对放还明朝使臣马俊的诸多规劝充耳不闻。于是,牙兰连夜奔土鲁番,奏呈明朝3万大军逼近哈密,要求火速增兵。土鲁番虽强,要对付3万正规军尚有困难。阿力询问对策,牙兰献计:给马俊以国使礼遇,设宴款待,令哈密忠顺王母作陪,由王母当众说明不愿回哈密。阿力十分高兴,按计而行。宴会上,王母在威逼之下,不得不说违心话。宴会以后,王母于当晚派人潜入马俊宅,说明真相,求朝廷速发兵救哈密。

正当李文右率大兵西进之时,牙兰又使离间计,四处放风,声言阿力将亲率精兵偷袭罕东、赤斤二卫,使罕东、赤斤之众民心慌乱,二卫酋长不得不各率本卫兵回故地。李文失去援军,兵力不足,无力西进,不果而归。

牙兰据守哈密8年之久,至公元1482年(成化十八年),阿力已死,其子阿黑麻袭职不久,徙居苦峪(今安西境)的哈密都督罕慎,乘机联合罕东、赤斤二卫,秘密率一万兵夜袭哈密,一举成功,牙兰遁走。

罕慎以军功嗣继忠顺王。六年之后的公元1488年(弘治元年),牙兰佐阿黑麻伪与罕慎联姻,诱罕慎赴宴,袭杀罕慎,再次夺得哈密,阿黑麻仍留牙兰据守。第二年,罕慎之弟奄克孛刺与都督阿木郎合作,又联合罕东、赤斤二卫兵,夜袭哈密,牙兰败走。明朝立故忠顺王近属从孙陕巴为忠顺王。

公元1493年(弘治六年),牙兰再次辅佐阿黑麻东袭哈密,激战三日,俘获忠顺王陕巴,杀死都督阿木郎,仍以牙兰据守。牙兰致书明朝边臣,诉阿木郎罪,称复夺哈密,只是惩办阿木郎,并非针对明朝,仍求开关通贡。

公元1495年(弘治八年),明朝派马文升复兴哈密。马文升与甘肃巡抚许进计议,访得罕东有捷道,三日可达哈密。许进亲率轻兵夜袭哈密,必欲生擒牙兰。结果,哈密虽得,而牙兰已走。至公元1504年(弘治十八年),陕巴卒,其子拜牙即叛入土鲁番,不仅哈密不可得,撒里畏兀儿诸卫与肃州等地均处于牙兰的威胁之下。明朝不少边臣将领惊呼:要安定边疆,攻取哈密,必先歼除牙兰。

在土鲁番的步步紧逼下,新疆危急,明朝以王琼为三边总督,经略新疆。正在此时,牙兰从沙州前线反正,声言东归明朝。

牙兰东归,十分突然。明朝政府只知牙兰为土鲁番心腹,为阿力、阿黑麻、满速儿三代土鲁番酋长握兵用事,为土鲁番夺取哈密、进逼肃州立下赫赫战功,今突然归明,不合情理,使人难以相信。是否接纳牙兰,明朝中央无所举措。如不接纳,恐周边其他少数民族首领寒心,疏向化之心,起离异之志,边疆难以巩固。如若接纳,恐“诈降以诱我”,倘牙兰包藏祸心、构变于内、内外协应,何以御之?如土鲁番以“纳我叛臣”而兴兵,拥众叩关,何以安

边?如土鲁番索取其“叛臣”,将予之耶,抑拒之耶?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明朝政府急令三边总督王琼火速查明真相。

王琼查证之后始知:牙兰本曲先卫人,久为我属番,被土鲁番掠去,今前来归正,实属正义之举,不存在“纳叛臣”问题。牙兰虽为土鲁番心腹,为土鲁番扩地拓疆不遗余力,但是,始终不愿直接同明朝为敌,只想在明朝节制之下同周边各部争夺兼并。公元1527年(嘉靖六年),牙兰曾向明朝上书,声称“非敢获罪天朝,所以犯边,由冤杀写亦虎仙、失拜姻答(土鲁番贡使,明朝疑为奸细)二人故,今愿献还城印(指哈密),赎前罪”。明朝以牙兰之言遣使谕土鲁番酋长满速儿献还城印,满速儿怒,由是牙兰“获罪其主”。

公元1528年(嘉靖七年),牙兰驻兵沙州。当时,沙州有帖木哥、土巴二人驻守。他们二人本罕东左卫酋长之一。公元1516年(正德十一年),土鲁番攻陷沙州,罕东左卫离散,一部分以酋长乞台为首,东迁肃州塞内。另一部分以帖木哥、土巴为首,役属土鲁番。由于土鲁番苛政侵暴,帖木哥、土巴时时欲摆脱土鲁番,东归明朝,同族人会合,而无机遇。牙兰同帖木哥、土巴会合后,帖木哥已知牙兰是其妹婿牙兰·脱啼之弟,他同牙兰亦是姻亲兄弟。当牙兰获罪其主满速儿,处境十分危急时,帖木哥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他主动约牙兰彻夜会谈,把牙兰的身世和其母、长兄、三弟的下落,以及他与其长兄牙兰·脱啼的姻亲关系如实相告。并且提出:当今之计,只有东归明朝,同亲人会合,才是惟一出路,错过当前良机,后果不堪设想。牙兰得知此情,当机立断,决心同帖木哥、土巴一道,率部东归明朝。

王琼查明这些内情之后,明朝中央立即决定接纳牙兰。

明朝决定接纳牙兰之后,在如何安置牙兰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牙兰长期为患西疆,而今虽已归正,朝野上下仍然心有余悸,觉得如果安置于西疆,殊难驾驭,终有祸患。有的甚至担心:“今穷迫来归,虽属诚意,日后羽翼丰满,祸福难测。”有人提出使其远离西疆,徙居湖广,恐又本人生疑,

迫极生变,二返土鲁番,或武装流窜西疆,后患无穷。

正在明朝因安置牙兰踌躇未决之时,土鲁番果然派遣虎力纳咱儿,以索还叛人之名兴师犯边,威逼肃州。甘肃游击将军彭浚率兵抵抗,而兵力不足。牙兰得知此情,未待明朝同意,同帖木哥、土巴共同率兵,从沙州出发,协同彭浚,打败来犯之敌,救彭浚于危难之中,而自己未经明朝准许,驻军肃州塞内。王琼力主遵从本人意愿,安置在肃州白城山、金塔寺。明朝政府还给牙兰授官职、赐冠带,使其统率原有部众。

牙兰东归明朝,明人称其为“望风向化”,使“六十年难制之虏,一旦以笑谈决之,因信义无絀于我,而恩威允叶其心云尔”。(《明经世文编》康海语)土鲁番自牙兰、帖木哥等归明之后,失其所依赖,势亦渐孤。而后部下各自雄长,称王称霸,政权不一,失去昔日威力,已无力威胁明朝边疆。

在明朝安置牙兰之前,牙兰·脱啼率领的曲先卫部众,因于公元1512年(正德七年)遭西徙青海的蒙古鄂尔多斯部酋长满都赉阿固勒呼(《明史》译作“阿尔秃厮”,以姓代名)和永谢布领主亦不刺的侵扰,明朝颁赐的卫印被夺,曲先卫再次亡散。牙兰·脱啼率领残留之众东迁祁连山腹地,得到明朝的安置。牙兰归明后,失散数十年的兄弟团圆。由于明朝安置的牧地不同,兄弟二人异地而牧,共同保持部落名称“牙兰”。由于牙兰·脱啼是长兄,曾掌有曲先卫印符,继任为正头目,发展成为尔后裕固族亚拉格部落正头目所辖民众,即今肃南县大河区韭菜沟乡为主的裕固族;次弟率领的千余名部众,发展成为尔后裕固族亚拉格部落副头目所辖民众,即今以肃南县明花区明海乡为主要牧区的裕固族。清朝统一中国后,分封裕固族各部落首领,亚拉格部落头目已不是“杨”姓,而由“安”姓裕固族充任。

新中国建立之初,裕固族地区以原有部落为基础建立乡村政权,在亚拉格部落基础上建立了亚乐乡。牙兰、亚乐,同音异译,显示了他们的祖系脉络。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市县志指导处处长)

陇上铁汉——安维峻

安维峻(公元1854—1925年)字晓峰,号盘阿道人,甘肃秦安县人,清代著名的谏官。光绪年(公元1880年)中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士,1893年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性情耿直,不阿权贵,中日甲午之战前夕,支持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连续上疏六十五道,最著名的是《清诛李鸿章疏》,1894年《请明诏讨倭法》。安维峻之上书声震京都,却因言获罪,被革职发派张家口军台。京城时人以“陇上铁汉”四字相赠,大刀王五及京城应考文人为之送行。1899年后,安维峻主讲陇西南安书院,在家乡办学,辛亥革命中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总纂有《甘肃新通志》(100卷),著《谏垣存稿》《望云山房讨集》等5部。

安维峻二十二岁中举人,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二十七岁中庚辰科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他一生气质清廉,品性耿直,不阿权贵,不结朋党,仕途不畅。直到光绪十九年十月,才调任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六品京官)。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清王朝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光绪皇帝主战,慈禧太后主和,斗争很激烈。当时掌管军政外交大权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主要支持者,主和派的中心人物。安维峻面对国家民族危亡,出于忧国忧民,不顾个人安危,与投降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以都察院福建道御史谏官的合法地位,在十四个月的任职内接连给清政府上呈奏疏六十五道,直接呈奏光绪皇帝的有六十三道。他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不顾个人安危,义正辞严地抨击了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主和派卖国投降的罪行。特别是光绪

三十年(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奏请光绪皇帝《请诛李鸿章疏》,忧国忧民,激昂慷慨、激动人心,声震天下。

这份奏章中,列数了李鸿章祸国殃民的罪行,斥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寇来犯时,“其不欲战,固系隐情”,甚至“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而对我军之粮饷火器,则“故意勒扣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气”。正气凛然地提出:杀李鸿章以振奋人心!他泣泪陈词,义正辞严地指责了慈禧太后听信卖国奸臣李鸿章与太监李莲英干预朝政、专权误国的丑恶行径。他说:“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又说:“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岂可复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慈禧牵制光绪皇帝行使国家政权的隐私。他还说:“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贼人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安维峻的这道奏章,震惊了当时的朝野。慈禧阅后,勃然大怒,立下谕将安维峻交刑部严加惩处。光绪皇帝惟恐慈禧太后借此大兴丰狱,大开杀戒,杀害主战派的爱国志士,有意保护安维峻,但又爱莫能助,便在当日果断地以皇帝身份颁发了一道圣旨:“近因时事多艰,凡遇言官论奏,无不虚衷容纳,即或措词失当,亦不加以谴责。其有军国紧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部训遵行,此皆恪恭求治之诚心,臣民早应共谅。乃本日御史安维峻呈进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肆口妄言,毫无忌憚!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阶端。安维峻着即革职,

发往军台赎罪,以示傲戒,钦此。”光绪皇帝这道圣旨,显然是为营救安维峻的生命。但他又怕慈禧加责袒护之罪,便立即召集大臣共同商议,把处分安维峻的决寇奏请皇太后定案。慈禧太后闻奏后大怒说:“即此足了事耶?毋乃已轻!”这时恭亲王奕、听(道光皇帝第六子,光绪皇帝的伯父)跪奏说:“本朝一一百年,从未杀谏臣,乞太后原之。”经诸大臣奏劝,太后怒意“始为稍解”。这才决定将安维峻革职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赎罪,始免除了安维峻的杀身之祸。

有关处理安维峻的经过,本属宫廷内部事件。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有载,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五日记云:“新吾言:安晓峰事,天子实为援手。盖上见其奏大惊,急召见大臣,拟旨毕,始并其奏呈太后览……”这壁的,新五口气即两广总督李瀚章之于李经亩。李瀚章为李鸿章之胞兄,与孙宝瑄一皆系至亲。光绪帝保护安维峻一事,本是宫廷内部之事,外人无从得知。但李经余自由由于社会关系特殊,竟获悉事件内情,并透露给孙宝瑄,孙复写入日记,因此得以流传。

安维峻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冒死直谏,舍己为国的正义行动,获得了士大夫及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与同情。梁启超将安维峻被革职充军事件称之为“西后剪除皇上羽翼第一事也”。《清史稿·安维峻传》载:“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钱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阳州,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比白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在他被谪贬离京临行时,京都好友,特地选择了杨继盛故宅松简庵为他钱行,流涕相送。士大夫们还作画、作序、作诗奉赠送行。有一友人赠联云:“一不学金人,斯为铁汉;暂留西域,终讨北洋。”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伯愚)特于刻“陇上铁汉”印章一枚相赠。从此,“陇上铁汉”遂传遍全国。

安维峻离京时,京师著名侠客“铁胳膊王五”

(名王子斌,别号大刀王五)等人,主动亲来保镖,并奉赠车马行资。甘肃赴京参加会试的侯乙青、李叔坚(于锴)亲自护送安维峻至张家口。李叔坚曾作《送安晓峰先生出塞》七律四首相送,其中云:“已拼一死答君亲,补牍重看泪转新。训政由来遵圣母,狂言何意有孤臣。”“羽书昨夜达甘泉,横海楼船塑渺然。杜牧罪言难再继,公超雾市至今传。”

在五年的访戍生活中,安维峻始终不忘君恩,一片赤诚报国之心不泯。如他《步杨忠愍公韵率成五古二首》诗一首:“国贼讨未成,遗恨长终古。他生犹谏官,褒阙五口其补。”“臣罪本当诛,旷典空前古。平生未报恩,付与儿曹补。”安维峻于光绪二十五年释还归里后,先后在南安书院、家乡私塾讲学。光绪三十三年夏,在兰州主持总纂《甘肃新通志》一〇五卷、八十册、三百余万言,现已成为研究甘肃历史的珍贵参考文献。《通志》完成后,任内阁侍读。后又辞职,辛亥革命前夕,曾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宣统三年九月,辞职归里,在家从事农业耕作和著述。著有《四书讲义》四卷、《谏垣存稿》四卷、《望云山房诗集》三卷、《诗文杂集》一卷等。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在家乡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永靖民俗

民族风俗是一个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反映，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传统和心理感情，是民族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永靖县的汉、回、东乡、土等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习惯与风俗，同是又因各民族杂居，各民族之间的风俗习惯又有互相渗透吸收的特点。

一、服饰

汉族服饰，随着时代有新的变化。清末时男穿长衫套短褂，头戴瓜皮缎、布料“小帽”，足穿白色手工袜，并“云字”型厚底鞋。衣料有革、纱、呢、绒、缎等。男留长辫，内混乌丝线链穗，双吊耳际。女穿大襟齐膝花边衣衫和花边盖裙，头佩金银首饰，足登高跟木底绣花小鞋，手腕带镯，双耳挂环。民国时便服便帽仍袭清制。男多为上下两截装，读书人及公务人员穿长衫，戴礼帽；女兴穿旗袍，梳元宝头、苦青包头，装饰品有耳坠、手镯、胭脂、花粉之类。冬日，中老年男性多穿羊皮缝制的袄、褂，羊、牛毛自捻自制的褐褂、裤和羊毛擀制的毡衫。贫苦妇女不穿棉裤，只穿夹裤，或套“膝裤”。鞋袜，在不同季节分别穿圆口黑什布鞋、猪、牛皮“骆驼”鞋和麻线绾制的麻鞋，妇女沿袭穿高跟木底小鞋。袜子多穿白粗布袜和毛袜。

共和国建立初，男多穿青、蓝、白对襟式上衣，下身依旧大裆裤。青妇少女多穿艳色印花大襟式上衣。学生、干部兴穿灰、蓝色中山装。50年代后衣服用料还是以平布为主，依年龄、性别多用学生蓝、阴丹蓝、青蓝卡叽、条绒、红绿色花吡叽等。“文化大革命”期间，男女青年普遍穿着草绿色军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纺织与服装工业的发展，衣着讲究新颖、美观、大方，样式、色泽、质料

大多依年龄、职业、季节、爱好而定。常见的式样有中山服、军便服、青年服、西装、工作衣、皮夹克、牛仔裤、裙装以及各种针织内衣、毛衣等。冬日，中老年职工普遍穿着呢子大衣。少女青妇多佩戴质量不同的戒指、耳环、手镯等首饰。青年男女喜穿各种样式的高跟鞋，普遍戴手表。

回族和东乡族服饰，基本上沿袭旧的式样。女性少时多穿红袄绿裤，戴绿盖头；成年妇女多戴黑盖头、穿长袍、戴耳环；老年妇女戴白盖头、穿长袍。男性多穿对襟白衬衣，上套青坎夹。阿訇、满拉及老年人多穿黑色“中摆”（小大衣）。做礼拜时头戴“特斯大尔”（头巾）。共和国建立后，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生活水平提高，中青年妇女兴戴白、桃红色“卫生帽”，衣着讲究新颖、美观、大方。中青年男子兴穿“制服”和西装。

二、饮食

境内汉民饮食以麦、豆、糜谷、洋芋为主，一日三餐，普遍吃“撒饭”、煮洋芋、面条、蒸馍、烙饼等。逢年过节，接待亲朋好友时多吃“臊子面”、“凉面”、鸡蛋面片、烫面油饼、油炸食品、包子、“扁食”、各种炒菜、烩菜等。端午节吃“凉面”、“凉粉”等；中秋节吃“月饼”和自己烙的桂花糖饼等。共和国建立后，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一日三餐，细粮、肉食明显增加，油、盐、酱、醋、鲜菜普遍增多。山川人们多吃白面，副以玉米、糜谷、豌豆、洋芋等杂粮。平时每户备有咸菜、熟菜和浆水菜。亲友至门，部分家庭均以烟、茶、炒菜、“长面”相待，逢婚、寿、迁宅等喜庆吉日，饭菜花样明显增多。

境内农民历有喝“罐罐茶”的习俗。民国时期贫民喝麦茶，富有人家喝砖茶。共和国建立后，60

至70年代喝砖、茯茶、陕茶。80年代后普遍喝春尖茶。

回族、东乡族饮食,以麦、豆面食为主。善做“油香”(油饼),喜食鸡、牛、羊肉,“手抓羊肉”尤其美味可口。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时,摆上油香、馓子、油保等食品。饮茶,特别爱喝放有陕茶或春尖茶、桂圆、葡萄干、冰糖、杏干的“三泡台碗子”,素称“三香”、“五香”茶。

回族、东乡族人民忌食猪、骡、马、驴、狗等不反刍动物肉,忌食一切凶禽猛兽肉,禁吃一切动物血和自死动物肉。

三、居住

房舍规模、结构都依经济条件优劣而定。习惯上房舍均建在“庄窠”(围墙)内,多为土木结构。“堂屋”(上房)多系坐北朝南,厨房多建于东北角,厕所多建于西南角,忌讳大门朝南开。农村少数殷实户分别建有“描檁画纤”、“平房宣纤”等形式各异、造价较高的堂屋;个别富户则建有“三堂三厦”、“三堂五厦”、“虎包头”、“上下对厅”、“飞檐”、“屏风”等相对高大、秀丽、气宇轩昂的房舍。大多贫民房舍均属矮屋陋室,其结构形式主要有出檐、挑檐房,还有“驴驮柴”两流水房、“秃屁股”平顶房,此类房舍结构简单,花钱较少,大都是中间放一根梁,两边担檁子到土墙上,每间放数十根小椽泥糊即成,房门大多是单扇门,或用次等木板镶制或用藤条编织,窗户大多是“满天星、尺尺窗”,即用几根竖木条凿眼穿几根横木条,镶嵌在房门两侧墙上。山区部分贫民无力盖房,依土崖挖窑居住。共和国建立后,随着生活不断改善,多数农民拆旧翻新和修建新房,特别是1978年后,住房条件大为改善。农村许多农户新建、翻修旧式样与新型结构相结合的“堂屋”。新建房舍,多为二、四扇的玻璃窗,门多属暗锁双扇,堂屋门也有四扇的。城镇、川塬及少数较富裕山区房舍墙壁,使用“瓷砖”、“马赛克”、“水磨石”等建筑材料,用石灰、涂料、漆涂刷墙壁已很普遍。川塬地区的住宅大多进行统一规划,注重道路、水渠、绿化、果园设计,讲究整齐美观。山区农户住土窑、“地井子”的状况已基本不再存在。回族、东乡族建筑房屋式样基本与当地汉

族相同。

四、礼节

永靖汉族人民的传统礼节,表现在衣食住行、婚嫁殡葬等各个方面。年小辈低者骑牲口、自行车途逢老人、长辈时须下骑;摆设宴席时老人、长辈坐上席;上炕围坐时老人、长辈坐正中;一日三餐的茶、饭先端给老人、长辈;给老人、长辈递东西时用双手;缝新补旧优先安排老幼;田熟季节请族中老人、长辈“尝新”;逢年过节时携带礼品拜望长辈;途逢老人、长辈时恭敬地称呼问好;学生上学、回家时向教师、长辈鞠躬问好;小辈不能与长辈平起平坐、猜拳行令、乱开玩笑;亲朋临门,热情接待;说话忌讳污言秽语,衣帽反对斜披歪戴;遇婚嫁殡葬,邻里相帮,一家有难,各方相助;欺贫辱弱,人人斥责;做贼行窃,个个憎恨。

共和国建立后,旧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基本剔除。传统的跪拜、磕头、作揖、拱手习俗,改变为鞠躬、握手等。

回族、东乡族,重人情,讲礼节,善交际,好宾客。本民族亲朋好友见面时,先说“赛俩目”后答话;若遇久别客人来家,宰鸡宰羊,热情款待;接待其他民族客人时,先端上茶水、馍饼,后由主人掰馍饼请客人食用。

五、婚嫁

共和国建立前,汉族男女多在十四、五岁订婚,也有“童养媳”和未出生前隔肚订婚。婚事全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婚姻既定,男家备“酒礼”(即彩礼)同媒人上女方家送“订亲礼”,隔期再送“小礼”,最后送“大礼”。送“酒礼”一般必备喜酒、喜饼、四色礼、财物等,数量则通过媒人协商而定。山川、城乡、贫富有别。

结婚时男多在十七、八岁,女多在十六、七岁,也有十四、五岁结为伉俪的。娶亲前择“吉日”。娶亲时男方向女方行“提话礼”,尔后一般由媒人、牵马娃、“用相”人等组成迎亲队,前往女家娶亲。新娘以选定的“良辰吉时”上马,离娘家时恸哭声,过“水灯”,往后抛筷一把。新娘上马前要头顶“巾袱”,身穿“袱衣”,胸佩铜镜。新娘忌骑骡(怕绝后)。上、下马时择属相“贵人”扶抱,忌讳双脚落地。迎

亲队沿途遇古树、磨房、石磊等用红纸盖之压邪。至男方大门口，“贵人”抱新娘过“油火”入院，步入铺有毡或毯的堂前与新郎同拜“天地”，后入洞房，女“贵人”为新娘结发挽髻。洞房普遍设“供斗”、“长明灯”等器物，以示如意吉祥。娶亲翌日，一般都依主人贫富举办宴席，款待亲朋好友，宾客搭礼挂红恭贺。极贫者不举办宴席。新婚三日，新娘“回门”（即回娘家），当天晚饭前须返婆家，做“试刀面”，以显烹饪厨艺。

共和国建立后，国家颁布《婚姻法》，废除了封建买卖包办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倡导自由恋爱，使旧俗大变。城镇职工结婚时，节假日取代“黄道吉日”，鞠躬取代磕头，还有旅游结婚和单位举办集体婚礼的。娶亲不只娶“新娘”，有时也娶“新郎”。老人配偶、寡妇改嫁也得到舆论支持和法律保护。

回族、东乡族婚姻，旧时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早婚现象较普遍，现在都依婚姻法规定。结婚大体要经请媒人、订婚、送聘礼、娶亲、举行婚礼、回门等程序。娶亲时由媒人领新郎、伴郎和娶亲人同去女家迎娶。举行婚礼一般都在“主麻日”“迫山拜日”进行，并请阿訇念“尼卡”。婚后第二天，新郎要到新娘家向岳父母说“赛俩目”。第三天，新郎偕新娘等去新娘家“回门”，当日返回。新婚日，亲朋纷纷前来恭喜，门庭若市，宾客如云，一片喜气景象。

六、生育

旧中国时，汉族妇女产后40天内，不准出房门，谓之“坐月”，并在产妇门头挂一红布条，以示“月房”。讲究不满40日，男性忌进“月房”。由于医药、接生条件差，母子丧命者较多。生男为喜，生女则不声张。如果连生数女而生一男时，家主杀公鸡一只，对孩子取名“鸡换”，也有取名“女子”、“丫头”、“长毛”，留辫子，戴耳环。前者意在以命换取，后者意为制造假相，求儿长寿。婴儿满月，“外家”（即外奶家）一般备“长命富贵”银锁、“连袜裤”等礼物“看月”。亲朋庄友也纷至庆贺。现今外家“看月”，一般给婴儿备全衣帽，给婴儿母亲备上身衣料，主人庆宴也办得比前丰盛。婴儿周岁行“抓

周”，即将象征学、商、农的笔、算盘、羊鞭等器物置于桌上，让孩子随意去抓，若先抓笔，则认为是读书人。

孩儿体弱多疾认为孩儿生年“八字”与父母相克，为其“弭患”，找“干爹”、“干妈”或外出“闯姓”或上寺庙求神保佑，孩儿夜间啼哭不止，便用黄裱纸书写：“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不哭爹来不哭娘，只哭自己不安康，过路君子看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安眠告示，贴在十字路口，祈求吉利。孩儿得“天花”疾病，请“花先生”用民间单方治疗，夭折甚多。

共和国建立后，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提高和卫生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旧时生育中的不少迷信习俗已趋淡漠，新法接生普遍推广，并给儿童按时注射各种防疫针，使母子“月间”事故和疾病得到有效预防，母子很少丧命。同时，孩子乳名也有更新。旧时的“菩萨保”、“百家存”、“天赐福”等乳名已被“土改花”、“合作存”、“朝辉”、“晨霞”、“雪莲”、“洪涛”、“建设”、“翻身”、“红梅”、“翠翠”、“雯雯”等富有时代气息的乳名所代替。优生优育，提高了人口素质。

回族、东乡族生育习俗与汉族大同小异，只是孩子生下三日后，要请阿訇取经名为是。

七、殡葬

境内汉族每逢殡葬，穷富仪式不一，一般父母60岁后，儿女量力给老人置办棺木、寿衣，准备后事。父母尊长始歿，一般穿寿衣3~5件，富者5~7件，忌穿皮、毛衣和缝有金属纽扣衣服。寿材有棺、槨之别，贫民制棺，富豪人家制槨，又称“套材”。其用料有松、柏、榆、杨木之别。棺、槨饰画分三等，上等用蓝、绿等素色，讲究画龙显三爪；中等用红、蓝等五彩色，画龙显一爪或不显爪；下等全用红色涂饰。有功名的棺、槨前画蟒，后画鹤，左画龙，右画凤，盖画虎皮图，四、五世同堂的还多画“二十四孝图”，即传说中的“王祥卧冰”、“丁兰刻母”、“白猿盗桃”等“孝子”。耄耋老人棺、槨，多画“百寿图”，即百个笔划不同的篆体寿字。

尊长、老人始歿落草前，孝子泪珠不得落在亡者衣襟。亡者落草，头朝外，脚朝里。尸前设“灵

堂”，立“三代祖宗”灵位，献祭品，备“纸盆”，点“长明灯”，孝子披麻戴孝，跪卧灵堂草铺，朝夕哭诵、上食、烧钱纸。孝儿手扶“丧棒”，走时躬腰托鞋，以示孝心哀悼。孝布儿孙戴白，曾孙戴蓝，玄孙男戴红，女戴绿。境内王台乡塔坪村和小岭乡陈山村的部分村民殡葬时，孝子不戴孝，不动荤，不恸哭声。

6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亡后，大门顶竖“到头幡”或“出丧纸”，还写贴“丧告”，“到头幡”，60岁者用纸70张，70岁者用纸80张，依次类推。

殡葬要请喇嘛或和尚或“阴阳”诵经，做“道场”，谓之“超度亡灵”，有功名者请儒生“礼宾”奠祭亡灵。诵经有“一堂”、“二堂”、“三堂”之别，依贫富而定。一般只请“一堂”，即请喇嘛或“阴阳”。诵经一般为2天，也有3天的，富者还有5~7天的，贫者也有诵“当日经”和不诵经的，道场毕，“入殓”、“出殡”。

埋葬普遍行土葬。事先请“风水”觅“龙脉”宝地，以盼亡者窀穸安康，后代百世兴旺。葬后，按“头七”至“七七”、百天、头周年、二周年、三周年上坟祭奠。埋葬尊长35日后，姑娘、女婿请僧道诵经，谓之“忏五期”。传说阴府的“五阎王”只有五女，故对女孩疼爱万分。“忏五期”意为让“五阎王”听见姑娘哭泣引以同情，对亡者宽待罪过，早日“超生”转世。

关山等地妇女在“月间”死后，埋葬时尸放纸花，意为入“阴司”掉入“血池”时诱鬼打捞。各地对上吊、投井等自杀身死的年轻人，一般都实行火葬。小孩夭折大多用草捆尸，抛于野外窟穴。

共和国建立后，破除了一些殡葬旧俗。国家职工亡后，一般都举行吊唁仪式，开追悼会，亲友不再披麻戴孝，而以胸佩白花臂带黑纱代之。亲友多送花圈、挽幛，始行火葬。农村还基本上沿袭旧习，但仪式有所简略，有的地区还建起公墓。同时，加强了殡葬改革的宣传和教育；提倡火葬，反对铺张浪费。

回族、东乡族，不论男女老幼都实行土葬，对去世者叫“亡人”，送葬叫“送埋体”。临终前请阿訇念“讨白”，施“乜帖”，对亡人，其亲属不论男女，都得清洗遗体，再用白棉布(3丈6尺)裹体送埋

葬。晨亡晚葬，晚亡晨葬，最多不超3日。送葬时，须在清真寺举行葬仪站。“正那则”，须请阿訇上坟念经，并给送葬者施舍(散钱)。墓深约7尺多，长6尺多，宽3尺左右，墓底西掏一“偏堂”，安放遗体。头北脚南，面向西——麦加圣地。“偏堂”用土块堵砌，用挖出的土填墓坑成丘形。亡者用过的衣物，男的送舅家，女的送娘家，一般亡后3天、7天、14天、40天、100天、周年均念经，其规模依贫富而定。

八、节日

汉族传统的主要节日有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节。

1、除夕 古称“逐除”，意为旧年至此夕而除，翌日更换新年。一般农历腊月初八后，人们就着手准备过年。即杀猪、宰羊、磨面、做新衣、备年货。二十三祭灶后，妇女们拆洗衣被，蒸馍做菜，男的打扫庭院、房屋，请人写对联。腊月最后一天晚上为除夕夜，家家户户贴对联、“门神”、“钱马”、年画；摆香案、置三牲祭品、烧香、磕头、祭天地祖宗；吃团圆饭后，儿孙等晚辈给父母长辈磕头拜年，老人给“压岁钱”；老少深夜不睡，谓之“守岁”、“守财”；鸡叫后，放炮、烧香，谓之“接灶神”；拂晓开门，名为“迎财神”；1978年后人民生活普遍改善，此夜，除沿习上俗外，还增加了看电视、听收录机、喝酒猜拳、谈天说地等新的乐趣。

2、春节 正月初一为“春节”，早晨吃荤菜、油炸食品，晚上吃“长面”，忌用针、锥、刀、剪，忌泼水扫地和说不吉利话。晚辈给长辈拜年，平辈见面，



互相道喜。初二、初三日，给舅、岳父母及亲友拜年。携带礼品多是“花卷”馍。从初四始，村上互请长者喝年茶，并开始玩秧歌、闹社火、耍狮子、唱戏、戏秋千等活动直至十五。关山、西河等地大年初一还有“迎喜神”之俗，即在此日早饭后给牲畜尾、鬃系五彩布条，羊只头尾涂染红色后，带祭品赶牲畜羊群出门，沿路燃放鞭炮，欢声笑语，奔赴村头“喜神”之地，焚香祭奠，意在祈求骡马成群，牛羊满圈，六畜兴旺。共和国建立后，春节期间各地还开展篮球赛活动，拜年礼物是糕点之类。

3、元宵节 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元宵，是十五之夜的意思，因这天吃汤圆，故把汤圆叫元宵，群众把这天也叫元宵节。城镇多吃“汤圆”，农村多吃饺子、“扁食”。此夜，家家户户悬挂各种彩灯。还有放火堆、送火把之俗。火堆点燃后，男女老幼争跳火堆，也有背小孩、病人跳火堆的。火把都由各家青壮年送之山头野外之地，意在驱邪魔求吉利。

4、端午节 又称端阳节。此日，家家户户采艾叶，门顶插柳枝，男女老幼在手、脚腕、手指、脖项系五彩花线，胸佩内装香料，形色各异的“荷包”，正在热恋的男女青年互赠荷包作信物；喝“雄黄”酒，多吃“甜醅”、凉粉、粘糕、粽子。部分地区在此日还用泉水洗疮疖，故均不饮用当日河泉之水。

5、中秋节 又叫仲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日，恰是立秋之半，故名“中秋”。中秋黄昏，皓月东升时，家家院内置供桌，献月饼、瓜果，点燃“三炷清香一盏灯”，以示对“月婆婆”虔诚之心。“月饼”有蒸有烙，有大有小，形圆如月，香酥可口。中秋夜各地都有赏月望“梭树”习俗，老人长辈对孩童讲“皎皎女”故事，忌讳用手指月，否则要害“疖指”、“月婆婆”要割耳朵等。中秋次日，邻里亲友，互送月饼。

6、清明节 清明节是我国人民追念祖先，祭扫墓地的风俗节日。此日，家家户户备“纸钱”、酒、

茶、菜、肉、蛋、盘馍等祭品，全家老少一齐上坟献祭品、烧纸钱、添堆坟土、叩拜祖先亡灵。

此外，还有“二月二”、“六月六”、“七巧节”、“重阳节”、“寒食节”、“冬至节”、“腊月八”等等。共和国建立后，除对传统的“除夕”、“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清明节”等节日较为重视外，其余渐不兴时，而元旦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新的节日，已为人民群众所重视，并赋予热烈、隆重的气氛。

回族、东乡族等穆斯林主要节日有“开斋”节和“古尔邦”节。

1、开斋节 又称“尔德节”。“开斋”节时间每年回历九月斋月结束之后的第一、二、三日。斋月一般以见新月始和下月再见新月为终。在这个月内，凡男十二岁女九岁以上，每日从拂晓到日落前不得进食，故称“闭斋”。年岁过高的老人、卧床不起的病人、孕妇、婴儿、旅客例外。节日期间，家家户户炸馓子、油香、油保等，小辈向长辈说“赛俩目”，到坟地祈祷，到清真寺聚礼，家族亲友相互拜年。

2、古尔邦节 “古尔邦节”是阿拉伯文音译，意为“献牲”、“宰牲”。“古尔邦节”在开斋后的第70天，即回历十二月十日举行，这是穆斯林去麦加朝觐的最后一天，它既是民族节日，又是宗教节日。节日里宰牛羊，周济贫苦群众。

(摘自《永靖县志》)



古道张掖，古丝绸之路的耀眼明珠

胡元肇

古丝绸之路，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最早走向世界的国际大通道，生活在这条古道上的古老民族，是打开这条国际通道的先行者、奠基人，而坐落在丝绸之路上的张掖，曾是中国西部最繁华的国际贸易大都市，也是中国最古老的“西部香港”。

古丝绸之路的领航者——大月氏

《辞海》“西戎”词条解释，西戎为古代西北戎族的总称。史籍记载的这些古代民族有月氏、义渠、三苗、姜戎、陆浑之戎、乌孙、昭武九姓等。这些古老的民族，虽然来自不同的族群，有着不同的祖先和文化背景，但他们都在中国的大西北找到了适合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相互交流、碰撞、融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共同构建了与中原大地迥然不同、多姿多彩的部落和族群文化。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远在尧舜时期，以大月氏为代表的西戎民族，是张掖的老住户。大月氏民族骁勇彪悍，能征善战，驰骋南北，横贯东西。不仅如此，大月氏民族也是一个善于经营贸易，互通有无的民族。《管子》《尚书》等记载，大禹在“导弱水至合黎，余波入流沙”之后，居于弱水流域的大月氏民族开通了“玉石之路”，将新疆的和田玉循草原之路，运往中原大地，并南下直通各国。《隋书·西域传》记载，月氏民族于（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在张掖建立了大月氏国，都城设在张掖昭武城，月氏东城设在民乐永固城。此时，弱水流域的昭武城，不仅是新疆和田玉东流的重要枢纽，而且，中原大地盛产的丝绸，也是通过昭武城，源源不断运销到了西方各国。行走在这

条路上的，除了月氏部落的马队、驼队，还有高鼻子、蓝眼睛的欧洲人。《甘肃民族贸易史稿》记述，战国时代，希腊人称中国为丝国，欧洲人称中国为支那。大月氏民族是最早将物质文明传到中亚甚至欧洲的古代部族。英国《金融时报》1997年11月4日《神话传说中的昆仑是巴比伦城吗？》一文记述，德国在古墓葬中发现了中国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丝绸残片，比张骞开辟丝绸之路早了三四百年。众多史料表明，此时，生活在张掖大地上的大月氏、匈奴、鲜卑、羌等胡人民族的思想心态是自我的，也是开放的；他们行为是冒险的，也是拓荒的；他们的精神是民族的，也是大众的、世界的。大月氏是贯通古丝绸之路的领航者，国际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丝绸之路文化精神的奠基人。

张掖互市，国内最大的国际贸易都市

“张国臂掖，以通西域”。《管子》记载，从西周时期的“玉石之路”，到春秋战国时期大月氏部落开通的丝绸之路，张掖既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也是东西方贸易的交汇点。尤其是雄踞昭武城的“昭武九姓”，是丝绸之路著名的“九姓胡商”，他们把中原的丝绸、铁器和西域的琥珀、玉石、葡萄、胡椒、汗血宝马等进行贩运交易，大大推进了张掖商业贸易市场的繁荣。至北凉时期沮渠蒙逊在张掖建都，删丹（今张掖）城内商队云集，物产丰富，市场繁华，西域三十六国皆遣使朝贡，张掖国际性贸易城市的位置已经确定。

自此，张掖一直是西域到中亚乃至欧洲与中

原大地的贸易枢纽,也是中外贸易的中转站。到隋代,张掖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国际贸易城市,对外开放的窗口,张掖的贸易市场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此时的张掖古城,胡商往来,万商云集,外国使节长期定居,洽谈交流、商务贸易等业务频繁。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派吏部侍郎裴炬进驻张掖“监诸胡商互市”,即由裴炬主持“张掖互市”,“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据裴炬亲自撰写的《西域图记》记载,大业三年入朝觐见炀帝,盛言“西域各国多诸宝物,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均愿归顺”。炀帝垂询张掖贸易状况后大悦,遂决定西巡,并有“九姓胡商”知会西域各国,届时携带货物参加张掖国际贸易盛会,史称“张掖万国博览会”。大业五年(公元609年)6月,隋炀帝西巡到达张掖,亲临并登燕支山(今山丹焉支山)参加盛会。高昌王鞠伯雅、伊吾屯设及西域27国使者在道旁参见,各国国王及使者均佩戴金玉,焚香奏乐,歌舞欢乐,张掖一带百姓身着节日盛装,夹道欢迎,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人数之多、耗资之巨、堪称史无前例。

张掖互市及由炀帝亲自主持的盛大交易会,实际上就是由隋王朝主持的大型国际贸易活动,也从真正意义上架通了欧亚大陆的桥梁,加强了国际民族交往,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国内、国际贸易市场的繁荣。因此,隋代张掖的市场繁华程度,国际贸易交往规模及张掖的国际影响力,都是一流的,是张掖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古道张掖,王道乐土,精神家园

——歌舞之乡,王道乐土。古代张掖,多为不同民族聚居及东西文化交融之地,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特色音乐舞蹈在张掖交流荟萃,使张掖在古代即堪称“民族歌舞之乡”。无论是月氏人部落,还是匈奴家族,凡有胡人的地方,就有音乐和歌声,也就有牛羊和舞蹈。在大山里歌唱,在马背上舞蹈,豪放开朗,能歌善舞,生活在音乐和舞蹈的世界里,音乐舞蹈的大繁荣是西部古老民族的最大特征。史料记载,古张掖人的服饰相当华丽时髦,服饰交易更是国际交易会的主要内容之一。一方面,歌舞表演需要艳丽飘逸的服饰,另一方面,万

商云集,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合璧,丰富了精神和文化生活,张扬个性,展示自我,既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需要。

张掖,自古乃兵家必经之地,先后有6个古部落和古民族在此建立国都,是古老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是古老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大舞台,也是一代帝王立业避暑、百姓安居乐道的首选之地。《史记·五帝本纪》载,五帝时期,帝誉高辛者次妃娥氏之女简狄,在张掖高台县境内建立绒国;《穆天子传》《隋书·西域传》记载,月氏于(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在张掖建立大月氏国,都城设在张掖昭武城,月氏东城设在民乐永固城;匈奴时期(公元前176年至前121年),匈奴在张掖西城驿建麟得都城。焉支山为匈奴王庭;东汉时期(公元25年至220年),安帝时在张掖境内分设2属国。张掖居延属国领居延1城;北凉时期,天玺三年(公元401至433年),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建立北凉政权,建都张掖,改年号为永安;唐末五代至北宋前期(公元848年至1028年),甘州回鹘名族,在张掖建回鹘国。都城设在删丹(今张掖市)。

“金张掖”,自古就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一方面,说明张掖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商贸繁华;另一方面表明,张掖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可佳,是一个适宜于人类居住生活的乐园,不少专家学者,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民国诗人罗家伦留给张掖的著名诗句:“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就是对张掖地理生态环境的生动描述。

——隋唐国乐诞生地。《资治通鉴》及《隋书·炀帝纪》记载,隋炀帝大业5年6月21日西巡至张掖。邀请西域27国使者及群臣、民众在张掖举行盛会,“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二十余国”。其中,九部乐之中,最早称为《秦伎》,后称《国伎》《西凉伎》的主题乐伎,就盛于张掖一带。

《九部乐》别名《炀帝九部乐》或《隋制九部乐》。创作于隋代,作者隋炀帝。《九部乐》的主题乐伎是《西凉伎》。《西凉伎》是“中西合璧”的一个音

乐品种,起始在张掖,高潮也在张掖。作为西部音乐的一个典型代表,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融合了中原与西域乐舞而形成的具有西凉特色的乐舞。在敦煌壁画和张掖古代墓葬壁画中就有反映《西凉伎》乐舞壁画,这些壁画绘有生动的乐舞场面,其中有规模宏大的宫廷歌舞,有宗教乐舞,有独舞、双人舞、有群舞,有从西域传来的胡舞,也有从中原传来的清商乐舞等等。《西凉伎》不仅汲取了龟兹乐之精华,而且融合了河西乃至中原大地多种民族的音乐而形成的。

西凉乐舞,发展到隋唐时期,成为国乐,是隋唐燕乐中最早的一部大曲,其中《西凉伎》成为隋唐九大伎之首。西凉乐舞不仅是西北乐舞的代表,也是中原王朝乐舞中的精华,自唐而后流传大江南北,名满天下。

及至唐玄宗时期,下诏征集天下音乐歌舞名曲,由《西凉伎》演变而来的另一只佛曲《波罗门曲》宫廷演奏时,轰动了长安与宫廷,后于天宝十二载正式改名为《霓裳羽衣》舞曲。唐玄宗与杨贵妃特别喜欢这一舞曲,《太真外传》记载杨贵妃醉舞此曲,龙颜大悦,后被公认为唐代乐舞艺术的代表作。

西凉乐舞作为我国古代优秀文化艺术之一,在中国音乐歌舞文化史上,是民族团结、开放交流的产物,其流传的地域之广、影响之大,在地区和国家音乐史上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民族音乐弥足珍贵的瑰宝。

——千年佛经,誉满天下。张掖曾有“半城芦苇半城塔影”“半城泉水半城寺庙”的历史记载。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张掖古城内的水湖池塘面积占到全城的三分之一,城里城外苇溪连片、碧草连天、山光湖色、流泉淙淙,是得天独厚的“水韵之城”。

张掖大佛寺,始称“迦叶如来寺”,又称为“卧佛寺”。是西夏时期的皇家寺庙。称之为“塞上名刹,佛国胜境”。大佛殿内现存世界最大的室内泥塑卧佛,即佛祖释迦牟尼的涅槃像,金妆彩绘,面部贴金,右斜而卧,造像丰满端秀,怡静安详,安睡在大殿正中高 1.2 米的佛坛之上,佛身长 34.5 米,

肩宽 7.5 米,耳朵约 4 米,脚长 5.2 米。据说,大佛的一根中指就能平躺一个人,耳朵上能容 8 个人并排而坐。

在张掖大佛寺,一部鲜为人知的佛学百科全书就藏在张掖大佛寺里面。它就被人们称之为“佛国天书”的张掖《北藏》。然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大佛寺内还有一部和《北藏》一样珍贵的经书,是明代正统年间用金泥抄写的《大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即金经,全国罕见,名气超过《北藏》。1993 年 7 月,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张掖《北藏》为国家一级文物。1996 年,“金经”《大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又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

《北藏》是佛教大百科全书《永乐北藏》的简称,它的全名是《大明三藏圣教北藏》。这部佛经从永乐八年在北京正式开始雕刻,到明英宗正统五年完成,前后历时 30 年时间,内容主要集中了经、律、论三大部,共收佛经 1621 部,6361 卷。正统十年,首部经书《大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运抵张掖。这些经书以及保存完整的陈列经书的柜子,其组合排列和检索之便利,为打开明代图书管理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著名历史学家宿白先生认为,“张掖的《北藏》目录有可能是孤本,”特别是保留完整的经书柜就更为宝贵了。

“如是我闻”“杜鹃叫落桃花月,血染纸头恨正长”,这些“国宝”级的经书,不仅给我们讲述了“西天取经”的典故,而且见证了千百年来围绕着这些佛经,张掖大地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正是因为这些佛经故事,张掖的历史增添了诸多传奇、神秘的色彩。

——“千古壮观”名句的诞生地。打开汉乐府诗集《匈奴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听到的是痛心疾首的长叹和呐喊;夜读王维“单车欲问边,归雁入胡天”“慷慨依长剑,长歌一送君”的诗句,领略到的是诗人豪放浪漫、慷慨自信的胸怀和气魄;李白“愁来饮酒三千石,寒衣重暖生阳春”,描写的则是边塞生活的艰辛苦寒和励志戎边的执着信念;岑参“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

马上取,真实英雄一丈夫”。人生洒脱莫过于此,英雄豪放莫过于此!

“名诗出张掖,张掖出名诗”。古道张掖,是文人墨客抚边宣慰将士的驿站,也是边塞诗人生长才思、生长灵感的地方,历史上很多名诗佳句写在了这里,千古绝唱留在了这里。

史料记载,原设于内蒙古的燕然都护府(后称安北都护府)于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先迁往同城(居延城),后于唐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687年)迁往甘州区西安城(今甘州区古城村),安北都护府在西安城戍守十年之久。开元二十五年(公元

737年)3月,唐代著名诗人王维以监察御史之官职奉唐玄宗之命出塞宣慰将士,当日入住西安城(张掖东古城)。次日,当王维离开西安城向居延城进发时,被黑河水向西穿行在大漠之中,同时看到的“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两种壮观景色所陶醉,于是欣然命笔《使至塞上》,生动而形象地描绘出了塞外雄奇瑰丽的风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之为“千古壮观”的名诗佳句就在这里诞生了。

(作者单位:张掖市地方志办公室)

吉鸿昌将军陇南剿匪

魏泽民

从1912年民国肇始,甘肃当局就宣布承认民主共和,加入了民主共和序列,但是,由于民国中央政权日衰,大小军阀纷纷割据称雄,陇南政权也几经变更,社会动荡,加之陇南山大沟深,地瘠民贫,自然灾害频发,而课税摊派严酷,陇南农民所交各种赋税占到总收入的88%,高于全省平均值,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沦为流民或者土匪,导致匪患丛生,基层政权嬗变,严重阻碍了陇南社会经济发展。

1927年冬,西和县大桥土匪王好善在做了充分准备后,就率所部一百多人北上攻打西和县城。王好善骑着大马,手握长枪,在西和城下对手下的匪徒们喊话:“弟兄们,今天就是你们发财的日子,打进西和城,抢了官仓店铺,捉住富汉官绅,财物任你拿,妇女任你挑,给我狠狠地打!”但是,土匪

的行为引起了全城军民的憎恶,守城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王好善被西和驻军与民众协力击退。到1928年秋,西和土匪林得仓又伙同云集寨的云中燕、梁集寨的李巨巨等土匪头子,在六巷鱼洞沟狐桥崖裹挟青壮年农民和地痞流氓等1000多人,串通上洛峪乡齐家庄人齐海、前八庄人杨琪变等股匪,林得仓自称大帅,云中燕和李巨巨称二帅,扬言也要攻打西和县城。在当时西和境内的匪帮中,林得仓一股势力最大,距离西和县城也较近,一时间,城里官商士民人心惶惶。陈清芝县长派人骑上快马,连夜驰往天水,向吉鸿昌师长求援,请求派兵保卫西和城。

而此时天水也正在遭受马仲英部的威胁,驻守天水的段鹤鸣团长临阵脱逃,投奔陇南王佑邦匪军,并准备在陇南大规模暴动。王佑邦与段鹤鸣等匪帮勾结,在陇南放纵抢掠,陇南各县匪患严

重,各地纷纷向省府求援。天水群众在惊恐之余,纷纷到城隍庙抽签卜问吉凶,所得签语竟然是“吉星高照”,并且传言吉鸿昌率军将至,群众情绪稍安。

1928年秋季,驻防陇西的国民军陆军第30师师长吉鸿昌将军得令,即率所部昼夜兼程前去解天水之围。吉鸿昌所部第一天赶到武山,第二天晚上就秘密进入天水城,做好了守城歼敌的准备,而马仲英毫不知晓。第三天早上,马仲英指挥部众开始围攻天水城,守城民团拼死抵抗,但吉鸿昌仍按兵不动。民团首领及地方人士曾几次要求吉鸿昌出兵杀敌,但吉将军成竹在胸,打算以小损取大胜,让马仲英部进城后一举歼灭之,故视而不理,镇静自若。地方绅士赵慕华见吉鸿昌按兵不动,就激将吉鸿昌说:“听说贵军乃爱民仁义之师,今匪即将破城,而将军仍不出兵,不知为何?”吉鸿昌听后当即上城巡察马部攻城情况,并将守城民团全部换下,下令部队开始反攻。吉鸿昌所部官兵训练有素,作战勇猛,尤其是派出去的三个大刀连队,身着单衣,冒着严寒,挥舞大刀,猛砍猛杀,一会儿的功夫就将来犯之敌赶到南河川,马军元气大伤,狼狈而逃。使天水军民免遭了一场大劫,天水百姓也因此把吉鸿昌视为救星,“吉星高照”被民间传为佳话,吉鸿昌师也赢得了“神兵”的赞誉。

吉鸿昌所部入驻天水,爱国爱民,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从不私入民宅。群众说:“吉鸿昌的队伍在人民当中温柔如姑娘,在敌人面前强悍如老虎。”

击溃马仲英部后,从1928年11月起,吉鸿昌部奉命驻防天水。不久,吉鸿昌奉命率部南下剿匪。应西和县长陈清芝之邀,吉鸿昌先派出一个团到西和县四乡分头进剿土匪,并把打击的重点放在林得仓股匪身上,其中一个营开往林得仓的老窝云雾山,用迫击炮轰击云雾山山堡,山堡被炸开一个缺口,山堡中的戏楼被击中起火,部队随即掩杀过去,土匪惊慌四散,当场打死打伤匪徒300多人,大帅林得仓逃跑,云中燕被击毙,李巨巨被俘,抓进县城后被执行了枪决;另一个营开往阴阳山,还有一个营开往北沟,攻打北沟的堡子。北沟堡子

和阴阳山山堡里的土匪听说云雾山大帅林得仓已经被打败,也都作鸟兽散,吉鸿昌部在西和剿匪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后,吉鸿昌又率部从何坝、黄江、草坪捕杀了十几名垛子(土匪据点)上的人后,大桥土匪马尚智的势力也基本退出了何坝和洛峪花园一带,并且不敢明目张胆地抢掠了,虽然暗中的抢掠活动仍在继续。

1928年11月下旬,占领武都的王佑邦委任王绍武为武都县长,任命康县窑坪匪首“毛老九”毛思明为营长,联合从天水败逃武都的陕西匪首段鹤鸣、夏河回军头目马仲英等,号称三千之众,打算先攻占陇南各县作为根据地,并约定各路土匪同时暴动。经协商,决定由段鹤鸣攻成县,刘凤翔攻徽县,王常胜攻礼县,马仲英攻天水,王佑邦亲率主力攻西和。王佑邦还派人前往大桥联络马尚智,打算联合攻打西和城,但遭到马尚智的婉拒。王佑邦乘成县地方驻军他调,城防空虚之际,先派遣段鹤鸣和毛思明等纠集乌合之众,率部从武都小关子出发,率领一个连的兵力,围攻成县县城,成县军民顽强坚守待援,段鹤鸣连攻三日而不克。

1928年11月底,吉鸿昌率部第二次进入陇南剿匪,并直奔成县。王佑邦闻讯,不得不放弃成县城,经西高山、石家关、青阳峡转攻西和城。

吉鸿昌率部到了成县,民众闻讯,纷纷走上街头,夹道欢迎吉鸿昌军,并在城内贴出了“欢迎吉师长,生擒王佑邦,肃清各股匪,民众得安康”的大幅标语。当日,吉鸿昌将军在成县东教场举行阅兵仪式,并对所部官兵和围观群众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帝国主义,国民之敌;救国救民,吾军天职!”“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应该为人民的安宁去奋斗不息!”吉鸿昌将军热情洋溢的讲话,博得了民众热烈的掌声。此后,吉鸿昌所部官兵在成县、徽县一带剿匪,夜间多宿营在街头和民宅屋檐下,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得百姓信赖,佳话至今流传。

二

1928年12月17日,王佑邦率部从成县进入西和县境,开始向西和、礼县进攻。西和县长陈清

芝一方面安排全城民众分段守城，另一方面派周贵岐突围出城向吉鸿昌师长求援。20日下午，守城军民虽殊死作战，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西和城被王佑邦匪徒攻陷。王佑邦匪军在西和城烧杀抢掠了整整7天后，得知吉鸿昌剿匪部队将到，于12月24日南撤武都。匪徒离去的第三日，也即12月27日，从徽、成两县驰援西和的吉鸿昌部队赶到西和，但此时此际，已经贼走城空。

吉鸿昌率部到达西和后，一面安抚民众，一面慰问死难者家属，妥善处置后事。西和绅商代表谒见吉师长，备述王佑邦匪军攻打西和城时，县长陈清芝放纵警佐陈从新带枪出城脱逃以及匪徒进城后大肆烧杀抢掠的情由。吉鸿昌当即向上级请求，革除陈清芝县长之职，另委任樊希智为西和县长。

1929年1月4日，王佑邦派王常胜部围攻礼县城。正在天水举办“陇南国术比赛大会”的吉鸿昌接到求援信后，立即派张仙洲营长率部驰援礼县。1月5日，吉鸿昌亲率所部进驻礼县城，与守城军民内外夹击，王常胜部惨败而逃。礼县县长马绍棠率领警兵追逐十余里，缴获大炮、枪械、马匹数十，擒获匪兵十余人。

1月6日早晨，吉鸿昌在礼县县城主持召开了军民大会，号召民众团结自卫，鼓励乡绅为地方出力。他在讲话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实物，以形象比喻和演示的方法，教育百姓团结对敌。他拿出一枝竹棍当众折断，又拿出一把竹棍来折，用尽全力也未能折断。又把一小堆沙石倒在筛子里，抓筛摇动，沙子全漏下去，仅石头留在筛内。这些简单的演示，让百姓懂得了许多深刻的道理：团结就是力量，只有人民群众的团结联合，才能击败敌人，赢得广大群众的热列掌声。会上，吉鸿昌还把亲笔题写的“功高梓里”的匾额（现存礼县博物馆）赠给礼县县城开明绅士、县政府建设局局长张槐三。为了加强礼县城防力量，吉鸿昌将军还给县政府赠送了20支长枪，数万发子弹，给与会人员每人发大洋一块。

1929年1月7日，吉鸿昌在礼县举行军民誓师大会，然后挥师南下，向武都进发，直捣王佑邦匪军老巢。礼县军民因感戴吉鸿昌将军解礼县县

城之围，为吉鸿昌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礼县民众向吉部送猪肉、白面犒赏众官兵，还为吉部筹备了大批粮草，基本上保证了剿匪期间的粮草供给，真的是“箪食壶浆送王师”，欢送吉鸿昌师长率所部南下继续剿匪。

为了防止土匪再次攻城，马绍棠用吉鸿昌给礼县政府赠送的枪支弹药发展城防武装，撤换了警佐，清除了民团中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改组了警察局和民团。王鸣真以礼县政府录事兼民政科长、马绍棠特使的身份亲赴西和大桥、石峡和武都草川崖等地，与占山为王的马尚智、邵青莲、王德一等啸聚山寨的地方武装举行谈判，先后招安了邵青莲等三支较大的地方武装，编成保安团，以加强城防力量。

吉鸿昌率部离开礼县后，兼程急进，于1929年1月底（农历1928年腊月）赶赴武都。王佑邦闻讯后，在武都设下了“空城计”，将众匪徒埋伏于没水山、旧城山后梁一带，企图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与吉鸿昌决一死战。吉鸿昌用兵如神，他派人先期占领五凤山的三天门、平陵坎，到阵地后集中了10余门迫击炮，集中火力，炮轰王佑邦匪军阵地。同时，派出两个步兵营轻装挺进，沿北峪河出磨峪沟包抄匪军。王佑邦匪军见状，担心全军覆没，于是迅速脱离阵地，各自奔命而去。王佑邦率残部向西逃窜，吉鸿昌部乘胜跟踪追击，一直追到沙湾、清水子一带。王佑邦仅剩10余骑人马，落荒而逃，最后涉黑河（今四川九寨沟县的白水江一段）沿尕儿河逃往四川松潘境内。

吉鸿昌所部官兵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秋毫不犯。在西和、礼县和武都剿匪期间，正值数九寒天，战斗多在冰天雪地中进行，将士常露宿于深山旷野之中，不少官兵冻伤了手指脚趾，但官兵们体察民生艰难，从不扰民，往往露宿于庙宇和群众院内的屋檐下，就连群众自愿送给官兵的东西都不要。群众慨叹：“从未见过这样的仁义之师！”将军还不辞辛苦，深入民众，访问饥苦，救济难民。在部队倡导节衣缩食，惩处浪费行为，这些行动令陇南人民深受感动，至今难忘，部队也赢得百姓的称赞和拥护。

吉鸿昌部队进驻武都时，有一地方绅士谒见吉鸿昌，并呈上有三四名绅士具名的一封信，称匪军离境，他们未及出城迎接贵军，表示歉意。吉鸿昌愤怒地骂道：有人揭发尔等在地方勾结土匪，仗势欺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当即下令扣留了那个绅士，并将信中具名的三四名绅士全部逮捕，送军法处审讯，并没收了他们全部的非法收入。

部队进城后，武都各界召开欢迎大会并慰劳官兵。吉鸿昌师长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国民军是奉行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军队，是爱护老百姓的军队，剿匪除害是军队天职，责无旁贷。老百姓要帮助军队，军民合作，安定地方。军人更要爱护百姓，因为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为此，吉鸿昌下令：“不准私入民宅，惊扰百姓，调戏妇女；不准拿民间一草一木；不准破坏学校、古迹；不准抬高市价；不准私藏军火；不准窝藏匪类；不准聚众行凶。军民人等，一体遵行，违者军法从事，决不姑息。”次日，又在武都城贴出布告：“凡行止无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滋事生非、造谣惑众者，着立即改过自新，弃邪归正，安分守己，如敢妄动，拿办不怠。”

王佑邦安插的武都县长于湖境，为匪张目，助匪害民，民怨沸腾。吉师长顺从民意，对其执行了枪决。武都地方豪绅宋国均，曾在白马关任财政所长，恣意征敛，贪污公款后潜回家中。吉师长将其捉拿归案后，令其限期退回赃款 2000 多块银元，赎罪结案。吉鸿昌由武都返天水途中，在宿营地集合村内居民，老壮者每名发给 3 元钱，幼孺发给 2 元钱，作为临时救济，并向民众讲话，号召民众要组织起来，防匪自卫。吉鸿昌这一措施，是甘肃自有驻军以来史无前例的。百姓传颂，称道不已。

1929 年夏，吉鸿昌奉命回防天水，国民军张维玺部王丕襄团接防武都。十几天之后，剿匪凯旋的吉鸿昌率部从武都来到西和县，打算在西和短暂休整后再回天水，但看到西和县城经王佑邦匪帮糟蹋后的残破不堪的景象，不忍心再打扰西和父老乡亲，命令主力部队从石堡改道，径往礼县，只有吉鸿昌师长及其副官等随行人员几十个人留住西和县南街的水南镇学校。

图片为吉鸿昌使用过的大碗，上面烧制着乃



父的遗训：“作官即不许发财”。

三

1929 年月，吉鸿昌第二次率部下陇南进剿王佑邦匪徒，同时对陇南各地大小股匪一概剿灭。吉鸿昌对盘踞大桥仇池山一带的李进学、马尚智股匪也一并围剿，李进学和马尚智自知兵寡将少，根本不敌吉鸿昌大军，当即决定率领残兵败将逃往徽县，暂避锋芒，静观时变，准备以后重返仇池。吉鸿昌部队一路所向披靡，一直打到武都，王佑邦战败潜逃。

1929 年冬天，王丕襄团奉命回防汉中，武都父老热情欢送。王丕襄离开武都以后，武都城防空虚，川军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认为向甘肃发展势力的机会到了，就支持并派遣王佑邦，让他从四川松潘、茂名一带再度进入陇南，第二次盘踞武都。王佑邦在此时也认为陇南各县有机可乘，就联络陕匪刘得财又进犯陇南。刘得财原为陕西军阀甄寿珊的师长，在杨虎城杀了甄寿珊后，刘得财反叛，占据陕西的凤翔、岐山、宝鸡一带为寇。

11 月，刘得财应王佑邦之召，率众 1000 余人经凤县，两当攻入徽县。徽县驻军及保安队闻讯奔逃。刘得财部在徽县抢掠 92 天，挨户搜刮，城乡民众被洗劫一空。此后王佑邦又啸聚成县鸡山，在鸡山设立司令部，占山为王，招纳匪类，伺机而动。后来王佑邦下山进城，窜至成县城里大肆抢掠达 20 余日。在成县城内又设立了他的司令部，并派兵攻下徽县城，占据徽县城 20 多天，收编了徽县大门

镇的民团团总杨子才,任命杨子才为团长,封旧部段鹤鸣为营长。这样,王佑邦的土匪队伍又逐渐壮大起来。

王佑邦匪军第二次占据武都,司令部设在城隍庙,继续为非作歹。王佑邦虽经历了吉鸿昌国民军的沉重打击,但匪性未改,仍四处流窜,招降纳叛,企图东山再起。

岷县鲁大昌和天水马廷贤对王佑邦在陇南的活动都极为重视。为了把王佑邦拉到自己一边,马廷贤先后委任王佑邦为武都城防司令和游击司令、陇南后方司令,驻防文县、武都、成县、徽县、两当、康县。而鲁大昌又任命他的拜把子兄弟王佑邦为其武都城防司令。值徽、成两县人民处于匪患频仍之时,国民军冯玉祥部张维玺师所部团长王志远奉命先行开赴成县,王佑邦率部再次逃窜武都。

1930年夏季,陕匪王佑邦又多次突袭成县,大肆抢劫绑票后逃遁。同月,王佑邦再次聚群匪围攻徽县县城,得而复失,遂奔赴四川投牛子远师。

1930年中秋节后不久,王佑邦旧部团长王常胜、张明山等纠集大小股匪5000余人,分三路向武都县城逼进,王常胜率骑兵从西面攻来,张明柱股匪控制了没水山、旧城山,郑殿英、夏老三股匪占据北山的腰道山、水子山。一时武都城内形势危急,匪警频传。民众见敌众我寡,料难以御敌,人心恐慌。城内绅商各界请求王志远团长火速应变,保全县城。王志远团长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当土匪进犯武都时,他命令大开城门,商贾照常营业,新兵照常操练。命令重机枪排渡过白龙江,驰赴渭子沟,沿河设伏,又派一个步兵排在中楼滩赤砂庙附近设防,然后调两个步兵排出城过教场、东江水,从半山里直插陡峻坡。部署既定,王团长从容坐镇北堤万寿台下,胸前挂着望远镜,手摇竹扇,身后仅有一名卫士,状若安闲。

当时,王常胜骑兵从黄家坝、灰崖子长驱直入。一进入国民军设伏作战区域,国民军机枪、步枪齐发,匪军顿时被打得昏头转向,人仰马翻,抢头鼠窜。当退至石坡儿时,又遭到对岸机枪的扫射,匪军死伤惨重,匪首王常胜落荒而逃。此战打得匪军人仰马翻,战斗中生擒37人,在北峪河河

坝就地斩首。其余匪徒或被击毙,或四散奔逃,或投河淹死,武都城保卫战大获全胜。

驻扎在腰道里、水子山的郑殿英、夏老三匪众正准备埋锅造饭,打算饭后攻打武都城,突听到枪炮声大作,又得知王常胜已溃不成军,顿时慌了手脚。这时,国民军的迫击炮弹又打中了匪营锅灶,匪兵顿时大乱,四散逃命。国民军在追剿中俘获土匪40多人,押解城内审讯,那些人大多数是被裹胁的农民,遂释放回家,个别惯匪被执行枪决。张明山股匪在没水山眼看着攻城计划破灭,赶忙引着匪徒们逃遁。

1930年8月3日,川军联合川匪首领白云又一次攻陷武都,王佑邦兵败逃回成县,被驻防成县的马廷贤部马忠火并,所部被缴械,王佑邦被擒。押解途中,王佑邦得间逃逸,藏匿深山之中。后只身逃往岷县,投奔他的拜把子、甘肃地方军阀鲁大昌。又被鲁大昌任命为武都城防司令,再次盘踞武都。

8月5日,马廷贤部攻占定西县城后,受到马麟部的攻击,马廷贤军伤亡较大,只得退出定西城,回到天水。至此,马廷贤与国民军的战斗便告结束。

1930年11月,牛子远偕王佑邦又攻入徽县境,徽县军民顽强抵抗,王佑邦攻打徽县城,在五得五失后撤退。屡遭失败的王佑邦看到马廷贤实力强大,遂投其所好,潜回成县擒杀了段鹤鸣,函首于马廷贤,马廷贤大喜,委任王佑邦为陇南后方司令,令其驻防武都,这样,马廷贤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成县,并令马忠驻防成县。

此后,马廷贤又以马忠为边防司令,与王佑邦联军攻打徽县、武都,马忠与旅长马如龙率其骑兵旅进攻康县、武都,攻占了白马关,洗劫了康县县政府和警察局;攻入武都后,武都县长刘鑫逃往文县,刚到武都的四川“江防军”也被马如龙的骑兵打了个措手不及,从武都败退。不久,马忠被马廷贤调回天水,王佑邦又以马廷贤军后方司令的名义,第二次接手武都城防,并在武都城纳了妾。

1932年冬,何处率所部到武都后,留一个营

的兵力驻守武都,一个营驻文县,然后亲率一个营驻防文县碧口镇,并从四川军阀那里购买军火,以扩充自己的武装。

何处,原名何玉铭,字戒僧,武山人,时任鲁大昌新编十四师第一旅第二团团长。何处原为西北国民军冯玉祥部营长。冯玉祥下野后,何在汉中率100多人起义。1930年4月率部曾在凤县、两当一带活动,联合地方神团赶走马家军。何处同情共产党,具有革命倾向,后来秘密加入中共党员后,潜伏在鲁大昌部从事地下活动。何处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深得鲁大昌赏识,被委以团长之职。

何处早就风闻王佑邦祸害陇南百姓的累累罪行,当鲁大昌收编王佑邦并委以重任之时,何处就对鲁大昌说,王佑邦在陇南的作为恐怕难以服众,建议不要接纳王佑邦,但鲁大昌与王佑邦有金兰之交,也很赏识王佑邦,没有接受何处的建议。但鲁大昌接受了何处的另一建议:武都、文县扼甘川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应加强武都、文县一带防卫。鲁大昌觉得有理,当即派何处率其所部第一旅第二团从陇西移防武都、文县。此后,何处就寻找机会,打算剪除王佑邦,只是时机尚未成熟。

何处到达武都后,在武都受到鲁大昌的结拜兄弟、割据陇南的王佑邦的热情接待。王佑邦对何处团长的到来极为重视,当晚大摆筵席,设宴为何处团长接风洗尘。宴罢,王佑邦回厂院公馆休息,而何处团长随即调兵遣将,包围了王佑邦的司令部,缴了警卫连的全部枪械,同时袭击王公馆,捕获了王佑邦。王佑邦顿时由司令变成了“阶下囚”。王佑邦驻汉王的一个营听闻武都城里的事变,就知道王佑邦出事了,他们为了自保,一枪未发,连夜东下,朝三河方向逃走。王佑邦被何处团长关押了一天一夜后,次日晚上,何部士兵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把王佑邦押到城南河堤水神庙前的刑场上,何处团长历数王佑邦在陇南为匪多年,祸害人民的种种罪行后说,王佑邦实属“罪大恶极,十恶难舍”之徒,当即在庙前执行枪毙,并将尸体抛入白龙江。

武都民众听闻惯匪王佑邦被杀,欣喜若狂,到处放鞭炮庆贺,工农商学各界自愿结队慰问何处

所部官兵。

王佑邦的尸体后来被武都县赵坝的某农民捞出来,由其在武都所纳之妾收殮入棺。鲁大昌闻讯后,派人花高价将其的灵柩运至岷县,安葬于岷县的二郎山,也算是尽了金兰之义。

当鲁大昌听闻何处团长斩杀其拜把子王佑邦的消息后非常生气,也很悔恨,当即停发了何处全团的粮饷,断绝了与何处部的关系。后来又听说何处团长在武都、文县一带扩军备战,更让鲁大昌坐卧不宁,觉得此人野心勃勃,日后恐怕难以驾驭,长此以往,会养虎遗患,遂下决心消灭何处所部,但鲁大昌表面沉着冷静,不动神色,却在暗中安排奸细监视何处团的行踪。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驻川北大巴山地区,建立了通(江)南(江)巴(中)革命根据地。何处闻知,一方面急电北平党组织,邀请靖任秋来武都商议起义大计,准备接应红四方面军进陇南,另一方面积极扩大自己的武装,壮大自己的实力。靖任秋通过北平党组织转报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军委同意靖任秋、刘秉林、武伯昌前往武都,协助何处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军委还派王大舜(真名刘瑞龙)同往,让王大舜与靖任秋、刘秉林、武伯昌等人在西安接头。但靖任秋等急于前往武都与何处团长接触,还没等到王大舜到达西安,就于1933年3月间独自赶到武都。这时,何处已将原来的三个营扩充到了五个营。

鲁大昌觉得何处的危险性越来越大,于是向驻防天水的胡宗南贿以重金,要求胡宗南与他协同消灭何处。1934年夏,胡宗南派丁德隆率独立旅的三个团进驻广元、昭化、碧口地区,协同四川军阀与红四方面军作战,同时监督何处所部的举动。与此同时,鲁大昌也派一个旅到武都,策应胡宗南的行动。1935年初夏,何处在碧口被丁德隆诱捕,靖任秋等3人侥幸脱身,逃离武都。5月7日,兵败被俘的何处被押解到岷县,当晚,鲁大昌就以“图谋赤化”的罪名将何处杀害,时年仅26岁。

(作者单位:陇南师专)



谭嗣同在兰州

党麟

1898年9月28日,为富国强兵而发起的“戊戌变法”终于落下了它最惨烈的帷幕,被押往北京菜市口英勇就义的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大声喊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位本来能跑却选择留下,能活却求死的谭嗣同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史的奇男子,中华民族的伟丈夫,烈火狂飙是他的性格,松魂桂魄是他的灵魂,而“不废江河”则是他留下的永恒精神吧!

烈士身后一片赞誉,其故事家喻户晓,然他在青少年时代曾五次来到兰州,饱览金城山水,刻苦读书,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1877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由户部员外郎外放甘肃巩秦阶道,他携年仅13岁的谭嗣同由北京返回湖南浏阳故里,这是谭嗣同第一次回到家乡,次年也就是1878年春赴任甘肃,他们从浏阳坐船到长沙,换大船到汉阳,再经襄阳到洛阳,进入陕西潼关。14岁的谭嗣同即景赋诗《潼关》: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这位未来的英雄一出手就气度非凡,关隘风屯云集,气象雄浑,踏破崇山峻岭的马蹄声被秋风吹散,黄河暂时的收束必将冲破峡关而一泄千里奔向大海,少年谭嗣同为千古雄关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1878年秋,谭氏父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兰州,住甘肃布政使司衙门——即憩园(今山字石一带)。在憩园的岁月里,谭嗣同刻苦读书,尤其攻读《墨子》,为以后自己仁学思想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此后的10年间,谭嗣同五度往返兰州与浏阳之间,足迹遍及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并远去西北新疆和东南的台湾,行程合计八万里,用他的话说“堪绕地球一周”,在跋山涉水中,他了解风土人情,体察民间疾苦,磨练了自己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张扬了凌厉无前的任侠精神。1882年秋,谭嗣同第二次来到兰州,在一个初冬的下午,他来到兰州庄严寺拜谒,留诗《兰州庄严寺》:访僧入孤寺,一径苍苔深,寒磬秋花落,承尘破纸吟,谭花澄夕照,松翠下庭阴,不尽古时意,萧萧雅满林。18岁的谭嗣同已具有深厚的古文学底蕴,诗中以苍然凄美的笔触将初冬的庄严寺描绘的淋漓尽致,1883年冬,在憩园夜读的谭嗣同赋诗《夜成》:苦日霜林微有阴,寒灯欲雪夜钟声,此时危坐管宁榻,(管宁,三国时魏人,以好学著称)抱漆似为梁父吟。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心,摊书兀兀了无睡(兀兀,穷困),起听五更孤角沉。一个高度集权的黑暗时代,可以令人畏惧,可以让人消沉,但更可以磨练真正的人坚强与伟岸,即使风雨如磐,也有雷鸣与闪电,谭嗣同正是撕破黑暗王国的一道雪亮的电闪,如报道破晓得一声惊世雷鸣!

谭嗣同在游历兰州南关城楼时,曾挥豪写下“雄镇南关”四个遒劲刚毅的大字,地方官员仰慕这位蜚声遐迩的青年俊杰,将其刻匾悬于南关城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取下藏于楼内,1955年拆楼时还有人见过此匾,谭嗣同留在兰州唯一的无以伦比的珍贵墨宝如今渺无踪迹,诚为痛惜!

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谭嗣同以他33岁的热血之躯为变法图强挽陆沉之中国献出宝贵的生命,如果用和他同时代同壮烈的巾帼英雄鉴湖女侠秋瑾女士在举义前的绝命诗作结,恐怕再合适不过了:谁召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他年共唱摆苍歌,虽死犹生……

(作者系《甘肃年鉴》编辑)

《高台县志》（1989-2010）评审会议召开

2014年10月23日，《高台县志》（1989-2010）评审会在高台县召开。省志办市县志指导处处长贺红梅，张掖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何成才、副主任陈希圣，高台县委副书记、县长杨成林，高台县政协主席、《高台县志》（1989-2010）总编赵春，高台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梁吉东，高台县四大班子分管领导，部分退休老干部，相关部门、乡镇负责人及县内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共5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高台县志》（1989-2010）评审稿编纂工作情况，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对评议稿进行了认真评议，在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补充、修改、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哈建设书法简介

哈建设，男，汉族，宁夏青铜峡人，1956年8月出生于宁夏银川，甘肃省委党校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为甘肃省纪委、监察厅正厅级纪检监察专员。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并撰写诗歌、散文，其作品集有《无疆思语》，分5部分，收录了哈建设十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散文、杂文、诗歌及楹联等，书后还附有作者创作的部分优秀书法作品。

